

新马文学丛书



文学情怀录

孟沙 · 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

《新马文学丛书》系列
(第二辑)

文学情怀录

孟沙著

孟沙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南方文丛》和《新马文艺丛书》之外，还筹划出版全新的《新马文学丛书》系列，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因为嗜书如癖，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日子久了，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当时，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尤其是对《南方文丛》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如汉素音、杏影、连士升、苗秀、韦晕、赵戎、李星可、李汝琳，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如《星月文艺丛刊》、《新地文艺丛书》、《新马戏剧丛书》、《南国文丛》、《亚非史地论丛》、《南洋民间故事丛刊》、《史地论丛》，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研究、史料、教育、美术

和音乐等单行本。虽然，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但是，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

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陈先生老当益壮，精神抖擞，财力雄厚，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决意东山再起，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负责主编《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出版事宜。

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的事情，否则岁月蹉跎，后悔莫及。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充实并壮大《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阵容，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

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

忠扬

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

目录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第一辑 文学交流

1. 世华文学一家亲…………… 1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一
2. 华文经济地位提高有助华文文学发展? ……5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二
3. “沙漠”地区华文文学艰苦求生…………… 9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三
4. 无所不在的华文情怀…………… 14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四
5. 华文文学自我肯定…………… 19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五
6. 微型小说开拓世界文学市场…………… 24
——世华微型小说研讨会小记
7. 亦庄亦谐的文学盛会…………… 28
——第4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纪实

第二辑 马华文学踪迹

1. 为有源头活水来····· 39
——马华文学70年来走过的道路
2. 荆棘满途话作协····· 47
——大马华文作协18年来奋斗始末记
3. 热闹背后的隐忧····· 55
——1984年马华文坛扫描
4. 山高水远·云淡风轻····· 67
——1990年马华文坛扫描
5. 风卷云开晴方好····· 85
——1991年马华文坛扫描
6. 从东合五国华文文学看马华文学走势····· 99
——兼谈1992年马华文坛
7. 马华文学方兴未艾····· 108
——1993年马华文坛扫描
8. 量中求质····· 116
——2000年度南大校友会微型小说赛总评
9. 微型小说浅谈····· 121
10. 要求生活的散文····· 124
——第13届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作品评后感

第三辑 文学现象

1. 马华文学现象····· 127
2. 文人下海之后····· 132
3. 文学的倒退····· 136

4.为奖金而写作·····	139
5.作家地位·····	141
6.文人相轻和朋友主义·····	143
7.中学生不知道方修·····	145
8.写作这行业·····	147
9.“文艺税”与其他·····	149
10.新诗的明天·····	151
11.马华文学何去何从·····	154
12.“弃儿”永远长不大·····	160
13.为什么要读马华文学史·····	164

第四辑 作家·作品

1.向韦晕先生致敬·····	169
——喜闻“韦晕文学评论奖”设立	
2.人生长恨水长东·····	173
——悼原上草	
3.诗人，你走得何其匆匆·····	178
——悼端木虹	
4.诗人何达和他的诗·····	184
5.唱出时代强音的诗人·····	188
——小写“朦胧诗人”北岛	
6.郑愁予的《赋别》·····	191
——读诗札记	
7.吴岸诗歌的人文精神·····	196

8.现代人的悲情和失落·····	206
——林锦微型小说赏析	
9.小议黎紫书的小说·····	218
10.我看陈大为的诗和散文·····	222
11.温馨感人的生活之歌·····	227
——序许心伦散文集《有情天地》	
12.林秋霞和她的《宠物》·····	233
后记·····	238





第一辑 文学交流

世华文学一家亲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一

在商品文学泛滥的二十世纪末，纯文学已然面对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令全世界从事文学工作者扼腕叹息；严肃的文学作品往往找不到地方发表，纯文学刊物得不到外界的资助，在资金不济的情况下变成“短命”刊物，几乎是海内外文坛共同的遭遇。

如今，许多人都说下一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也是华文抬头的世纪。那么，当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际，华文文学又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局面呢？

全球三十四个国家地区将近一百五十名代表，于一九九五年临终时刻云集新加坡国大校园，为世界华文文学共同面对的课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且具建设性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大会也可以被目为本世纪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盛会。

不会被歪风吹倒

旅居瑞士专业作家，也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赵淑

侠，在主持论文报告时作出总结，她说了这么一番话：“作为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对华文文学都有一份崇敬的心情，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感，纵使处在商品文学抬头纯文学低落的今天，我们仍不会被一股歪风吹倒。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永恒性，它是一股清流，永远清澈。而正统纯洁的东西是不容易被歪风吹倒的。”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文学作品里都有适度的反映，西方人比我们看得更博更深。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处在目前的大环境，我们无需为眼前的挫折而气馁灰心，将来的华文文学前途必然会越来越光明。”

赵淑侠这席话就是一股暖流，温暖了每一位参与盛会的文友。古人说得好：以文会友，环顾出席世华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有来自南美洲、北美洲、南非、欧洲、澳洲、纽西兰、东协七国、日本、韩国及港台等地区文学工作者，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初次相逢，然而在这之前或多或少都阅读过对方的作品，有的心仪神交已久，一朝见面自有难以言说的欢欣，彼此都有共同的语言，无需太多客套便能像认识多年的旧雨般融洽健谈。因此，当赵淑侠讲完了话，会场立即响起雷动的掌声，这便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不是拥有一颗热爱华文和文学的心，这一百几十位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平日里默默耕耘的写作者，如何会有这份“相濡以沫”的投契与体悟？

来自南美的邓幸光，在会上讲出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说：“南美洲是中华文化的边陲地带，我们走着一一条寂寞却值得的华文文学之路，成果比不上其他地区，却也实实在

在的一步留下一个脚印。在那里，行有余力可以学华文读者不多，而且越来越少，自费出版一本书，还要想尽花招来赠送。由于读者市场缩小，业余作家逐渐流失，华文文学命运不卜也知道其前途多舛了。”

他说，他曾经写过一文：《我们不愿做南美华文的末代作者》，呼吁文友加紧耕耘华文文学的园地，并设法鼓励后进，不要让华文文学在南美沉寂甚至死亡。

有新一代就有希望

邓幸光的心声，很快有了回响。来自澳洲的徐家祯马上起身发言，他安慰邓不必担心，因为新移民中不断有新一代，有新一代就有希望，华文文学不愁后继无人。

其实，澳华文学之旅也是满含辛酸和血泪。根据徐家祯的报告，那里华文作家的作品要结集出版难如登天，要求正规出版社苦于没有关系，要自费出版则苦于没有资金，许多优秀之作便鲜有人知。

他说，澳洲作家米勒不久前在墨尔本召开的作协讲演会上曾经感叹：等到认识了华文作家朋友，才知道原来澳洲竟然还有这么一大批“地下作家”！可想而知海外华文作家的可怜地位了。

来自东京的日本华文作家联谊会会长齐涛在发言中，对于处在高度商业化社会里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不无悲观。他问：到底是文学跟着时代走，还是时代跟着文学走？到底是社会影响着文学，还是文学影响了社会？

尽管如此，他还是勉励作家要勤奋地写，把自己当是苦

行僧，把爱散给人间，不必期待回报和影响。他说，人类不能没有文学，它既是文化的标竿，更是文化的果实；这些标竿和果实与种子，缺水缺氧都不行，现在只是气候不好而已。

言为心声，从众多代表的谈话里，我也强烈地感到世界华文作家一股坚韧的诉求：华文文学之旅，寂寞，却绝不孤独！

(1996年1月15日载于《南洋商报·南洋副刊》)

华文经济地位提高 有助华文文学发展？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二

“下一个世纪是中国人的！华文的经济效益肯定提高！”

不管是政坛、工商界还是文教界，现在已越来越多人尾随附和这个新时代的口号。

在世华大会上，也有不少作家提到这个当前流行的“口头禅”。

华文有价，是否也带动华文文学的向前发展？应该是许许多多关心爱护母语文化人士所感兴趣的问题。

新加坡贸工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吴志伟为世华大会主持开幕仪式时，发表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言论。他首先肯定华文的经济价值提高，将有助于促进世人对华文文学的兴趣和重视，却不见得对文学发展有利。针对这一点，他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作家不应故步自封

他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不受到重视，是形势的必然，不足为奇。他吁请文学工作者改变态度，不要故步自封，面对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作家需要在提升华文文学水平及培养新一代作家方面作出努力。

他也强调，文学作品要生存，不能没有读者。因此，他要求作家在创作时朝向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文学作品反映大众生活，作家不能孤芳自赏。

2. 摒弃标新立异作风，写作技巧要有创意，但是不能脱离现实。

3. 写出具有时代感、而又不媚俗的作品。

新加坡老作家田流，以《剖视九十年代当前新华作家的写作处境与心态》为题，一开始便斩钉截铁地表明：“新华文艺创作的前景，有人说是一片幽黯，有人说是无比璀璨。其实，自我奚落或自我陶醉，都是无谓的。重要的是华文作家应该认清，从事写作是为了珍惜文学的遗产，为了捍卫和提高华文的地位。”

写出表露爱心的作品

他感叹：“岛国近半年来，年轻华文作家虽屡有发掘，惟惜泰半都缺乏坚强的斗志与持恒的信心……而某些年轻作者又自视甚高，自以为本身的作品才是精品，别人的都是下三滥之作。可悲的是成天关在一个小小的文艺圈子里，凑约三两个文友互相吹捧，互相瞎赞，半辈子都没有了解圈外文艺界那多采多姿、多型多样的创作动态或文艺活动。”

他同时悲哀新华文学今不如昔。他说：在五十年代，一本文艺作品单行本，印数起码在三五千以上，而且在短短三几个月内悉数销完，甚至有的在一夜之间售出千册以上。然而回看今天的情况，当年青少年那股乐于关注和翻阅文艺副刊与杂志上作品的炽烈风气，经已消失殆尽；资深作家感到失望无奈，年轻作家却患得患失，华文文学日渐增加了爱唱悲调子的人士。

他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更好的作品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一切表示关心，表露爱心的作品。

林高是新华文坛中年轻一辈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文学观基本上直面人生，但在实践上，他要求作家须有自知、自重和自信，文学的发展虽然需要一股推动力，然而在文学的道路上必须是自由活泼、多姿多彩的。

谈到华文文学与当地文化交流问题，他促请作家必须先问：华人社会对华文文学了解多少？尊重多少？华文作家向来默默耕耘，华人社会爱护他们吗？肯定他们的贡献吗？还是让他们随波逐流，自生自灭？他说：如果我们自己不重视和珍惜自己，如何要求别人重视和珍惜我们？

华文文学优美文采

针对本地作家甚少接触到他族同胞的生活素材，描写他族同胞的作品难得一见，他认为这是各种族之间缺少交流缺少了解所致。他吁请作家不应自我约束，要扩大视野，放开胸襟，从自己出发，凭各自的禀赋和性情，去开拓创作的领域，去开启众人心灵之锁。

来自北美的简宛则要作家往前看。她说：“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开放多向的世界，从沟通中建立了解与感情，以往华人皆自守于华人社会，今后的方向应该从华人社会中也向外拓展，让中华文字、文学之美，不仅能在华人社会中互相欣赏、讨论，进而能使当地更多不谙华文的人士，也领略到我们华文文学中的优美文采和精神。”

基于这个信念，这位在美国负责文教工作的女作家，对世界华文文学将来的展望充满期许。她认为：以“人”为本位的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色，因为文学是反映生活，是每一个生命的反照，尤其生活在海外，由其深切的感受，融入当地的文化、习俗中，而产生的真挚语言，透过文学，传递了心声与交流，让有华人华语的地方，分享到了每一个生命的跳跃与活动，也正是“天涯若比邻”的最好写照。

简宛意见代表了一般与会作家的看法。要不是有华文文学，要不是出自一份热爱母语文化的虔诚心意，像印尼、越南、南非、南美、北美、缅甸、汶莱这些连华文生存都备觉困难的地区，又怎么可能还有华文文学，而且还随着时局的改变逐渐显露生机？这些事实不也进一步说明了“石在，火种在”的真理吗？

“沙漠”地区华文文学艰苦求生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三

第二届世华大会举行前夕，是第六届亚华大会召开。主办当局选择在同个时间地点一起完成两件历史性盛事，既节省人力物力，又使场面壮观，方便各国各地区代表无需分两头奔波，可说是利人利己、事半功倍的明智之举。

事实上，这一次两会的成功举行，场面的盛大尚在其次，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有机会聆听到华文文学“沙漠地带”的报告，像南美、北美、缅甸、越南、印尼、纽西兰等地区，在一般人的脑海里，似乎很难和华文扯在一起，更别说是更高层次的华文文学了。如今，主办当局邀请到这些地区的代表出席，并向大会汇报那里的文坛现况，对许多来自“文学大区”的同文来说，不啻是上了真正宝贵的一课。

印汶越华处境凄凉

这次盛会，东协七个成员国都到齐了。七国之中，新马的华文文学算是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下来是泰国和菲律

宾。虽然华文文学的根基不强，文人至少还有结社的自由，今后只要加强主观方面的努力，谁也不敢低估他们的发展潜能，特别是泰国。至于其他三国：印尼、汶莱和越南，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想用“风雨飘摇”这句成语，当可以概括他们如今的处境了。印尼代表团这回共有九人（包括四名观察员），阵容浩大，人数仅次于主办国，令人刮目相看。犹记得去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亚细安文艺营，印尼团仍像往届那样仓促组军，他们的女写作人晓彤在会上发表令人鼻酸的印华文坛简报，仍历历如在眼前。她说，印华文坛目前大约只有五十位作者，他们靠自修和摸索走上文学道路，既没人指点，也没有交流，更没有创作比赛；客观环境又限制他们随心所欲发挥，不能写节令性文章，也不能提春夏秋冬；在全国只有一个华文文艺副刊（附于官方的华文报纸《印度尼西亚日报》）的情况下，那里文艺界的荒凉程度可想而知。

等待春暖时节到来

这回重逢，晓彤和其他的印尼团员带来一批书——印华十六位写作人各类文体的合集《沙漠上的绿洲》，分赠给各地文友。虽然这本集子出版得不易，还是靠新加坡诗人寒川和岛屿文化社的多方协助下才付梓面市，至少这本经历漫长三十余年“黑暗时期”后诞生的印华第一本合集，已让我们看到了印华文坛复苏的生机。正如他们的代表钟若迟在论文里说的：“执政当局开始有了对华文松绑的迹象。印华文坛目前虽处在冬眠状态，但老中青三代都还保留着薪火相传的

默契，只待春暖时节到来，这片荒漠的旷野便能蔚为花团锦簇的世界。”

汶莱的幅员小，华人人口更少，华文文学尚处在启蒙阶段。国内的华文写作者人主要围绕在留台同学会写作组，和印尼的情况一样，文人没有结社的自由。两相比较，印华至少在历史上还有过光辉的年代，而汶莱的华文文学，目前则还在起步时期。

越南的华人人口约有百万，只有一家华文报，《解放日报》，这家销路一万余份、每天出版仅十大版的华文报，居然还相当重视文艺，每周都拨出一版供文友发表他们的作品。新马文艺界对越华文坛一向知之不多，这回的盛会，他们总共来了五位观察员，并带来他们近年出版的一本结集《越华现代诗钞》。这本集合越华三十余位作者的诗集，多少可让我们看到越华文学水平和诗风倾向。

在亚洲方面，缅甸的华文文坛对们来说，长期以来也是一个“绝缘体”，从朱心一（曾任小学校长兼县议员，退休后定居台北）的简单报告里，我们对缅华的情况仍然一无所知，因为据朱氏说，他们那里的作者很多居住在乡间，由于电讯设备差，他无法联络到本土作者。不过从他所说的：缅甸的华校很多缺少教科书，华文书刊不准进口这两点来看，缅甸文学在发展上面的困难应可想而知。

南美和北美均属于华文文学的“边陲地带”，华人人口少，读者更少，从事文艺工作者要在那种恶劣的客观环境下推展文运，肯定是极吃力又不讨好。他们的处境和分散在欧洲澳纽各地的华文作家一样，都面对共同的难题：华侨散

居，华文使用机会不多，第二代华侨子弟已无经常使用华文的环境，久而久之，学习华文意愿低落，逐渐流于形式，成了敷衍父母的一种功课。到第三代则每况愈下，父母的华文程度有限，不可能亲自督促下一代，华文的发展情况堪虞，华文文学的前景自然也不容乐观。

南非是沙漠中的沙漠

倒是听了南非代表的报告后，我们那沉重的心情又为之一振起来。来自南非《侨声报》社长兼总编辑的杨秀成告诉与会者：比起南北美和澳纽，南非的华文文学是“沙漠中的沙漠”，目前尚处在萌芽阶段。在旧一代的移民中，他们绝大部分住在乡间，务农或做小买卖，谈不上有文化水平。自一九七六年与中国建交后，大批大陆和香港的新移民涌入，他们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南非，受到优厚待遇，经济条件好，教育水平高，也拥有社会地位。他们关心子女教育，从港台物色师资，华文报大体上还能立足。他也告诉会众：《侨声报》成立于三十年前，每天出纸由一张增至目前的三张，刊期由周刊发展为三日刊，将来计划增至每周出五天。这份南非唯一的华文报，在华人人口只有三万余的情形下，销路居然高达五千份，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事。更难得的是，杨秀成还满怀信心，准备短期内举行座谈会，号召该国的华文作者成立非洲华文作协。他说：南非华文写作人能力和资源有限，然而意志力强，这个愿望相信不久后就会实现。

看看别人，再回想自己，马华文学今天的发展和局面，虽然不能和海峡两岸相提并论，却是海外华文文学成长得较

健全的一株奇葩。长期以来，马华文学工作者也和其他地区的同文那样，默默地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上辛勤耕耘，从孤军作战到开始为社群注意，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已奋斗了多少个十年，最困厄的难关都已闯过去了，没有理由在今天华文地位日渐提高受到重视时，我们反而要消极和沮丧。对于马华写作界，今后应致力加强信念和提升创作水平，在这两点上建立共识，我想是必要的。

(1996年1月16日载于《南洋商报·南洋副刊》)

无所不在的华文情怀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四

第二届世华大会的主题有二：如何促进华文文学与当地文化交流，以及华文文学如何与华人社会结合，提呈论文者在这两个课题上都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建设性意见，颇能引起与会者的兴趣。由于国情不同，客观环境有异，每个地区代表的论文都是以居留国（地）做出发点，大家所遭遇的难题和所面对的阻力不尽相同，解决之道自然也各有不同。但是，从整体来看，海外华文文学在不同的领域里互呈特色，可彼此的命运却是殊途同归。综合来说，大家的际遇有一些是共同的，譬如：

1、除新加坡外，海外各地华文文学都不被纳入国家文学的主流，须靠自身力量奋斗求生。

2、海外各地华人社会，一般上都是以经济挂帅，即使发展文化，也多半落在低层次的文化，文学领域便普遍被漠视。

3、华文文学作品没有销路，可供发表的园地又少，作家不能将写作当正业，往往为了生活中途退出文艺圈，使作家

队伍难以壮大，间接也影响华文文学的发展。

4、新一代对文学的认识不深，功利观念重，接班人很成问题。

海外作家一身兼数职

由于海外各地华文文学都共同面对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作家不可能像中国大陆、台湾那样享有专业作家的殊荣，更不可能心无旁骛地专职写作，不必理会创作以外的事务。除了新马，还有欧洲（瑞士、荷兰、德国、丹麦、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南美（巴西、智利）、北美（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地），作家本身在忙着找生活，业余凭爱好和志趣投入写作的行列，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利用有限的时间从事文运的推动工作，一身兼数职，到头来还被人当成“傻瓜”看待，试问世上还有什么行业比搞写作更清苦的？

马华文坛的情形，我过去曾经写了不少文章，其中苦况以为不足为外人道，谁知比起其他一些国家，我们的处境还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像赵淑侠，为了创设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她东奔西走，通过无数次越洋电话，把散居欧洲各地华文作家拉在一起，单是这份能耐，就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再看来自巴西的邓幸光，他为了“不愿做南美华文的末代作者”，不仅努力做一个耕耘者，还决心做南美华文文学的“传灯人”。以下是他在短短三年内凭个人坚韧意志力完成的几项骄人的成果：

1、定期召开会议，每次在不同的地点，由会友轮任主

席，并作专题报告。

2、举办四次郊游联谊，自备餐食或烤肉野宴，既以文会友，又活动身心，联络情谊。

3、出版《南美文艺》，以报纸形式付梓，每期六大版约五万字，普遍赠送侨胞阅读。

4、为会友的新著举行出书茶会，将义卖所得书款二千美金，全部捐赠华侨老人院。

5、鼓励担任华文华语教师之文友参加语文教师研习会，并在他担任总编辑的《华光报》出版特刊，发表提倡童诗的专文。更呼吁华文教师从事写作，指导并创作童诗。

前仆后继传承文化薪火

除了上述这些，邓幸光还号召会友参加南美洲华侨社团第一届年会，负责大会的文宣工作，每日出版快讯，撰写新闻发送各报采用，大事宣扬南美华侨的活动。此外，他也藉旅行之便，先后访问了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等地文友与文化界，并协助在华侨不上千人的智利成立作协分会。

如果说邓幸光是典型的文学“发烧友”，那么他这些年来焚膏继晷地为华文文学所作的奉献，应该可以看作是世界许许多多热心推动文运工作者前仆后继的一个缩影。到底是什么牵引着这些散居海外各地通过华文写作者传递民族文化薪火而乐此不疲呢？我想来自北美的简宛在会上说的一番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海外华文文学界一份浓郁的情意结。

她说：对许多侨居海外的华人，读华文、说华文、写华

文，是一份与母体相联的依恃，自有暖流串流心中的情怀。海外的生活，有许多的激荡，譬如生活习俗、文化冲击、精神压力，藉由文字的传递，在他乡的日子，能由陌生而熟悉，由困惑而开朗，由自闭而突破困境，这一切都是成长，都是胸襟的开拓。而这一切突破，皆来自文字的力量；经由文字的传递，舒解了愁绪，消除了悲风、自扰的困境，而向外伸展，相互认同，成了四海一家的以沫相濡之亲情。

韩国人对中文的情意结

这样的一份对华文文学的情怀，大概就是古代诗人所谓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番无怨无悔的情境了。而不单只是龙的传人如此，即或是非华裔，像许世旭，一位道地的韩国人，童少年时期从未在华文环境里度过的人，一朝和华文打上交道，三十多年除了母语，华文和华语便成为他须臾不可分离的第二语文。他在分组讨论时，谈到用华文写散文，有如隔靴搔痒，而用华文写诗，则觉得无比痛快；韩人不解问他：难道我们祖先也用汉字写诗吗？

许世旭于一九六一年在《现代文学》发表两首中文处女诗作，没想到一写便三十多年，他说他的中文诗是韩中“混血儿”，借中国的文字和模型，抒他自己高丽的情怀。在他最新出版的一本诗集《东方之恋》中的一首《长安追思》，其中几句很可以看出他这份依恋中文情怀的一斑：

我走在小胡同的
非常唐朝的石板路，
忽然想起了先父

因而幻听着他的嘱咐。

“吾儿呀！

你去唐国留学

多多观摩中原文物吧！”

除了学习功课之外。

曲曲折折

经过三十多年的风云

我终于应邀来长安

翩翩悠悠地阔步着。

(1996年1月17日载于《南洋商报·南洋副刊》)

华文文学自我肯定

——世华作家大会侧记之五

第二届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大会，经过三天的地区报告、提呈论文、分组讨论等事项后，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顺利的通过了十一项提案，主要是：设立世界华文作家资料馆、出版华文创作专集及计划成立世界华文作家出版公司等。

设立作家资料馆，对于提高作家士气，给予尊重以激发创作潜能，肯定会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问题是资料馆设置在那个国家较适合，以及如何筹集资金建馆和应付常年维持费用，都是在落实计划前需要给予周详策划。

至于成立出版公司，目的是要以实际行动协助作家克服在出版和发行上面的难题，为华文文学开拓国际市场，从长远来看，不啻是改善华文文学界窘迫处境的一个良策。但是，和设立资料馆一样，它也面对筹措基金，还有公司组织结构和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评审制度等棘手问题。倘若没有妥善制定实施计划，以文人从事商业活动多“无疾而终”的情形看，这样一个新构想实在很难寄予厚望。

没有中国代表与会的遗憾

会议也决定在尚未有作协组织的地区，像大西洋、中美洲、和非洲等区域设立协会，并以团体名义加入世华作协。目前，世华作协共有七个属会，计：亚华作协、北美洲华文作协、欧洲华文作协、南美洲华文作协、加拿大华文作协、澳华作协和纽华作协。

根据世华作协章程，有关会员的条文是：本会会员以世界各国华文作家社团为对象，不接受个人会员之申请。

大会也通过一项宣言。宣言指出：本次大会的召开，旨在促进华文文学的发展，期藉与会代表的集思广益，就如何推动本会会务，如何使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由全球的华人社会，融合于各地区、国家当地的文化及社会中，以展现华文文学兼容并蓄、崇尚自由、和平、博爱、乐观、进取、尊重、分享的活力与特色，进而发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学、文化、文明的发展。

宣言也指出：我们崇尚自由、和平、博爱，我们对全世界各地区国家的文化、文学都充满了敬意，我们认为唯有人类社会相互尊重、包容，才能激荡出现代社会的文明，才能创造出富有真、善、美的文学，因此，本次大会与会的全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在此恳切的呼吁：全世界各地区国家都能化干戈为玉帛，化解仇恨迎接充满文学、音乐、艺术的文明世界。

从三天来会场上洋溢的友善、温馨和热烈讨论的气氛看来，这次的会议是成功的。只是，美中不足的，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龙头大哥”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位代表与会，有

嘛，也只见到两名省级出版社人员以观察员身份列席，这与标榜“世界华文作家”的大会，在情在理似乎都难以自圆其说，其代表性多少也难免会受到质疑。

翻译工作没做好

文学作为文化艺术的一环，本来应该超政治、超种族和超地域，为全人类的精神文明服务，属于全人类共同的资产。基于这个原则，我们由衷地希望世华作协，根据其章程总则第二条所强调：“本会以联络世界华文作家，交换写作经验，促进文化交流，培养年轻作家，提升华文文学创作水准，增进国际地位为宗旨”，设法让中国大陆的作家协会将来也能组团出席世华大会，贯彻“世界华文文学一家亲”的团结和互助精神。

此外，大会在“宣读论文”的时段里，好多位作家提到翻译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热烈讨论。来自法国的柯国淳对于中国作家一直徘徊在诺贝尔文学奖大门外，认为是翻译工作没做好所致；他建议港台方面设立官方机构，有效地进行优秀作品的翻译工作。

小说家赵淑侠则以瑞士的情形为例，她说：她初时想加入瑞士作家协会，可是没有翻译作品，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只好请专人翻译，作品让他们看得懂，才能打入他们的圈子。在欧洲，这方面的翻译人才多，可是需要大量金钱。欧华作协就是面对经济的问题。

韩国许世旭也以他的双语经验谈翻译，他认为中国作家若要角逐诺贝尔奖，得请名家认真翻译他们的作品。为了提

高翻译的素质，他建议设立翻译中心。

设立世界华文文学大奖

针对提升华文文学的国际地位，新加坡作协会长黄孟文博士提出他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华文作品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牵涉的方面很多。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他问道：为何华文文学本身不能自设类似诺贝尔奖的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这样子，不必等待人家来赏识，我们首先就可以肯定自己。

来自美国的张凤同意黄博士的论点，她觉得作家应该为正义真理而写，至于得不得奖那是次要的事。

赵淑侠则坚持本身的意见，她始终认为华文作品要打入世界市场，作家不能忽略翻译的重要性。针对黄孟博士的建议，她表示在本身的领域里无论设多少奖，可是人家不知道，不像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后马上举世闻名。

美国的另一位代表周匀之则谈到华文文学书籍的出版和销售问题。他主张设立基金会培养专业行政人才，使华文文学作品有效地出版，让作家能专心一致地写好作品。而作家应该注意作品的市场价值，最好能写出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市场价值的作品。

总的来说，这回的亚华和世华大会，从场面的壮观、人数的众多、会议日程表安排得有序和紧凑、各个阶段开始和结束都能依照时间表进行，令出席者不只是为了开会而来，实际上还有实质的收获。往常这这类国际性的文学会议，当轮到论文宣读时，往往只见代表们上台照本宣科，令台下的听众感到枯燥烦闷、索然无味。而这回大会给人的印象，已

然有“一新耳目”的感觉。由于主持人（赵淑侠和邓幸光）擅于控制场面，每位主讲人严格限制十四分钟的发言时间，令“长气者”无用武之地，也腾出一些时间让台下的听众有机会发言，使整个会场充满热烈的讨论气氛。从头到尾都没有冷场的局面，堪称是一次“质量颇高”的文学盛会。

（1996年1月18日载于《南洋商报·南洋副刊》）



微型小说开拓世界市场

——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小记

第一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于1994年12月27至29日在新加坡圆满成功举行。

这项由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与《联合早报》联合主办的盛大文学集会，邀请了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澳洲、日本、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汶莱、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十余国家和地区约五十名学者与作家赴会并发表论文。其中阵容最大的是中国，出席人数多达二十位，包括《四海》杂志总编辑白舒荣、文联出版公司副总编辑谷守女、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江曾培（也是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刘海涛、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昆、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凌芝、《小小说月报社》执行主编张记书、福建华侨大学中国文化系副主任黄万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王振科、《海口晚报》副刊部副主任廖怀明等。台湾方面也有五人代表与会，他们是：郑明娟教授、陈慧桦（陈鹏翔）博士、周昌龙博士、林绿（丁善雄）教授和戴维扬副教授。

新马两国的出席代表共有九人，新加坡方面是：贺兰宁、怀鹰、董农政、林高、黄孟文和王润华。马来西亚则是：朵拉、孟沙与陈政欣。

东合地区的代表，计有泰国的司马攻、印尼的郑远安、菲律宾的杨美琼与黄珍玲。

来自日本的著名中国和日本微型小说比较研究专家渡边晴夫，也受邀出席大会发表论文。论文全以华文写出，讲题是：《日中两国微型小说交流的一端》，他目前在日本担任长崎大学中文教授。

另一位日本代表是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学者荒井茂夫。他们两人都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

研讨会一连三天都在新加坡国大校园举行，由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主持开幕。他在致词中表示，新加坡作家在微型小说的发展上所作的努力，证明了他们也像从事工商业的企业家，已展开第二双翅膀，飞向海外，向世界开拓文学市场。

事实上，新加坡作家协会这些年来致力推动微型小说的创作，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例如1992年创刊的《微型小说季刊》，已成为世界各地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发表著作的重要刊物；同时，该会在过去几年内也一连主办两届“东合华文微型小说比赛”和协办“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得热烈反应。此外，该会还在去年（即1993年）初出版了一本集世界各地华文微型小说大成的《微型小说万花筒》，受到各方好评。

研讨会联合工委主席王润华博士在致词中认为，文化

艺术的建设，应从校园与社区开始，才能全面带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因此去年六月的“廿一世纪文学创作”文艺营和“首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都选择在国大校园举行。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是这项国际研讨会的大功臣。他在献词中希望通过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家与学者的共同努力，把这个小说家族中的“幼弟”抚养长大，以便能和其他类型的文体并驾齐驱，昂首前进。

在开幕仪式上致词的还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江曾培。他说：“微型小说的迅速兴起，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由于短小精悍，贴近生活，由于从小见大，以少胜多，它越来越受到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的欢迎。

“不过，由于微型小说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独立文学品种，根还不深，叶还不茂，在数量迅猛发展的同时，极需在提高质量上多下功夫。这就需要对其创作经验进行研讨总结，以便反过来指导创作。”

一连三天的研讨会共有七场论文发表会，课题包括下列四项：

- 一、世界各国／地区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与成就；
- 二、微型小说的理论与艺术技巧；
- 三、华文微型小说与现代社会；
- 四、世界各国／地区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及其作品。

在最后一天的自由交流座谈会上，与会的百余名学者，作家与文艺界人士热烈针对微型小说一些论题发表意见。大会也宣布次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由泰国接办，泰华著名作家司马攻当场表示欣然接受。

艺术的建设，应从校园与社区开始，才能全面带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因此去年六月的“廿一世纪文学创作”文艺营和“首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都选择在国大校园举行。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是这项国际研讨会的大功臣。他在献词中希望通过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家与学者的共同努力，把这个小说家族中的“幼弟”抚养长大，以便能和其他类型的文体并驾齐驱，昂首前进。

在开幕仪式上致词的还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江曾培。他说：“微型小说的迅速兴起，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由于短小精悍，贴近生活，由于从小见大，以少胜多，它越来越受到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的欢迎。

“不过，由于微型小说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独立文学品种，根还不深，叶还不茂，在数量迅猛发展的同时，极需在提高质量上多下功夫。这就需要对其创作经验进行研讨总结，以便反过来指导创作。”

一连三天的研讨会共有七场论文发表会，课题包括下列四项：

- 一、世界各国/地区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与成就；
- 二、微型小说的理论与艺术技巧；
- 三、华文微型小说与现代社会；
- 四、世界各国/地区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及其作品。

在最后一天的自由交流座谈会上，与会的百余名学者，作家与文艺界人士热烈针对微型小说一些论题发表意见。大会也宣布次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由泰国接办，泰华著名作家司马攻当场表示欣然接受。

这次为期三天的微型小说研讨会，节目安排紧凑，每场论文发表会时间拿捏准确，完全按照议程表进行，堪称有条不紊。全体出席学者作家均分配在国大校园住宿，那里环境清幽，是个极佳的学术研讨会场所，与会代表除了参加既定的节目外，尚可私下自由进行交流，收获良多。

大会期间，主办当局还安排了两场“文学之旅”和“文学散步”，分别参观和游览云南园、晚晴园、牛车水、圣淘沙、花葩山、东海岸海滨公园等名胜地区。

亦庄亦谐的文学盛会

——第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纪实

第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六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掀开序幕，一连举行四天，至十九日宣告圆满结束。

这项两年一度的地区性文学盛会，自一九八八年发起以来，历时已过六年，先后举办了四届，首届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四日在新加坡举行，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办。次届于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由泰华作协和《新中原报》联合主办。第三届轮值在吉隆坡召开，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至七日举行四天，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办。这三届的文艺营，都能按期在两年内举行，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参加的人数也一届比一届多，对本地区的华文文学发展，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第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轮到菲律宾举行，由于菲国迄今尚无全国性文学团体可以独挑大梁，上届出席代表蒲公英（来自新潮文艺社）于是负责召集岛国十余个文艺团体聚商，嗣后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奔走努力，终于在今年七月中催生了此届文艺营大事。

对菲华文艺界来说，第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成功举行，也标志着菲华文坛由各据一方走向大团结的开始，对菲华文学今后的发展肯定会起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出席本届文艺营的各国代表以菲律宾为主，作为主办国，他们总共推派五十余位代表与会，阵容强大，其次是大马（七人），泰国（四人），新加坡（四人），印尼（三人），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届缺席的汶莱，这回首次派出四人代表团参加，使到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举办更名副其实，可说是这项文艺活动创始以来的一大突破。

七月十六日下午，亚细安各国代表陆续抵步，下榻马尼拉嘉登大酒店。是日晚上七时，筹委会特假巴比伦大酒店举行欢迎晚会，出席嘉宾逾百，场面热烈。晚会上，筹委会主席丁德仁，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作家学者：上海同济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的施建伟教授和台湾名诗人张香华女士，各国代表团团长均分别受邀上台讲话和介绍各团的成员，晚会气氛显得轻松和温馨。

七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半，文艺营正式开幕。菲律宾教育文化部副部长伊琳达白芳戈女士受邀主持仪式。伊琳达在演词中，谈到菲律宾当前教育的发展，向在座的各国友人作了一番有系统和扼要的剖述。

在开幕礼上，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焦点是：亚细安华文文艺丛书《菲华散文集》举行发行仪式。

从老作家林健民的介绍中，我们知道《菲华散文集》一书共收入七十多位菲华作者的散文作品。这些作者来自不同的流派和文学团体，一向壁垒分明，出版选集也往往各自为

政，此次以亚细安文艺营为契机，促成非华文艺界摒弃成见，携手合作，并以《菲华散文集》作为送给海外友人的见面礼，别有一番深长意义。

张香华力主文化输出

开幕礼过后，当天下午便进入第一阶段的讲座，由来自台湾的张香华女士和中国大陆的施建伟教授主持专题演讲。

张香华说的课题是：《从人口的输出到文化的输出》。她认为华人不应划地自限，只用华文写作。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不能用华文创作，只要他们受过中华文化的熏陶，不管他们用英文、印尼文、马来文或泰文创作，我们一样可以借助他们的语文能力，把华人文化输出去。因此，她建议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不妨考虑扩大“华文”文艺活动为“华人”文艺活动，以鼓励新生代华人后裔的参与。

张香华的建议引起会场热烈的回响。马来西亚代表团团长驼铃首先对此提出质疑，孟沙接着提出另一番不同看法，认为亚细安各国的国情不同，华文文学发展的情况也不同，所谓华人文艺营的构想不见得能在每个地区执行，在现阶段，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无需要改弦易辙。而个别地区如果要扩大范围让不谙华文华语的华人后裔参与，其最终目标还是保留华文文化和华文文学，殊途同归，两者并行不悖。

施建伟谈亚细安模式

施建伟的讲题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亚细安模式的崛起》。他个人认为，“亚细安模式”是当前

海外华文文学中最有活力和最有前途的发展模式。什么是“亚细安模式”？根据施教授的见解，其强大的生命力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亚细安各国华文文学对多元文化传统的认同，适应了当地多元民族文化的社会环境；

二、亚细安意识的崛起，使华文文学在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上有了—个独特的，而且是明确的逻辑起点；

三、连续几届华文文艺营的有效实践活动，使亚细安模式在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影响，由于华文文学生存发展与各国当权者认可亚细安文艺营的活动，从而为六国的华文文学争取到一个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

他指出，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都有强烈的当地意识，要求参与国家文学的建设，或以“少数民族文学”的姿态，争取与主导民族文学共存于国家文学的大家庭中，而在文学作品中又都能在突出本地社会的本地特征的同时，继承了中华文化大传统的特色。

当天下午的另一个讲座是由菲华老作家林健民主讲《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使命》。他在论文中分析了亚细安成立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政经文化方面的进展，他希望华文文艺营的定期性和流动性的推动力，将能唤醒亚细安各国华人对华文文学的重视和重新认识。

当天晚上，作为第四届文艺营主办的新潮文艺社，为了配合这次盛会，他们特别选择开幕的当天举行成立十二周年庆典和新届理事就职典礼，同时也为社长明澈（吴彦进）的诗集《野水莲》举行发行礼。三喜大典，都集中在一个晚上

呈献，国内外文学界文艺界人士盍兴乎来，宴开数十席，其间穿插歌舞和卡拉OK的点唱节目，主客融成一片，其中欢乐气氛和热闹程度可想而知。

巨瀑奇观 歌声飞扬

到了第三天，即七月十八日，也是亚细安各国代表团最轻松写意的日子。这天一早，主办当局便安排旅游巴士载送二十余名客人游览菲律宾著名的旅游胜地百胜滩。

百胜滩以“巨瀑”名闻遐迩，经历长达四句钟的艰险旅程：乘梭形木舟沿着处处暗礁乱石的河道逆水而上，再聚集在木筏上冲过巨瀑，接受飞瀑流泉的当头淋泻，顿时有一种酣醜灌顶的痛快感。这么一段惊险刺激的百胜滩之旅，对初临贵境的我们，自然也带来这次旅途一次“毕生难忘”的回味。

游罢归来，惊魂甫定，随即便赶着赴菲华文艺团体的联合晚宴。

出席当晚宴会的有来自菲国十余文艺团体的代表。他们都先后上台发表简短的祝词。轮到各国团长讲话，大家都由衷地表达了“亚细安华文文艺一家亲的心愿，并祈愿菲华文坛将来会实现团结在一个共同旗帜下，为非华文学发展开拓新的境界！”

菲律宾人天性喜欢歌舞，菲华文人也不例外。像昨晚新潮社的庆典，今晚的欢宴，在简单的仪式和讲话之后，马上就进入欢乐的氛围里。晚会的重点还是落在联欢上，来自不同文艺团体的代表，既能讲，更能唱，他们一个个自告奋勇

上台献唱，热情而投入，在主人的带动下，印尼大马和新泰等国的“歌手”也有机会引吭高歌，宾主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歌声飞扬的夜晚！

华文文学市场成问题

大会的最后一天，除了宣读论文和地区性报告外，主要是亚细安代表团会议，检讨过去几届的议决案和商讨今后两年应办的事情，当然，更多人感到兴趣的还是：谁是下届文艺营主办国？

新加坡团长骆明在他的论文《亚细安华文文学及其发展》中提到：除了《亚细安华文散文选》，我们还可以编选小说、诗歌和理论集。同时在适当时候编写一本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发展史，那对于认识和发展这个地区的华文文学，应该是一项有用而且重要的工作。

他也建议将亚细安各地区华文作家的生平资料收集，有计划地编印成书。此外，每届的华文文艺营也应颁发亚细安华文文学奖，以表扬本地区杰出的华文作家。

菲律宾代表陈扶助（楚复生）提呈论文题目：《为华文文学献策》，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华文文学的市场问题。对此，他寄望中国大陆的出版商，书商和文学界的前辈从多方面推介促销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于此同时，他也呼吁华文写作界有远见、有雄心的企业家，组织一个资源足、信誉好的出版公司，专营大陆以外的华文图书，承揽印刷及销售业务，把好书介绍给各地区的书民手里。

在地区性报告方面，大马由孟沙主讲，他的讲题是：《马

华文学方兴未艾》，他说：目前正是文学界与华团结合力量共同为马华文学界开拓新境界的好时机。

他也谈到书籍出版之后的发行问题，是阻碍马华文学向前发展的一大绊脚石。他表示，华团如果有十分之一的单位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马华文学，酌量购买本土作家的著作，充实他们的阅览室，这一来不但可以为作家解决发行难题，又可给本身会员多些健康的精神食粮。

他充满乐观地认为，马华文学的前途是光明的，任何客观的阻力最终将能通过主观的努力去克服。

印汶华文文坛令人叹息

印尼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一向来都处于劣势。而他们文坛实际的情况又如何，对亚细安其他国家的友人来说，是讳莫如深的。这回的文艺营，他们总共派出了三人赴会。轮到他们作区域性报告时，三位代表都一齐上台讲话。其中以林万里的报告最详尽。他以自己居住的地方万隆为例，透露当地华文写作人只有五人，尽管客观环境恶劣，他们仍然设法出版一本名为《绿岛季刊》的刊物，在写作人之间流传，迄今已出版两期。

其次是女写作人晓彤。从她的简短报告中，让我们约略知道印尼华文文坛凄凉的程度。她说，印尼目前只有五十位左右文学爱好者，他们靠摸索自修走向文学道路，既没有指点，也没有交流，更没有创作比赛。而在客观环境限制下，他们不能随心所欲，不能写节令性文章，也不能提春夏秋冬。因此，印华文学水准偏低，自是无可奈何的事。

她也透露，印尼目前只有一间官方的华文报纸《印度尼西亚日报》，辟有文艺园地，是写作人唯一的投稿对象。

比起印华文学，汶莱的华文文坛也好不到那里去。根据他们的团长林璀璨的报告，汶莱国内没有华文报章，那里的写作者通常把稿件投到东马的报刊杂志发表，其次是新马两地。写作人虽有意组织华文作协，却不获当局批准注册，只好通过汶莱留台同学会附设写作组进行文艺活动。

他说，汶莱的写作人早期都是打游击的，只凭一时兴起，毫无计划和目标，时写时辍，这点和发表园地的稀少大有关系，而汶莱华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前期和后期的华文程度不平均，加以所阅读的多是外来的软性读物，自然使到汶莱的华文文学停滞不前。

下届大会新加坡接棒

在讲座的区域性报告结束之后，大会进行代表团会议。其中，下一届文艺营由哪一国主办的课题，引起在座的热烈反响。根据亚细安文艺营的宗旨，希望每隔两年在不同国家举行，使本地区华文文学界达到真正交流的目的。在六国之中，新泰马菲已主办过，迄今只剩印尼和汶莱两国尚未轮值当东道主，按理下一届的文艺营应在这两国之中作出选择。可是，当印尼和汶莱代表发言时，都表示在现阶段以他们所面对的种种主观上与客观上的难题，尚不够条件挑起大梁。

经过印汶二国代表的解释后，有人提出多种变通的方案，一时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最后由大马方面提议由新加坡主办下届文艺营，同时获得新方团长骆明的首肯，此一引

起众人关注的课题才达致决议。

此外，会议也通过下列两宗议案：

●接纳大马建议，授权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在两年内主办一项亚细安华文征文赛，体裁由主办当局决定，优胜者将有机会参加下届文艺营，并在大会颁发奖金。

●决定出版亚细安微型小说选，由各国代表组成编委会进行编选工作，在下届大会前出版。


在会议时，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驼铃提议，亚细安六国华文文学界应联合出版一份高水准的半年刊或年刊，以促进本地区华文文学的发展。这本是很具建设性的构想，可是由于这项计划涉及注册、出版、发行、经费等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作深入讨论，只好保留在下届大会提出探讨后给予落实。

为期四天的文艺营，于七月十九日宣告落幕。当晚七时，主办当局假喜来登酒店东海海鲜酒家举行别开生面的闭幕仪式。

这晚的气氛初时很凝重，特别是当仪式开始之际，全场灯光熄灭，与会者每人手中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在烛光中静静聆听台上由菲华文艺界歌手合唱的《友谊万岁》，想起分手在即，大家的心情都感觉无比地沉重。

闭幕仪式简单而庄重，先是筹委会副主席林健民致词，接着由筹委会主席丁德仁汇报会议成果，然后是下届文艺营的主办国代表骆明致词。他们的讲话都很简短，接下来便是各国代表团互赠锦旗或纪念品。

这个第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最后一夜，有肃穆的一



第二辑 马华文学踪迹

为有源头活水来

——马华文学70年来走过的道路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

马华文学的本质

马华文学是植根于马来西亚国土上的文艺花朵，尽管这株花朵长得不是很鲜艳美丽，甚至于有时还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却丝毫无损于它作为这个国度的特有产物的地位。

马华文学在本质上具有与其他地区同文同种的华文文学不同的特色，那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来自于这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它浓烈的地方风味与乡土背景，使它鲜明地与中国文学、香港文学、台湾文学以及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从形式到内涵上有了显著的划分。如果抽离以上这些主要因素，单只是强调文学的共性和世界性，马华文学别说挤入国际舞台，即使要成为本区域受人瞩目的一支文学奇葩，恐怕也不是一件易事。

从发轫至今，马华文学已经历超过70年的悠长岁月。它最初接受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洗礼，靠着无数先驱者辛勤拓荒耕耘，历经多少挫折和考验，才开花结果，为后人奠定稳固扎实的基础。从战前到战后，马华文学工作者都能配合当时的现实与环境，负起见证时代的历史与任务，诸如抗日运动时期的鼓吹救亡、惩戒汉奸、抵制日货、筹款赈济伤兵难民；日治时期为保卫国家民族献出生命；战后初期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殖民统治，喊出自由民主的呼声，争取国家独立；马新分家以后，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分道扬镳，笃实的文学工作者仍然坚守岗位，沿袭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保持它和华社血浓于水的密切关系。这些史实，都可以从马华文学作品里找到印证，虽然那里边没有一些人所渴望看到的“经典之作”，却也不乏可资后人鉴赏与参考的优秀作品，这点是不容低估或轻易抹煞的。

具开放性与可塑性

马华文学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的可贵一面。它既发扬本身文化的优良传统，复接受别的民族文学的影响，像运用的词汇，很多渗入马来语，增加其地方色彩，加上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兼容并蓄，反映本身独特的社会现象和乡土气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早在1929年，南来作家曾圣提就大胆提出“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铁塔”的口号，毅然走出象牙之塔，开始有意识地创作，作品充满南洋色彩，内容除社会性外，也多了一点反殖意味。只隔一年时间，铁抗也在他的论文集里，强调“采用直接素材反映马华

社会现实是第一义，描写非马来亚事物，纵使是自己最熟悉的，意义也较次要，前者是主，后者是客。”这样的言论，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正说明马华文艺工作者早在国家独立前20年，便已经朝向“马来亚本土文学”目标致力发展。

战前的马华文学，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一般作品都显得粗糙和幼稚，从保留至今的作品水平来评估，它们的史料价值远胜于文学价值。这在草创时期出现的“贫瘠”现象，不只是马华文学，任何一国的文学都没有例外。作为后人，当我们今天回顾马华文学初期的情况，当白话文学方刚萌芽的阶段，先驱者处在一个主观与客观环境均不利于文学发展的时空下，加上历史的局限，我们委实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看待早期那些不够成熟之作。反之，我们应该以宏观的角度，去肯定逾半世纪前“拓荒者”对马华文学所做的贡献。

在20世纪20年代或更早之前，一批从中国南来的文人，他们以侨民的身份到南洋谋生，初时都怀抱着侨民心态，身在海外，心却留在祖国，从他们所写的篇章可以看出，他们的感情仍是倾向中国的。后来随着时局的转变，他们对居住地越来越熟悉，流露在作品字里行间的思想感情，渐渐与土生土长的作者群认同，最终是摆脱前期怀念故土的侨民心态，而致力于建立马华文学的独特性。

和中国文学的渊源

马华文学一开始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有人甚至形容它是中国文学的分支，那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和历史因素使然，无可厚非。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现在马华

文坛的几场运动，像“南洋新兴文学”是响应中国作家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像“抗战文学”，实际上是响应中国本土的抗日救亡运动，都可以看出马华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渊源之深。

大批从中国南来的作家，是马华文坛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草创期的马华文学，很多是以中国为背景，或写男女之间可歌可泣的故事，或描绘封建制度底下受害者的悲惨遭遇；于此同时，当然也有不少作品是以本土为主，反映南洋群岛各地劳苦大众的生活、思想和愿望，以及城市工人在不景气和失业浪潮冲击下的不满现状倾向，一般上都有很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

总的来看，战前的马华文学，虽然写“此时此地”的作者不少，实践上也取得不俗的成果，然而整体上还是“侨民文学”占了上风。我们一般上称战前的马华文学为“南洋文学”，便有这样一层含意。到了20世纪40年代，经历一场血的洗礼之后，客观环境改变，中国政局出现新的变数，马中断绝邦交，两国人民不准自由往来，中国书籍严禁入口，致使马华文学一时失去依附，不得不开始正视本身的独特性问题。

走上自己的路

1949年一场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可以看作是“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也是马华文学正式走向自己的道路的开始。在客观局势的扭转和主观愿望两方面的因素冲击下，马华文学本质上起了变化，作品的本土意

识加强，呈现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但是，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的高压手段，言论出版的限制极严，一般写作者为免惹祸上身，都尽量回避政治课题与当前的重要事实。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马新社会，处在高度动荡不安的局面，马新人民反殖的浪潮澎湃，争取独立的呼声震于九霄，随之而起的，还有风起云涌的职工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反黄运动、独中纷纷反对改制等等，这一系列来自民间的社会运动，进一步唤醒了民族自觉，也为马华文艺工作者提供更多写作的题材，在马华文学史上，这个时期的创作成果，比较其他历史阶段都要来得出色，不是没有原因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写作人的涌现，这个时期的马华作品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文坛新人的创作，取材完全来自于马来亚社会，作品的思想感情也全然是马来亚人的意识。尤其在国家独立后，马华文学更打出“爱国主义文学”的旗帜，强调文学作品马来亚化，进一步巩固了马华文学独特性的理论基础，和前期的“侨民文学”，在精神本质上遂有显著的不同。

写实与现代之争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马华文坛，深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在许多报章副刊或杂志，出现大量的“现代诗”、“现代散文”和“现代小说”，形成一股现代派狂飙。鼓吹现代主义的作者群，他们主张“横的移植”，要切断和中国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他们也攻击服膺于现实主义的作者，不

屑“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态度，讥讽写实派作品陈腔滥调，语言无味。

其实，文学有流派并不是一件坏事，像五四时期，有文学研究会，走的是为人生而创作的路线，亦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派；同时也有创造社，主张文学应为艺术而艺术。除了这两大派，文坛还有倾向唯美主义的新月派、追随欧美颓废主义的现代派，彼此间尽管壁垒分明，但都能在良性的竞争情况下开拓文学事业，把中国新文学运动推展得如火如荼。如果以成绩论，鲁迅、老舍、巴金的小说，艾青、何其芳、臧克家的诗，朱自清、李广田、丰子恺的散文，曹禺的戏剧，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衡量，都不能抹煞它们在中国文学里的崇高地位。可是，像《阿Q正传》、《骆驼祥子》、《激流三部曲》、《大堰河，我的保姆》、《雷雨》等文学名著，有哪一部不是和现实主义紧密结合的产品？再看稍后的钱钟书、李劫人、孙犁、汪真祺以及当今红透中国文坛的张贤亮、贾平凹、王蒙、张洁、铁凝等人，他们的小说何尝没有打上现实主义的烙印？

任何一种流派都会有好作品与坏作品，现代派强调自我意识，不依循现实的客观规律，着重描绘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手法上力图推陈出新，从文学审美观点来看，如果作者的创作态度诚恳，在处理题材上又不脱离现实，这样的作品是应该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很可惜的，不少服膺现代派的作者，不从作品的深度广度下手，却一味在技巧方面大玩花招，本身既无深厚文学根柢，又缺乏虚心学习精神，对过去的历史漠然无知，加上人生经验贫乏，在这样脆弱的基础

上，你能期望他们写出什么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吗？记得已故新华作家苗秀曾经批评过这类现代派作者：“这群新的小说作者，和他们的前辈相异，他们不关心政治，亦无视文学作品主题的积极性。他们最感兴趣的无非是怎样用绮丽的文辞去编织出一篇美妙的故事，以娱读者。”他也指出，“这群新的作者，他们的文学修养不足，文学技巧锻炼亦未曾到家，因此写成的作品，连一个‘华’字也不曾做到，结果，这一时期的马华文学不少形式既不美，内容复空洞的作品。”

不能忽略纵的继承

现代派高喊“横的移植”，要向欧美和台湾的现代派大师取经，谁也不会反对；但是，我们也不可因此而迷恋“外国的月亮”，而忽略了“纵的继承”。马华文学的传统，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与文学，而中国文学大体上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传统里有好的成份，难免也有不好的成份，取其精华汰其渣滓，是我们做学问应有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传统中有些古老过时的东西，便断言传统都是不好的。现实主义也一样，它所以能发展至今，并没有在时代的洪流里淹没，反而得到发扬光大，自然有其可取的地方。有些年轻写作者不满现实主义太强调使命感，他们喜欢创作自由，不愿意受束缚，可是他们忘记了，连现代主义大师艾特略也说过：“伟大的诗人必须接受传统。”即以台湾的情况来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现代派诗人，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却一个一个往写实的路上回归，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马华文坛的发展，也是经历一条曲折的道途，在20世纪

60年代出现那种现代与写实壁垒分明的对峙局面，到80年代以后已逐渐缓和下来。今天的马华文学，已较少看到当年那类令人读了不知所云的伪现代之作，文坛的流派之争也不见了，写作人都能把精神集中在作品的素质上，这是成熟的表现，也是马华文学值得称道的事。

“文坛弃婴”需华社扶持

从国家独立迄今，已经过去将近40年头，马华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属性，已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可是，令人遗憾的，尽管马华文学工作者从过去到现在，为丰富国家文化事业上孜孜不倦地做出难以数计的贡献，到今天为止，马华文学仍然被排斥在国家文学的大门之外。虽然，作为全国性的文学团体，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曾经向政府发出多次呼吁和请命，最终都不得要领。我想，马华文学若要摆脱目前的困境，不单文坛同仁需要力争上游，也希望华社，尤其是爱护华教人士，大家一起关注和扶持这个和华小及华文独中具有共生性的“文化弃婴”，让它最终能和大马的华教一样地，在这块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土地上自由开花结果！

（稿于1996年8月13日）

荆棘满途话作协

——大马华文作协18年来奋斗始末记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前身为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成立于1978年7月29日，是马华文学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文学团体。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简称大马作协）在成立宣言里指出：“在约六十年的时间里，马华写作人在传播知识、发扬文化、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敢于反抗不合理的旧制度、勇于批判不正确思想的精神感召下，虽处于散漫的状态中，亦分头努力创作，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为马华文化，乃至国家文化，留下宝贵的资产，丰富了子子孙孙的精神生活，更成了推进社会的时代号手。”

宣言也说：“马华写作人在不同的时期，都能站稳立场，对本地区人民的生活、思想、乡土风貌、社会进展，作出各种不同角度的反映；并在抗日战争、反殖民地主义的独立运动时期，为维护马来亚人民的尊严，磨利了笔尖，向侵略者和殖民地主义者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在增进马来西亚各兄弟民族间的了解、和睦与合作方面，马华写作人亦本着

良知与正义的信念，鼓吹不遗余力。而对于腐蚀人心的黄色文化，更不犹豫的给予无情打击。这是马华文学优良的传统。”

大马作协成立的宗旨有五，即：

- 1、通过筹募基金或其他合法途径，促进文学理论研究，以提高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水准；
- 2、联络我国的写作者，以促进马来西亚文学的发展；
- 3、与其他语文源流写作者交换写作技巧和经验；
- 4、与马来西亚当代写作者保持接触，以了解国际间的文学发展；
- 5、维护会员的权益与福利。

在大马作协登高一呼下，全国各地写作者纷纷响应，成立之初，便有会员二百余人，声势浩大。虽然，在筹备阶段，有一些持异议人士在报章上吹毛求疵，作出种种不利于该会的批评与责难，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风风雨雨，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达致写作者共同的愿望：马华写作者从此有了自己的家。

大马作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是筹募文学基金，出版《作协文库》（一辑十二册）、《写作者季刊》（后改名为《马华作家》）；展开各项文学活动，如主办文艺营、读书会、讲座、研讨会、征文赛、文学史料展、诗乐欣赏会等，更举办“写作讲习班”，栽培新一代写作者。

十多年来，大马作协除了本身的活动，也参与全国各地团体学校的文学工作，像派员担任讲座的主讲人，担任各地征文赛的评审工作，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判等等；同时参与主

办校内的文艺营，提供讲师和导师，鼓励青少年积极进行写作练习。

以总的成绩而论，大马作协十八年来推行难以统计的活动当中，要以“写作讲习班”受到社会各方最多的好评，这个活动总共办了六届，参加的青少年文友总数近四百人，在栽培新秀方面，具有深远和积极的影响。此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催生的“马华文学节”，是马华文学史上破天荒创举，通过这个富有意义的盛会，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马华文学，使它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支持力量。

概括地说，大马作协十八年来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评述。

第一个六年（1978—1983）为奠基期

所谓万事起头难，大马作协在成立初期，既无经济基础，也缺少成绩公诸取信于世，需要的是默默耕耘，稳固根基，才能进一步寻求发展。因此，这个时期以搞好内部团结为第一要务，较重要的活动计有：第一届文学工作营，在波德申海滨举行；与《通报》联合主办短篇小说奖；出版《写作人季刊》和《作协文库》；与多个文教团体联办“国际文学讲座”。

文学工作营是开放给国内文艺工作者的一项文学集会，促进写作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作协《通报》短篇小说奖”是马华文坛由文学团体与报章携手联办征文赛的破天荒第一遭，而奖金之高（首奖5千马币），亦是东协地区首屈一指的。

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大事，还有该会发动筹募文学基金，举办马华文学史上罕见的“千人宴”，获得国内各界人士热烈响应和支持，募得款项达八万余元，为该会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第二个六年（1984—1989）为发展期

这时期的活动量增加，除了主办文学研讨会、出版《写作者季刊》、参与文教团体联办各种文艺活动之外，也向政府提呈备忘录，积极争取华文文学成为国家文学的主流之一。同时，该会也为广大的写作者请命，吁请华文报章杂志提高稿费，以鼓励写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从1983年起，大马作协为了培养新一代写作者及鼓励爱好文艺青年从事文学工作，与《南洋商报》联手举办“写作讲习班”，是马华文坛深受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个专为文艺青年而办的讲习班，反应热烈，在短短八年内总共办了六届，报名参加者人数将近四百人，可见它受到欢迎的程度。这个讲习班栽培了不少人才，其中一些已成为今日马华文坛重要作家，如李天葆、毅修等。而讲习班学员也成立本身的组织，名为“写作班同学会”，附属于大马作协，协助后者展开一些文学活动。

可惜的是，“写作讲习班”后劲不继，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迄今，只办了一届，便没有复办的迹象。

在这个阶段，大马作协与华社的关系又再向前跨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倡议的“马华文学节”，经过长时期努力奔走，终于看到了成果。在得到其他五大团体的支持合作

下，第一届“马华文学节”于1989年在吉隆坡隆重举行，为马华文学史写下新的光辉的一页。

配合文学节而主办的活动，计有颁发“马华文学奖”（得主方北方）、各种文类（诗歌、散文、微型小说、儿童小说）征文赛、文学研讨会、作家交流会等，每一个参与主办的团体至少负责一个项目，使推动和发展马华文学的担子，让文教界人士一起分挑，使马华文学扩大它的影响力，也是马华文学史上的一项大突破。

除此之外，大马作协在表扬老作家方面，还主办了二届“文学之夜”，即1988年的“源头活水文学之夜”（受表扬作家：韦晕、方北方和原上草）；1990年的“松竹长青文学之夜”（受表扬作家：林潮、翠园和云里风）。

第三个六年（1990—1995）为巩固期

这个时期，大马作协在华社形象已然建立，作为全国性文学团体，不管对内对外，其代表性已无可质疑。因此，它的一举一动，对整体马华文学，都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会务一般是沿着前期的发展步伐向前推进，像主办“马华文学节”、表扬作家的“文学之夜”、出版季刊和选集等，都是会务活动的几个重点所在。

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表现，要算设立“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出版基金”，进行较有系统的出版计划。这项计划获得社会热心人士慷慨解囊，总共筹得十三万余元。自1991年开始，总共出版了37部马华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翻译、儿童文学等。这项善举，既为会员提供出

书方便，也进一步丰富了马华文学宝库，称得上是马华文坛本年代的盛事之一。

在文学交流方面，大马作协于1991年5月的神州之旅，是马中建交以来第一个文学团体组团访问中国，深具历史意义。对于促进马中文学交流与联系，具有深远且积极的影响作用。紧接下来，两国文学界交往频繁，由大马作协与中国（北京现代出版社）合作编纂出版的三大册马华文学选集：《异乡梦里的手》（散文集）、《最初的梦魇》（小说集）、《阳光、空气、雨水》（诗歌集）也于1993年底顺利面市，此举也为马华文学开创了历史先河。

在这个时期，大马作协除了例常活动，还主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三届“亚细安文艺营”，并派代表团出席假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亚细安文艺营”与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华”及“世华”大会，加强与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界的联系，都取得不俗的成果。

检讨与展望

大马作协在过去十八年，经历无数挫折和打击，犹如一艘在汪洋里航行的船只，遭遇的是惊涛骇浪，稍一不慎，随时都有翻覆的危险。所幸的是，该会历届理事会都能精诚合作，加上全体会员给予的支持力量，使它在大马华社得以长久屹立不倒。

回顾过去，大马作协走过的路子，可以用“荆棘满途”来形容。我在《作协十年》特刊的献词中，曾经对大马作协奋斗的历史作过一个小小的总结，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

的：“十年的挣扎，十年的苦撑，认真书写出来，的确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里面包藏冷漠、辛酸、煎熬、嘲讽、打击，细加概括整理，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马华文学血泪史篇！”虽然这几年来的马华社会，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发展已有逐渐提升的迹象，加上国际形势的改变和中文抬头的优势，多少也让马华文学受惠，对大马作协在推行一些文学活动上，无形中比过去减少了许多阻力，可是就整体而言，马华文学处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写作者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仍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因此，要想彻底改换马华文学的面貌，就像要提升马华文学作品素质臻于国际水平，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可以办到的事。对于大马作协，如果把目标放在长远的将来，期望会取得更大的成果，那么，过去十八年的成绩尽管不是很理想，到底已经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以往的苦干和拼搏，其实还是值得的。

作为一个全国性文学团体，大马作协有需要在迈入一个新的世纪的关头里，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检讨本身的不足和缺点，然后配合当前利好局势，加强主观的团结力量，制造更多有利于马华文学发展的条件，以期走出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在达致这个目标之前，大马作协首先应该设法改善以下几个当前面对的问题：

- 1、会员的向心力、凝聚力不够强大，无法发挥它对社会的影响作用；
- 2、推动文运缺少主导思想，难以引领文学界掀起一股庞大的文学思潮或运动；
- 3、未能有效配合华教团体和华文报章，为马华文学开拓

新的发展空间;

4、栽培新一代努力有余，激励资深作家提高他们的创作
士气则显得力有不逮。

(稿于1996年9月，重修于1997年11月)

(此文刊载于中国《华文文学》1977年1月号)



热闹背后的隐忧

——一九八四年马华文坛扫描

一、小引

承续一九八三年度的蓬勃气象，一九八四年度的马华文坛，表面上尚能出现一片欣欣向荣。在某些领域里，像华团的协助参与推动文运，华巫文艺工作者进行对话和促进文学交流方面，显得比较往年有深一层的推进，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文学团体、文教界和报章的文艺副刊，仍然是构成文运川流不息的三个重要环节。文学研讨会、座谈会、征文赛的相继举行，报章副刊维持一定的发表园地，都为马华写作人制造和提供创作的机会。过去本地写作界所苦恼的耕耘地盘的问题，看来已逐渐获得改善。这也许是文坛表面生机持续不衰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华巫文学的交流

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局势的演变，华裔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远远落在马来友

族的后头，处境是越来越艰难。到了一九八四年，种族两极化的危机迫于眉梢，使原已式微的民族权益更见削弱，面对如此恶劣的局势，华裔社会普遍上都渴望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各个领域的开拓和发展，确保华社既得权益不致再沦丧。

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文教界。多年来，文学界不断争取马华文学纳入国家文学的主流，迄今虽未有结果，但是马华写作人这份苦心，配合华巫文学交流工作的积极进行，至少已引起马来文坛的关注，并且有了回响。

过去，马华文坛虽有人致力于译介工作，把马华文学作品介绍给马来社会，但却只限于个人行动，在作品的取舍方面，难免存有主观上的偏见，这多少也影响到作品素质的参差不齐。

如今，我们很高兴看到语文出版局在这方面伸出了触须。今年三月间，语文局正式成立四个翻译小组，以便将各族语文作品译成国文。而一个三人小组（吴天才、陈育青、年红）辖属于语文局翻译咨询委员会的华文组，亦开始征求马华小说与诗歌作品，俾能翻译为国文给予出版。

此外，语文局也在八月间为非巫人作者举办“文艺营”，有五位华族写作人受邀参加，他们是：陈育青、吴恒灿、叶新田、曾荣盛和年红。

还有，全国作家协会（Gapena）也宣布将于一九八五年颁发文学奖予非巫人作家，以鼓励非巫人从事大马文创作，虽然这项措施并不符合众多马华写作人的夙愿。

不管成效如何，华巫文学交流到底是一项迫切和需要落实推行的工作。以文学为媒介，促进各民族之间思想感情的

交流，达致亲善和团结，相信会比其他途径来得收效更大和影响更广。

三、马华文学史展余绪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间主办马华文学史料展览，展出期间，受到各地写作人的热烈捧场，反应不错。同年十二月中，新山中华公会接着承办，亦收到良好效果。

进入一九八四年，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马六甲中华总商会、吡叻中华大会堂以及峇株巴辖中华总商会先后接手承办，使到这项深具意义的史料展获在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在上述四地区的展出，其中以马六甲地区最受欢迎，其余各地，据说反应欠佳。

说到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组，对于文教事业的发扬和推动，一向不遗余力。近几年来，大会堂几乎每年都举办文化节，提供民间文娱和艺术团体演出的机会，耗费不貲，深获各界好评。而在推动文运方面，过去也举办了不少文学讲座和研讨会，同时联合作协举办第二届写作讲习班，都有一定的成绩。

此外，该会文教组也在今年十一月初主动邀请马来作家与马华写作界进行对话，俾能促进华巫文学作者之间的谅解。

因此，作为华社的领导机关，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庸置疑的。我们很欣慰地从作协去年度（一九八三）的会务报告中得悉，一项有关编纂马华文学选集的重大

计划，作协经初步取得大会堂文教组的同意，准备资助出版一系列文学选集，使马华文学的精粹部分最终能呈献予华裔社会，从而加强华社支持马华文学的信心。

然而，一九八四年过去了，我们始终没见到这项合作计划的下文，但愿不会胎死腹中，以免辜负广大马华写作人的期望。

四、双福文学节

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委员会于本年三月三日、四日主办“双福文学节”，是一九八四年度马华文坛一项颇受瞩目的重要活动，也是大马地缘性社团破题儿第一遭主办如此盛大的文学集会，值得传令嘉奖。

“双福文学节”的活动有下列几项：

- 1、颁发第六届文学出版基金；
- 2、举行历届获奖作品展览；
- 3、举行文学之夜；
- 4、举行文艺座谈会。

对于主办“双福文学节”的意义，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会长黄茂桐有很清楚的阐述。他希望通过双福文学节的系列活动，除了能引起写作界的良好反应，写出更多的佳作，并带动一些社团也举办类似活动，共同为建设民族文化做点贡献。

黄氏也指出，“在现阶段，正积极争取民族文化地位的时刻，不只要据理力争，更要通过实际的活动相配合，才能有效负起任务。”

我国语文出版局属下翻译咨询委员会主催的“各民族诗歌朗诵晚会”于本年四月六日假语文局文化厅热烈隆重举行，备受文教界人士关注。

这是一项促进各民族文学交流的晚会，出席晚会的各族人民把语文出版局文化厅挤得水泄不通。来自华、巫、印三大民族的著名诗人先后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一些团体也受邀参与诗歌造型等节目。

推动此项晚会最力的马来名诗人奥士曼·阿旺（他同时也是翻译咨询委员会主席）在晚会上，发表了精警感人的演词。他强调，“他族不是巫族的敌人，巫族更非华族或印族的敌人……暴行、贫困和对我们的不公平的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他说，“我们不是从政者，我们并没有想在选举中夺取‘座位’和职位。我们期望的是一个和平繁荣、互助互爱、和谐共处的社会。”

奥士曼·阿旺随后也邀请马华诗人吴岸和淡米尔写作人K·S·玛尼安一起上台。奥氏说“这是一个小象征，象征着我们的社会人民和谐、友爱和团结的意愿。”

吴岸在致词中，感谢语文局和所有热爱民族亲善和团结的作家和友好的努力，使各族写作人能在一起，共同努力，以祈望通过诗歌和文学，创造一个正义及和平的理想社会。

在晚会上，马来文组共呈献了十一项节目。华文组方面，有四位诗人先后上台朗诵他们的诗作。他们是：叶斌（美丽的夜晚）、吴岸（达邦树礼赞）、孟沙（吉隆坡）、端木虹（窗）。此外，大马福联青、新山宽柔中学、马六甲

培风校友会也分别呈献精彩的诗歌造型节目。

五、文学团体的活动、

甲、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

作为全国性的文学团体，大马作协在一九八四年度内，仍保持过去的热度和活跃性，除继续主办写作讲习班和文艺讲座外，亦参与华团推动文化的工作，提呈报告论文，派员出席社团学校的文艺活动，担任系列征文比赛的评审工作，同时也关注华教文化问题，对一些不利于华教的措施，配合华社的步伐，发表文告声援。在一定程度上，作协已发挥它的影响力，而逐渐受到华社的重视。

由于第一届写作讲习班取得可观的成绩，作协于本年度五月初至六月底，再接再厉主办第二届写作讲习班。为了加强推展此项深具意义的工作，除《南洋商报》外，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亦毅然加入协办行列，共同肩挑起推广马华文学的重任。

总共有七十二名学员获得结业文凭。这批文坛的生力军，从头到尾都保持一股高昂的学习情绪，并成立委员会作为日后联系的核心。他们也组成了编委会，收集学员们的佳作，从打字到编排到校对，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本八开本，份量约一百二十版的杂志式合集，终于在九月初如期出版。

在差不多同个时期，由作协、商报暨新山中华公会联合主办的文艺讲座，于四月十四、十五两天假座新山中华公会礼堂举行。

在一项以“为华人社会开拓新境界”为名的文化研讨会上，大马作协向华人社会呼吁，通过华社的群策群力，联合举办常年性的马华文学节，作为推动马华文学的主力，是一项深具建设性的倡议，已经引起华社和文教界的普遍关注。

作协也建议设立常年文学奖，每年由一个华人社团主办，负责筹划安排等工作，其余社团作为成员，分工合作，一起推动。

此外，作协也吁请华团尽速设立马华出版局（类似语文出版局的机构），有效地出版具有水准的马华文学作品。

在内部活动方面，作协今年内正式设立马华文学资料组，积极征求全国各地写作人的生平资料，并搜集各个时期出版的文学刊物和个人结集，以便整理归档，应付日后种种需求。

乙、大马华人文化协会

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策划多年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其中小说辑终于在一九八四年八月间面市，颇受文坛注目。

这本小说选集共甄选了五十四位小说作者的五十四个短篇。书前有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会长拿督黄昆福医生的《弁言》，温任平的《总序》和马仑的《导论》。

这本选集的作者和作品，按照秩序如下：温梓川（泰晤士河畔）、韦晕（他乡）、方北方（这就是生活）、姚拓（捉鬼记）、原上草（水东流）、巍萌（养鸭人家）、黄崖（老乡）、云里风（卡辛诺）、张逸萍（希望）、斌子（黑流）、黄戈二（蚁群）、宋子衡（蛋）、驼铃（十年之后）、菊

凡（我的伯父传）、游牧（龙山镇）、张寒（翻种）、萧冰（最迟回家的那一天）、温祥英（角色）、郑易（赛车场上）、碧澄（占锺）、梁园（太阳照在吡叻河上）、紫曦（大粒痣）、潘雨桐（冬夜）、年红（兄弟情）、马仑（静静的文律河）、马汉（打猎）、雨川（槟城八小时）、端木虹（谁是达刺玛拉？）、高秀（第二道符）、孟沙（担子）、凝秀（愆）、麦秀（球）、林之流（土地）、连铜（化外的一群）、绿浪（某种错误）、梅淑贞（泥浆）、李有成（印度）、李永平（拉子妇）、温瑞安（结局）、雅波（警察）、小黑（人鼠）、落叶（我们四个人）、文戈（沟）、李忆君（死世界）、商晚筠（洗衣妇）、张贵兴（空谷佳人）、潘友来（手指）、郑祖（抉择）、丁云（控告）、洪泉（猪的黎明）、何谨（夜宴）、叶谁（夜城猫）、诗悌（接力赛）、柯彬（舢舨舟）。

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吡叻州分会主办“全国现代文学会议”，于本年度四月十四、十五两日在怡保举行，规模盛大，是另一项引起文艺界关注的重要活动。

丙、南马文艺研究会

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多届“青年文学奖”，鼓励和提拔不少文坛后起之秀，这份功绩，有目共睹。

迄至去年为止，该会已主办了六届文学奖。第六届的得奖名单如下：

A、小说（王万才青年文学奖）

- 1、洪泉（柔佛）
- 2、岳白船（雪兰莪）

3、孙快雨（柔佛）

B、诗歌（黄文彬青年文学奖）

1、方昂（槟城）

2、丘梅（吡叻）

3、大年人（吉隆坡）

C、散文（萧畹香青年文学奖）

1、蒙路（槟城）

2、雅波（吡叻）

3、因心（吉打）

4、芸亦尘（柔佛）

此外，南文会也在本年度陆续出版多部会员的作品选集。

丁、吡叻文艺研究会

吡叻文艺研究会于十一月廿四日主办“马华文艺与国家建设研讨会”，是一项具有深长意义的文学活动。

据该会负责人说，主办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是希望探讨与论证马华文艺的过去建国过程中曾扮演之角色，并分析今后的任务与方向，使马华文艺工作者能更积极有效的参与建国工作。

这项研讨会邀请了文教界知名人士郭洙镇律师（高青）和马来诗人、国家文学奖得奖人奥斯曼·阿旺担任主讲。前者的讲题是：《马华文学的道路》，后者的讲题是：《文学与文学工作者》。

除了上述几个文学团体的重要活动外，一些地域性的文

教团体和中学府，也不落后，加入推广和发扬马华文学的行列。从分布地区的广泛和量方面的增加这两点来看，马华文学的工作队伍已愈来愈壮大，前景令人鼓舞。

六、论争

马华文坛的“风风雨雨”，比起往年来，一九八四年已较为收敛许多。这年头，有份量的文艺批评反批评都少见，一般上，惯写这类批评文字的作者，笔锋仍不免带着浓烈的“火药味”，对整个文坛只有破坏，并未见有什么好处。

伍良之在写作讲习班的讲稿《谈杂文》，因为引文中遗漏注明出处，引起有关作者不满而在报上大肆攻讦，端木虹出版诗集《湖的传说》，由于温任平一篇序文未收入集子里，引起一番争执。不过，这两场论争，波及幅度不大，至截稿时，似乎已意兴阑珊，偃旗息鼓了。

七、总结

综观一九八四年的马华文坛，虽说不上波澜壮阔，却也呈现多姿多彩的丰貌，令人对马华文学的前景还保住一丝乐观的期望。

自然，表面的“壮观”并不代表实质的充实。个别（或整体）写作人的“丰收”亦不能当成整个马华文学作品水准的提升，毕竟还要看创作的内容而定。

如果以这一标准来衡量，现阶段的马华文学仍然是处在青黄不接和有所缺失的。从主要的几个文艺副刊发表的作品

来看，主力仍然落在老中两辈的资深作者，新人的表现，始终瞠乎其后，未曾出现几位标青的作者。而在旧人当中，写来写去，勤于笔耕的，为数大约二、三十人而已，许多在五、六十年文坛活跃的老作者，偶尔“惊鸿一瞥”，大多数已不见踪影。这些人的“封笔”，假如是因为副刊园地不足的话，然则今天形势已渐有改观，这些资深作者是不是应该考虑重新“归队”呢？

另外一点，显而易见的，以“杂文”形式出现的框框文字，已有泛滥之势。许多写作人忙于填充框框，把原本致力的文体忽略了，或竟至放弃了，使到马华文坛出现一个空前的怪现象：“空谈”多，创作少。

我们不否认，杂文已然成为当今社会所重视的一种文体，许多现实课题，需要写作人及时揭发，带动社会舆论，使文学真正做到影响世道人心的有用工具。但是令人遗憾，好多写作人，以写作杂文为名，实际上却迷失了目标，走上“媚俗”的道途，在所谓“专栏文章”里，尽是传播低级趣味的调调儿，内容苍白，根本和时代和生活沾不上边，几乎已沦为“消闲文学”的地步。这是很可悲哀的事。

认真地说，一个笃实的写作人，倘若无法深切体认到本身所负的历史任务，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写出瞬息万变时空中与世人息息相关的时代面和生活面，去关心人类共同的前途，让文学作品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留下可贵的历史见证，而只一味为“多产”而写作，这样的创作态度，对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是并无实质的裨益。

因此，当客观的不利因素逐渐消减的同时，马华写作人

应扪心自问：在主观方面，我们可曾做出什么努力，去相应配合时代局势的变迁？如果我们不能认清目标，抱着有意识的创作态度，在作品里注入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长此以往，可能不幸会应验了友族写作者人所形容的：“马华文学尽是不入流的作品”，到那时，再谈什么马华文学的前途，恐怕都是多余的。

因此，在“热闹”的背后，马华文学出现的阴影和隐忧，还希望写作界人士知所警惕，并设法纠正偏差。

本文写作时间仓促，有关文坛动态资料的收集，仅凭报章的报道和记忆，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同时行文中一些个人看法，容有不妥之处，尚望文坛同道给予高明指正，以匡不逮。

（脱稿于1984年圣诞节）

（刊于《南洋商报》1985年元旦日特刊）

山高水远·云淡风轻

——一九九〇年马华文坛扫描

前言

一九九〇年的马华文学，基本上仍保持一定程度的活跃性。

一九八九年杪，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发起，得到雪隆中华工商总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大马留台联总、雪隆嘉应会馆与雪隆兴安会馆等五大团体响应支持的“第一届马华文学节”，是马华文学自有历史以来的破天荒创举。六大团体采用“化零为整”的方式，个别展开文学活动，其中有对老一辈作家地位的肯定和表扬，像“第一届马华文学奖”；有鼓励现役作家和新秀积极从事创作，像“全国微型小说奖”、“嘉应散文奖”、“兴安诗歌奖”；有加强文学理论建设工作、总结马华文学七十年来的业绩，和提供写作经验心得的论坛，像文学研讨会、作品展和作家交流会等。六大团体分头努力，声息相通，互相协调，从点到面，使马华文学的发展逐步推向新的高峰，蔚为八十年代各方瞩目的一项重点文化活动。

紧接着“第一届马华文学节”的高潮余绪，进入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不仅没有出现“难以为继”的窘境，反而贾其余勇，更上一层楼，进入另一新的境界，未来的走势仍然令人感到乐观。

除了华团介入发展马华文学的行列，九〇年的一大特色是：三大华文报章，《南洋商报》、《新明日报》与《星洲日报》也先后宣布对马华写作界提供优惠措施，包括提高文艺版稿费、拨版位给各文学团体共同耕耘，举办全团写作人交流会，出版文学集刊，主办文学奖等，都是令马华文学界振奋的好消息。三大华文报章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表示对文人的赏识和鼓励，这一连串有助提高马华文学素质的举措，肯定的，将会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作用。

然而，叫人深感惋惜的，在如此一片大好形势底下，《星洲日报》却爆发“甄供事件”，涉及写作人的自由创作和基本权益，震撼整个文坛。此一原本可以避免的事件出现，无形中使马华文学蒙上一层不利的阴影，诚为美中不足。

除了华文报章，文学团体方面，大马华文作协九〇年的几项活动，如“松竹长青文学之夜”、“客联小说奖”和“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计划，都受圈内人士关注。

除了作协，地区性的文学团体，数吡叻文艺研究会和砂华作家协会较为活跃。前者于年初宣布出版文学双月刊《清流》，为马华文学工作者提供多一个耕耘的园地，可喜可贺。

砂华作协是砂州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团体，一年来主办了两项大型活动，一为“第四届东马华文文艺创作比赛”，一

为“飞越生活营”，在提倡创作风气和栽培新一代写作人的努力上，取得相当不俗的成果。

另一地区性文学团体，南马文艺研究会，准备和新加坡锡山艺术中心合作，每年选印文集，介绍双方文友的作品，通过互相交流观摩，相信可以带动两地华文文学更蓬勃发展。

乡团协助推动马华文学方面，全团乡联青于九〇年再接再厉，主办“第三届乡青小说奖”，首名奖金提高到一万元，创下马华文学史征文赛奖金最高纪录。大马客联总会，也受到“马华文学节”的感召，毅然宣布和作协合作，主办“客联小说奖”，对马华文学界来说，客属联总的参与推动文学工作，是值得称道的事。希望这个财雄势大的组织，来年会继续主办类似活动。

在加强华巫文学交流方面，语文局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继前年出版巫译马华小说《这一代》后，九〇年宣布推出第二本马华小说集。这部集子，共收入十五名马华著名小说作家的作品，准备在年内出版。此外，该局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北岳文艺出版社签约出版华译马来作品，对促进马中文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兹将九〇年马华文坛发生重大事件，各华文报章、副刊、杂志、单行本的出版情形，各文学团体的活动，以及华社协助推动马华文学的表现等等，分别缕述如下。

（一）九〇年文坛大事

A、甄供事件

马华文坛著名杂文作家、作协理事、《星洲日报》前资料室主任甄供（曾任道）的一篇杂文作品：《要有八部天龙精神》，于三月五日在《南洋商报·作协文艺》版发表后，掀起轩然大波，是一九九〇年马华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星洲日报》以该文“抵触公司利益”为由，限甄供三天内解释不应受纪律处分理由。

针对公司的指控，甄供提出三项理由为自己申辩。第一、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作品，纯属个人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与公司无关。

第二、《作协文艺》是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的定期刊物，只是借《南洋商报》版位发表；他在《作协文艺》所写文章，是履行作为大马作协会员的义务，合情合理。

第三、他以甄供笔名从事文学创作，目的在于发扬马华文学，乃提高整个华社的精神面貌，不但未“抵触公司利益”，而且亦符合社长张晓卿上议员历来的主张。

但是，甄供的三项理由并不为《星洲日报》接受。馆方坚持他已“抵触公司利益”，随后宣布对他施予“半薪停职”的处分，并两度遭公司保安人员押离报社。他对馆方此举极为气愤，决定辞职以示抗议。

甄供在致给大马作协的投诉函中指出，《星洲日报》对他采取的行动，是一种迫害，已不是一宗纯粹的劳资纠纷问题，而是一种污辱作家尊严，侵犯人权的行為。

他说：“我编星洲的文艺春秋版十四年，从未听闻文人投稿给别报会受到所服务机构对付的事件发生。”

他又说：“《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上议员对外宣扬《星洲日报》要主办文学奖，以提高鼓励大马华文作家的地位和形象，但是，《星洲日报》编采部顶头上司却对公司里的华文作家百般欺压、羞辱、诬陷和逼害！”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接到甄供的投诉后，曾二度去函《星洲日报》，要求会见该报当事人了解真相，均不得要领。经过两次紧急理事会议后，达致议决，决定发表声明以示声援。

声明指出：

“写作人在国家宪法精神下，有权对国家社会各种课题发表意见，只要言论本身不触犯法令，不涉及人身攻击。”

“在一个奉行民主、尊重人权的社會，报社应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广开言路，鼓励写作人发表建设性言论，服务社会。”

“本会也希望有关报社珍惜长期以来与作家建立起来的互惠互惠的优良传统，以开明态度对待作家，避免侵犯彼等的创作自由。”

接着，马华资深作家方北方、驼铃、吴岸、端木虹、辜健智、年红等纷纷表态，对甄供遭遇寄以无限同情。

方北方说：“文学应该没有界限之分的，《南洋商报》也有雇员在《星洲日报》副刊投稿，却未见受到对付。何况甄供的文章是在作协的园地发表，理应不至于构成问题。”

驼铃说：“曾君在《星洲日报》服务了廿四年，一向埋头苦干，忠于职守，现在却突然被指作出了抵触公司利益的事情，莫非是一宗昧着良心的倾轧事件？”

吴岸说：“甄供此次因在别家报纸的文学副刊发表文章而遭致资方纪律行动对付，是极为不幸和令人震惊的事。身为马华文学界的一员，我认为我们应维护作家写作与投稿的自由权利，而作家的尊严更不应受到损害。”

端木虹说：“甄供事件是一项文学界的不幸和悲剧，身为写作人，尤其是作协领导人之一，我当然不愿看到类似的事件重演。”

辜健智医生说：“文学本来就没有界限，如果主管硬硬对文学实施限制，等于限制了雇员的心灵自由。……《星洲日报》前资料室主任甄供事件是第一个个案，馆方不应该这样做。”

年红说：“在一间报馆任职，而向别一家报馆投稿，是一项交流，写作人享有自由投稿的权利。”

甄供事件爆发后，国内所有华文报章都以显著版位详细报道，《星洲日报》针对作协声明作出澄清时，避重就轻，将“作协主席”和“商报高级编辑”两个不同职称等量齐观，指“在甄供事件上，《南洋商报》和孟沙是二位一体，孟沙是以《南洋商报》的利益为依归。”

作协主席孟沙针对这点反驳称：“作协针对甄供事件发表声明，乃依据紧急理事会议的方案行事，声明内容经过多位理事商议，并咨询本会法律顾问意见写成，是一份代表作协而非孟沙的声明，不容歪曲。”

孟沙也说，当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执行作协主席的任务时，其一切言行，乃向作协负责，完全和他的服务机构（《南洋商报》）没有关系。因此，所谓“《南洋商

报》和孟沙是二位一体，孟沙当然是以《南洋商报》的利益为依归”的说词，不仅歪曲事实，也是对孟沙和作协理事会的一项严重污蔑。

星洲指南洋干预其内部事务，并将争论扩大和牵扯到报业恩怨，此举显然是企图转移读者视线。南洋在总答复里，指出报馆站在为文化界同道伸张正义，竭尽报人的天职，已不仅属于员工纪律问题而已。

事件过后不久，作协举行常年会员大会，一致通过“吁请文艺界团结一致，提高华文作家的地位，并维护作家创作自由和尊严。”的提案，表达了众多写作人的心声。

B、全国写作人交流会

《南洋商报》于五月二十六日在联邦酒店主办“全国写作人交流会”，规模之盛大，场面之热烈，为近年来罕见。出席是日大会的文学界人士约二百人，来自全国各地。

在交流会上，四位文坛名家：方北方、吴岸、尤今和张景云分别主持专题讲座，方北方主讲《九十年代马华文学的发展方向》，探讨今日马华文坛之走向；吴岸主讲《马华文学的再出发》，探讨诗的文学；新加坡女作家尤今主讲《从游记来谈人物形象的塑造》，张景云主讲《文学艺术的极限》。

《南洋商报》总经理兼编采委员会主席郭隆生在交流会上作出下列几项重要宣布：

1、《南洋文艺》版稿费每千字提高五元，从十五元提高到二十元。

2、除了大马作协，也和南马文艺研究会、吡叻文艺研究会及砂华作家协会签约，定期在《南洋文艺》发表作品。

3、出版南洋文学，精选《南洋文艺》版佳作结集成书。

4、继续和大马作协合作，主办“写作讲习班”。

C、松竹长青文学之夜

作协为表扬老一辈马华文学工作者所作贡献，于八八年主办破天荒的“源头活水文学之夜”，受表扬三位资深作家是韦晕、方北方和原上草。这项深具意义的文学活动，在海鸥企业赞助下，假座首都联邦酒店举行，取得热烈的反响。

两年后，作协再度征得海鸥企业赞助，主办第二届文学之夜，表扬另三位资深作家：林潮，翠园和云里风。这项晚会定名为“松竹长青文学之夜”，于九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假吉隆坡天后宫隆重举行。

文学之夜节目重点在于介绍三位作家的生平和朗诵他们的代表作品，同时穿插多项文娱表演，由首都著名艺术工作者呈献。出席晚会的文友来自全马各地，以及工商界、文化界人士，济济一堂，宴开六十席，场面热烈感人。

作协在任主席孟沙在致词中指出，三位受表扬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曾经从事“孺子牛”的教育工作，当他们从教育岗位上撤退后，却都退而不休，仍孜孜不倦于写作。这份精神值得后辈学习。

他也以“岁寒三友”和众写作者人共勉，他说：“文人要靠他的作品传世，作品要写得好，必须是文格和人格两相结合达致的结晶品。”

作协为了配合这项文学之夜，特别出版纪念特刊，收录三位受表扬作家的生平介绍和代表作品，图文并茂，具有史料和参考价值。

D、第三届乡青小说奖

由大马榕联青主办的“第三届乡青小说奖”，奖金特优，设特优奖一名，奖金一万元，优秀奖五名各一千元，此外，另设推荐奖一名，奖金三千元。经初选后，共有十篇作品进行终审，由台湾作家司马中原，郑明利，陈慧桦三人评审，选出下列得奖作品：

特优奖两名（万元奖金均分）：《秋千，落花天》（李天葆）、《M的失踪》（黄锦树）。

优秀奖五名，即：《血肉砌成的太平》（雅波）、《家事》（瘦子）、《花嫁》（吴德物次）、《阿彩上学记》（庄魂）、《树精》（夏绍华）。

推荐奖一名：《十·二十七日的文学记实与其他》（小黑）。

配合上述小说奖颁奖礼，主办当局于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吉隆坡中华中学与《新明日报》及《中学生》月刊联合主办“青少年小说工作营”，内容包括文学讲座与专题讲座，计有：《小说的情》（郑明利），《小说里的鬼》（司马中原），《略论马华小说》（马仑），《小说的基本认识》（碧澄），《小小小说的》（丁云），《马来小说的认识》（吴恒灿），《青少年小说导读》（年红），《小说创作与我》（小黑、爱薇、姚拓）。

E、客联小说奖

由大马客属联合会总会主办、作协协办“客联小说奖”，于去年十二月公开征稿，今年四月中评审完毕，如期于四月二十八日在关丹中菁小学礼堂举行颁奖仪式。优胜名单公布如下：

冠军（五千元）：李天葆，作品：《桃红刺青》

亚军（三千元）：柏一（黄慧琴）。作品：《水仙花之约》

季军（两名，各一千元）：因心（雷健恩），作品：《杜鹃休向耳边啼》。岩沐（陈仰庄），作品：《红灯亮着》。

优胜奖（五名，各五百元）：

陈文瑞，作品：《空城记》

叶明璐，作品：《海阔天空》

唐珉（周学娇），作品：《信》

文征（郑世忠），作品：《风雨如晦》

怪客（陈少麟），作品：《伍》

优胜作品九篇，经由作协负责编印成书，书名《桃红刺青》。

F、《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

作协第七届理事会决定加强出版工作，通过经济上赞助，协助会员作家出版文学作品，以推动九十年代马华文学的发展。

这项定名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的计划，是作协继八十年代初期出版《作协文库》（一套十二册）以来的最

大规模出版计划，预计每年出版十二至二十本文学作品。凡是作协会员，均可提出申请，作品一经评审委员会核准，达臻一定水平，该会将给予出版基金。

这项出版计划消息公布后，立即获得社会各界人士鼎力支持，慷慨解囊，目前已筹获基金接近十万元之谱。

作协发表《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缘起中指出：“在步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日，作为我国华族文化重要的一环，马华文学，一如文化教育事业，正面对生存与发展的考验与挑战。”有鉴于此，该会有责任负起出版马华文学书籍艰巨使命，鼓励当代马华作家积极创作和培养新一代成为马华文学未来接班人。

因此，该会希望华社各界本着爱护华族文化与文学的热忱，继续给予该会经济上支援，使这项深具意义的出版计划得以长期持续不断推行。

G、《南洋商报》出版“南洋文学集刊”

《南洋商报》早在五十年代，曾有计划地出版文艺丛书，定名《南洋文库》，出版一系列本地写作人的作品，享誉著盛。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项富有意义的出版计划宣告中止。

进入九十年代，商报总经理兼编采委员会主席郭隆生在年中举行的“全国写作人交流会”上，郑重宣布将恢复出版丛书计划。结果，在短短几个月后，爱护马华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终于盼望到商报第一本文学集刊面市。

“南洋文学集刊”第一本书名：《钟声来自海底》，于

十二月十五日举行隆重发售典礼，各文学团体代表和文艺界人士见证了这项在马华文学史上具有影响作用的盛会。当天，认购该书的团体个人非常踊跃，反应令人鼓舞。

《钟声来自海底》一书，共收集了二十一首新诗、二十篇散文、和十二个短篇小说，作者包括王葛、林潮、翠园、萧村、云里风、端木虹、甄供、方昂、陈蝶、李忆君、傅承得、碧澄、方娥真、尤今、淡莹、诗葆、雅波、雨川等资深作家。书厚151页，每本售价五元。

H、语文局将出版第二部巫译马华小说集

鉴于第一本巫译马华小说集《新一代》反应良好，先后印了两版共五千本，销量可观，语文局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现正着手翻译第二本马华小说集。

该委员会选出十五篇发表在《祖国报》（Watan）马华小说，准备汇集成书。这十五篇作品及作者如下：

1. 《贼》（孟沙），
2. 《玻璃》（游牧），
3. 《迷茫》（碧澄），
4. 《芒果树、白蚁》（云里风），
5. 《相中人》（张弓），
6. 《丽娜》（李忆君），
7. 《行车岁月》（曾沛），
8. 《警察》（雅波），
9. 《雪嘉玛渡头》（潘雨桐），
10. 《神牌轶事》（陈政欣），
11. 《残局》（方北方），
12. 《铜栏里外》（端木虹），
13. 《明天没有了希望》（郑祖），
14. 《我们不回甘榜去》（爱薇），
15. 《现代人》（梁放）。

上述作品是由大马译创协会会员负责译介。译创会的秘书吴恒灿，他也是语文局各民族翻译咨委会秘书，除负责策

划和译介工作外，同时介绍马来作家作品在七家华文报章发表。华文报章拨版《文汇》，每期推介一位马来著名作家和其作品，迄今已出版了十六期，约介绍四十位作家和百篇作品。

I、《星洲日报》文学奖

随着首都六大团体举办“第一届马华文学节”后，华文报章也以实际行动响应支持马华文学，《星洲日报》年中宣布设立文学奖，旨在鼓励创作，发扬文学和传承薪火。

星洲文学奖总奖金五万元，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其征文种类和数额分配如下：

1. 报告文学奖，一名，奖金八千元及铜雕一座。佳作奖三名，各奖一千五百元及奖牌一座。

2. 小说奖，一名，奖金八千元及铜雕一座。佳作奖三名，各奖一千五百元及奖牌一座。

3. 散文奖，一名，奖金五千元及铜雕一座，佳作奖三名，各奖一千元及奖牌一座。

4. 新诗奖，一名，奖金五千元及铜雕一座，佳作奖三名，各奖一千元及奖牌一座。

5. 推荐奖，小说、散文、新诗组各取一名，每名奖金三千元及铜雕一座。

推荐奖只限推荐于九〇年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和《星云》版发表过作品的作者。

(二) 报章副刊、杂志、单行本

A、报章副刊

华文报章副刊一向是推动马华文学发展的重镇，九〇年也不例外。可惜的是，在目前的七家华文报章，设有文艺副刊的仅有南洋、星洲、新明和通报四家。另三家除在综合性副刊偶尔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外，迄今仍不见开辟文艺版。

在设有文艺副刊的四家华文报章之中，以《南洋商报》的表现最为出色，其次是《新明日报》，接下来才是《星洲日报》和《通报》。

《南洋商报》原有的《南洋文艺》版，今年仍维持每周二期，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推出，脱期的现象已不再出现。

该报九〇年的一大特色是：与国内几个文学团体达成协议，由各团体按期供稿，利用《南洋文艺》版发表会员作品，作协的《作协文艺》，南文会的《南马文艺》，吡文会的《吡叻文艺》，砂华作协的《砂华文艺》，均陆续组稿刊出。这一来，使《南洋文艺》扩大其作者圈，容纳更多地区，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真正达到开放门户的理想境地。

美中不足的是，在刊期方面，商报的文艺版仍嫌间隔得久了些，像《吡叻文艺》、《砂华文艺》和《南马文艺》每两个月见报一次，《作协文艺》每月出版一期，篇幅较长的创作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割爱，是颇为可惜的事。以商报的条件，增加文艺版刊期，应该不会有什么难题。如果每周增至四期，相信会进一步刺激文风的昌盛，对于马华文学的发展，必然可以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新明日报》在九〇年致力于发展马华文学，也是值得

称道的事。首先，该报继《南洋商报》之后，也和大马华文作协挂钩，每月拨出版位供作协发表会员佳作，接着，再与大马乡联青合作，由乡联青赞助稿费，辟设《乡青文艺》版，宣布提高文艺版稿费至每千字三十元。创下马华文坛报章副刊稿酬最高纪录。

该报原有的《沙洲》文艺副刊，九〇年易名为《新明文艺》。

值得一提的还有，该报为示支持爱护马华文学，凡本地作者出版著作，可免费在该报刊登新书介绍广告。

《星洲日报》的文艺副刊《文艺春秋》，自主编易人后，风格与前人相迥异，内容倾向现代主义，较多发表台湾作家的作品，本地色彩相对地淡薄。作者阵容有局限性，不能引起马华文学界的普遍共鸣，是它逊色于前面两家报章文艺副刊的关键所在。

《通报》一向有文艺副刊，不过在过去一年里出现萎缩现象，原有的《百花洲》版取消，仅剩《文风》版，每周一期（半版），作者多是青年写作人，水准不高。

砂华方面，华文报章相当重视文艺副刊，有的甚至开设两种以上，蓬勃的程度，比西马的一些大报不遑多让。

《国际日报》：每逢周日出版《星期文艺》，每逢周四出版《新激流》。

《砂劳越晚报》：周一刊出《牧庄》，周四刊出《艺苑》，不定期的《青线圈》。另有砂星座诗社文学双周刊，附在该报出版，每逢周一推出。

《诗华日报》：周一出版《艺林》，周四出版《幸福》。

《美里日报》：周日出版《竹原》，另一新副刊为《芦苇》。

《马来西亚日报》：周三出版《集园》，每月一期《诗潮之声》。

另外拨版给诗巫中华文艺社出版《文苑》。

《大众报》：半月刊《拉浪文艺》。

《诗华周刊》：《烟火》（星座诗社编）。

B、杂志

纯文学杂志，历史悠久的《蕉风》、作协出版物《写作人》以及砂华作协的《拉浪江》，在九〇年仍继续出版，然而，面对发行上的难题，销售网打不开，这三份大型文学刊物都是在艰苦的情况下支撑着，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蕉风》原是月刊，九〇年起改为双月刊，现代派气息依然浓厚，作者当中，不少来自海外，青年作者占的比例也相当大。

《写作人》改为书本型后，版面设计较前活泼新颖，作者绝大多数是该会会员，也容纳少数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脱期的情况仍然未见改善。一年来仅出版两期。

《拉浪江》文学季刊，自八八年创刊以来，脱期情况严重。一年来也仅出版两期。

在一片萧条声中，吡叻文艺研究会宣布出版《清流》双月刊，它以异军突起的姿态，一年里总共出足五期，算是纯文学刊物当中的佼佼者。这份三十二开书本型刊物，彩色封

面，每期七十二版，零售价二元。内容具有一定的水准，参与耕耘者包括马新港台中国大陆名家。

青少年刊物方面，《清梳小站》仍继续出版，这份十六开本期刊，一年来出了四期，每期四十版，印刷量每期三千五百本，每本售价一元五角，内容颇能迎合年轻人口味。此外，《椰子屋》和《中学生》月刊都照常出版，其中以后者的表现最出色，销路也最可观。

在柔佛州，麻坡的“21图书坊”，于九〇年一月出版《麻坡文艺》专辑之一，迄今已出版两期，多属青年作者的作品。州内多间国民中学，一年来仍继续出版各校华文学会编选的校刊，校园文艺显得相当蓬勃。

C、单行本

1. 小说集：《讨海人》（郑祖）、《红尘有唤》（杨川）、《前夕》（小黑）、《痴男怨女》（李忆若）、《南归》（碧澄）、《梦里前生》（徐流）、《千秋·落花天》（李天葆等）、《桃花刺青》（李天葆等）、《彩笔下的世界》（碧澄编）、《水楼台前的曹长安》（陈绍安）。

2. 散文集：《燃烧集》（林潮）、《黑白之间》（杨丹）、《神伤中国》（杨白杨）、《美丽的童年》（姚拓）、《一马当先》（伍良之）、《坐井集》（马汉）、《茶与咖啡》（永乐多斯）、《没有鸡啼的黎明》（慧适）、《闲情集》（古寅）、《一点心》（黄学海）、《教余散笔》（四维）、《看扁作家》（唐林）、《我的学生时代》（沈玉池）、《不冷的雪糕》（林思维）、《黑白双雄》（菁

燕)、《慕向晴风》(李福喜)、《杜鹃花开着》(郝毅民)、《还是要战》(有明)、《浙沥的檐雨》(何乃健)、《班荅谷灯影》(何国忠)。

3.诗集:《脚步的诱惑》(彼岸)、《千山我独行》(庄延波)、《渔人的晚餐》(王涛)、《沸反盈天》(碧澄)。

4.评论集:《毕竟有声胜无声》(戴小华)、《杏坛内外》(邓日才)、《墨笔丹心》(陈雪风)、《语文春秋》(彼岸)。

5.合集:《钟声来自海底》(王葛等)、《舒卷有余情》(程可欣编)、《让声浪在风中激荡》(大专青年系列之三)、《青灯是一种美丽的叹息》(马盛辉)、《五湖边的乡愁》(水兴浪)、《雪泥鸿爪》(田思等)、《岛上青梳》(合集)。

6.儿童文学:《怒海余生记》(马汉)、《南文会少儿丛书集第一集》(年红)。

7.其他:《菩提林》(苏清疆)、《不巧的眼》(姜联招)、《拈花集》(黄学明)、《细水长流》(继程编)、《筏》(继程)、《湖畔跫音》(颜龙章)、《四四五天扣留营岁月》(柯嘉逊著、春山译)、《行到水深处》(马大华文学会)、《爱不起来的爱城》(周嘉惠)、《吡叻洞八景诗集》(张英杰编)。

(下略)

(脱稿于1990年12月下旬)

(刊于《南洋商报》1991年元旦日特刊)

风卷云开晴方好

——一九九一年马华文坛扫描

前言

一九九一年的马华文学，延续前期发展的余绪，在既有的基础上前进，大体来说，这一年的文坛气象，仍然波涛起伏，呈现绚烂景观。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马华文学觉醒时期，除了文学团体，国内一些较具规模的乡团也加入参与推展文学活动，使马华文学的影响层面扩大，为本地写作人提供稍微有利的创作条件；然则进入九十年代，我们看到了承继上个年代末期的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仍然保持它的欣欣向荣的秀态，历久不衰，在马华文学史上，这无宁说是一个“奇迹”。

而从马华文学迄今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否定了一些人抱持的“难以为继”的论调，也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事实：要成就任何一桩涉及族群权益的大众事业，必须要理论和实践两相配合，缺一不可；文学事业同样不能例外。这个社会，存有“等待果陀”心态的人士虽然不少，然而幸运的，在芸芸众生里也并不少坐言起行的“傻子”，默默忍辱负重地承挑

着时代社会所付托给他们的使命。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可多得不胜枚举！

再拿近几年来马华文学活动和早期比较，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任何一项活动，若不是凭藉群体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很快便出现“五分钟热忱”，昙花一现，过后又回复旧观。尽管有人非议结社的弊端，尤其对文人的结社更视如洪水猛兽，可是这些人到头来毕竟还要承认，团体永远是超越个人恒久存在的！

就以马华文学节为例子，这个在八十年代末期为马华文学改写历史的大规模活动，便是一个靠群策群力取得成果的最好说明。除了作协，像雪隆中华工商总会、南大校友会、留台联总等团体，在华社工商文教领域里，一路来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团体肯出来和作协并肩作战，为马华文学事业作出贡献，不论着眼于那一个角度，如此的合作方式，对马华文学的前途都是有利无弊的。

这个两年一度的文学盛会，八九年首倡先河，九一年继往开来，而且联办团体从六个增加至九个，显示一届比一届进步，足以鼓舞加强后继者的意志和信心。

环顾一年来的马华文坛，莘莘大端的活动除了第二届马华文学节，还有大马作协的组团访问中国，为马中文学交流竖立新的里程碑；《星洲日报》的“花踪”文学奖，既鼓励更多有志从事文学创作人士参与笔耕行列，必然也会进一步提高马华文学的素质；作协推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为本地写作人提供出版机会，势将催生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以丰富马华文学的宝库。

(一) 九一年文坛大事

A、第二届马华文学节

本局的联办团体共九个，除上述几个外，尚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隆嘉应会馆，雪隆兴安会馆，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和大马客属公会联合会。举办的日期从十一月十六日至廿四日在嘉应会馆和陈氏书院举行。活动共有十一项，计：

1. 第二届马华文学奖
2. 马华文学展
3. 马华作家交流讲座会
4. 面向九十年代华文文学研讨会
5. 第二届全国嘉应散文奖
6. 微型小说征文赛
7. 儿童小说创作奖
8. 全国兴安诗歌创作赛
9. 客联小说奖
10. 赵淑侠文学讲座
11. 作协董总新书推介礼

马华文学节参与的九大团体，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个别承担主办一项或多项节目，各司其责，却又相辅相成。譬如其中几项征文赛，有关主办单位早在年初便开始筹备工作，到了文学节，都已成绩揭晓，这时，连同别个团体的活动一起举行颁奖礼，既节省人力物力，又能增加节目的热闹气氛。表面上是化整为零，实际上却具有“统筹统办”的意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马华文学节以后不仅可以继续举办下去，且相信会愈办愈出色。

文学节从各项征文赛颁奖礼开始，接着是马华文学展、文学讲座、新书推介礼、作家交流讲座会、研讨会，直到颁发第二届马华文学奖，一步步推向高潮。整体来说，这一届文学节的表现比上届更为出色。

配合这项文学盛会，文学节工委特别出版一本特刊，内容包括各项文学活动的介绍，足为文学史料珍藏。此外，雪隆中华工商总会也出版第二届马华文学奖专辑，南大校友会与雪隆嘉应会馆则分别为微型小说创作赛和嘉应散文奖二项征文赛优胜作品出版单行本，深受文学界人士欢迎。

B、作协访华团促进马中文学交流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于今年五月底组团访问中国，是马中建交十多年来破天荒创举。大马政府于九〇年宣布全面取消访华限制，并欢迎中国人民来马探亲观光，作协把握良机组团访华，从广义来看，也是扮演着“文学大使”的角色。

访华团在中国短短两周期间，先后在桂林、西安、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和厦门等地会晤了当代许多知名作家和文学团体，举行座谈会，交换有关两国文学讯息，建立友谊和促进了解，对今后发展两国文学的联系交流工作，无疑已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作协这项历史性的访华活动，马中两国政府都极表重视。离马之前，交通部长林良实和文化旅游部副部长陈广才以及中国驻马大使馆临时代办龚沪生分别为该团出版的特刊发表献词，预祝访华之行成功。在北京期间，中国文

化部副部长刘德有也特别会见访华团成员，指出作协团此行在两国之间架起了民间相互了解相互友好的桥梁，相信今后在这个桥梁上来往的两国人民会越来越多。

作协团这趟神州之旅的最大收获，应算是会见了冰心、艾青、萧乾、柯灵、辛笛、秦牧等约四十位当代著名老、中、青作家。同时，在和北京的中国作协以及上海的作协分会，广州的归侨作家协会的座谈会、交流会上，双方也达成了共识。除了彼此交换出版物，也希望两国作家的作品能互相交流，刊登在对方的刊物上。

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期，由于客观环境，马中两国的文艺界缺少联系，因而除了广州的归侨作家，普遍上，中国文学界对马华文学的了解少之又少。一旦有了接触，通过访华团获取许多有关马华文学的资讯后，他们对于马华文学的发展感到惊讶和兴趣，自是可以理解的事。

目前，中国好多地区大学府，如广州暨南大学、汕头大学、福建厦门大学，都设有研究马华文学部门，四川、辽宁、江苏等地也有人收集马华文学作品史料，从事研究马华文学工作访华团在上海、广州等地，也见到了几位为马华文学界熟悉的学者和作家，如王振科、钦鸿、邵德怀、潘亚曦、马阳、米军等。

C、《星洲日报》主办“花踪”文学奖

《星洲日报》于今年四月十四日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第一届“花踪”文学奖颁奖礼，是今年度一项盛大的文学活动。

这个总奖金高达五万元的文学奖，共设四个项目，计：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与报告文学组。除了报告文学组，其他三组还增设推荐奖一名，颁发给有优越表现的现役作家。

据该报负责人解释，文学奖取名“花踪”，是象征着一个文化意念，即“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迹”，它的宗旨是鼓励创作，发扬文学和传承薪火。

在“花踪”文学奖颁奖礼前后，该报也举办了“花踪”国际文艺营，以及巡回文学讲座，邀请来自海外的於梨华、痖弦、陈瑞献、英培安、王润华、淡莹、原甸等主讲深受文学界关注，反应热烈。

紧接着，该报于十一月杪，又邀请来自台湾、香港两位名家黄春明与李怡主持由该报主办的“花踪”文学讲座。这项文学讲座先后在隆、甲、怡、槟、新山、古晋、诗巫、美里等地举行，吸引了不少爱好文学人士出席聆听。

该报社长张晓卿也在文学讲座上宣布，明年继续主办“花踪”文学奖，并将增设“世界华文小说奖”，以协助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

D、《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面世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于一九九〇年设立“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出版基金”，第一辑十二本著作，于第二届马华文学节期间陆续出版。在同个时间内推出一套十二册丛书，在马华文学史上尚属首次。

这套丛书能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推出，应感谢来自热心

商家和慈善家的慷慨解囊，使作协出版基金在半年时间里筹获十三万余元，为作者解决了不少出版上面对的经济难题。

为此，作协特别在马华文学节期间举办新书推介礼（配合董总出版的由方修编纂《马华文学作品选》一同举行），邀请文教界与写作界人士参与其盛，并恭请教总主席沈慕羽主持推介仪式。

十二部著作的书目如下：

- 1.《日安，库斯科》（韦晕著·小说集）、
- 2.《马华文学的再出发》（吴岸著·评论集）、
- 3.《原本》（孟沙著·诗集）、
- 4.《原上草散文集》（原上草著·散文集）、
- 5.《城乡回旋曲》（梦平著·小说集）、
- 6.《坚守》（端木虹著·诗集）、
- 7.《文艺琐谈》（云里风著·散文集）、
- 8.《埋葬了的鲜花》（雨川著·小说集）、
- 9.《地老天荒》（李忆君著·散文集）、
- 10.《谁在黑雾中熄灯》（雅波著·小说集）、
- 11.《看看文存》（看看著·杂文集）、
- 12.《津渡天涯》（唐珉著·小说集）

E、韦晕荣膺第二届马华文学奖

由隆雪中华工商总会主办的第二届马华文学奖，经过来自新马七位评审会审结果，一致推举著名作家韦晕为得奖人。消息传出，咸庆得人。以韦晕在马华文坛从事创作与文运推动工作，历时超过五十个年头，这份荣誉对他老人家来说，应是实至名归。

韦晕以小说创作为主，散文、游记为副。已出版著作多达十四种。他的长篇《浅滩》已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除《浅滩》外，他在五十年代写的《乌鸦港上黄昏》（短篇），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起，他的大量风格独特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他的小说家的地位。

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敏锐的观察力和博闻强记秉赋，像韦晕，从战前三十年代一直写到战后，迄至九十年代，仍然作品源源不绝，不仅在马华文坛是罕见人物，放眼古今中外，也是不可多得的。

因此，他到了年届七十八的高龄才获得“马华文学奖”的崇高荣誉，除了象征马华文学的坚韧性，也说明了，前辈作家孜孜不倦于笔耕生涯，他们的辛勤收获已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

F、莫言·王安忆文学讲座

今年六月初，中国两位当代著名小说家：莫言和王安忆到来我国访问，并在隆、怡、槟、柔等地主持“高粱地里谈小说”文学讲座，是令本地文学界惊喜交加的一桩大事。

自从马中建交以来，到中国访问的本地作家不少，可是中国作家尚未有前来我国作公开演讲的，莫言和王安忆可说是开历史的先河，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到访就别具意义了。

这一趟，他们是应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之邀莅访我国。由于二人的名字，对本地读者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在本地也有很好的销路，因此二人第一度来马，一时轰动整个文坛，所到之处，都掀起一番文学热潮。两家报章（南洋和星洲）也先后为二人主办讲座和举行座谈会，受欢迎之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G、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

配合第二届马华文学节，作协于十一月十七日、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三天在雪隆嘉应会馆主办为期三天的面向九十年代的马华文学展。雪隆嘉应会馆为协办单位。

受邀参与展出的文学团体，计有南文会、吡文会及砂华作协等。大马作协在这项大型文学展展出的项目，包括：介绍作协发展概况、作协访华汇报、第一届马华文学节、源头活水文学之夜、写作讲习班等。此外，马华文学各类出版物也在会场展卖，反应良好。

(二) 副刊杂志、单行本

A、报章文艺副刊

华文报章副刊，始终是马华文学投稿人的主要耕耘园地，文学创作活动的蓬勃或萧条，与报章文艺副刊的多寡息息相关。

以此一标准来检讨当前西马七家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尚还未臻于佳境，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报章的副刊版位尽管不少，真正属于文艺性质的，每周刊期一般只得两三次。像《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是七家报章文艺版中的佼佼者，刊期并没有随着文风的昌盛而有所增加，前者偶尔增至每周三期，（还包括每月一期的《作协文艺》和每两月一期的《南马文艺》、《吡叻文艺》及《砂华文艺》，后者仍维持每周两期。《新明日报》的《新明文艺》、《乡青文艺》也是如此。《通报》的《文风》仍旧是每周一期，而

每期只有半版。北马的《光华日报》，在作协的要求下，从五月起每月拨一版作为《作协春秋》，供作协会员发表作品，由于刊期间隔得久，并没引起圈内人太大的注意。

商报、星洲除了文艺版，它们的综合性副刊如《商余》、《星云》版，也时有刊登富有文学性的散文和评论文章。

目前报章文艺副刊的政策，似乎越来越趋向“年轻化”。重点栽培新秀，鼓励更多年轻人写作投稿，连一些没有文艺版之设的报章，至少也有一两个提供给青年投稿的版位。这种现象造成的后遗症是：资深写作人在缺少鼓励之下逐渐看淡文事，产量减少，甚至于封笔不写。

报章文艺版篇幅有限，编者重心落在新秀身上，试问又有几个资深作家愿意排长龙和后辈“争版位”？在这种情形下，文艺副刊园地的歉收自是难以避免的事。

我们不否认园地公开，让各流派的作品都有竞相登场的机会，文坛才有“百花齐放”的盛景。然而这种景观，也只有有在园地扩大、刊期增加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

报章文艺刊萎缩的现象，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另外一点，相信也是众多投稿人深感不满的，就是稿费偏低。以目前的生活指数，千字二十元的稿酬，能换取什么物资？一个写作人如果每个月精写两三个短篇，所得稿费可能还不超过百元（而且是在所有投稿都获刊登情况下），以他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计算，这代价简直比一个清道夫还不如。这样菲薄的报酬，试问有多少人还能有坚持下去的能耐？

可是在另外一面，像社团、报章主办的文学奖或征文

赛，奖金动辄五千一万，即使得不到第一名，挤入佳作之林，奖金折算成稿费，每千字起码也有上百元。写作人倘志在夺标，每年只需要专攻文学奖或征文赛，参加它十项八项，只要有五成机会上榜，那收获也是投稿于报章副刊者所远远不及的。

在奖金和稿费不成比例的畸形现象下，自也难怪许多原本活跃文坛、积极创作的资深作家，近年来落得“消声匿迹”，其中的原因，大概不能排除“罢写”这个心理因素吧？

从长远来看，华文报章文艺版要内容坚实，作家队伍要壮大，报馆当局实有必要慎重研究对策，如何加强报章与写作人的关系，不致于使目前的不健康现象进一步恶化，则报章副刊作为马华文学发展一个重镇，将能继续扮演它们更为重要和出色的角色，则文坛幸甚。

B、杂志

纯文学杂志方面，历史悠久的《蕉风》，作协出版物《写作人》、吡叻文艺研究会出版物《清流》，今年来仍继续出版，是报章文艺副刊之外的另几支生力军，在鼓励写作人积极从事创作的大前提下，确实作出不小的贡献。

由于杂志的发行面狭小，健康文艺读物销路不大，纯文学杂志每期的印量最多不超过两千本，仍然难以避免“赔钱”的厄运。《蕉风》从月刊改为双月刊，《写作人》由杂志型改为书本型，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惨淡经营下，它们仍屹立不倒，算是难能可贵。《蕉风》迄今已出版444期，

由于编者易人，刊物的风格也出现变化，但本质上仍是现代派的作风。《写作人》今年推出三期，最新一期在11月出版，主要刊登作协访华团成员和中国作家的作品，加插多版彩色画页，予人新颖印象。

吡叻文艺研究会的《清流》今年出足五期，是国内所有文艺杂志当中表现最出色的一本，参与耕耘的除了本国作者，也有海外作家。

在青少年刊物方面，董总的《中学生》月刊仍然保持它的秀态，按期出版，内容轻松活泼，颇受广大中学生欢迎，销路极佳。

C、单行本

一年来，马华文坛出版的单行本，以散文最多，小说次之。报告文学和戏剧难得一睹。作家的个人作品结集，绝大多数仍靠自掏腰包，来自社团文学出版基金赞助出书的，数量毕竟有限。

(三) 研讨会、讲座、文艺营

一九九一年文学活动频仍，研讨会、讲座、文艺营的举办，时有所闻，不但文学团体在搞，报章、学校、社团都不落后，群起响应，蔚成风气。以声势而论，《星洲日报·花踪》文学讲座和巡回文学讲座，因占了宣传之利，连篇累牍的报道下，自然引人注目。其他一些社团学校的文学活动，尽管筹备工作做到十足，总因缺少宣传，或者消息只刊登在报章地方版的一个小角落，乏人注意，反应欠佳，自是

理所当然的事。

若从意义来着眼，作协主办的“面向九十年代华文文学研讨会”是今年度另一项值得重视的大事。理由是：马新两国的文学团体，自从马新分家后，在过去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一向缺少联系，更别说是举行两地文学团体的集会。马华文学原本包括新华文学，由于政治因素促使它一分为二；客观环境的改变，加上书报刊物检查的严格和入口的限制，两地文学界的交流不像六十年代以前那样水乳交融，而愈来愈显得隔膜。大马作协有鉴于此，毅然挑起主办马新两国文学团体研讨会的重任，打破目前的僵局，为马新文学的发展打开一条有利的渠道。

不仅如此，即使是国内的文学团体，一路来也是各自为政，缺少沟通声息，趁研讨会之便，邀请东西马各地区的文学团体派代表参加，加强团结的力量，对今后推动马华文运，肯定会起着积极有效的影响作用。

除了上述两项大型文学活动，今年内各团体活动的另一个特色是，海外作家前来“作秀”也比往年多，非正式统计，为数在十人以上，包括陈若曦，於梨华，痖弦，莫言，王安忆，柏杨，刘绍铭，赵淑侠，林耀德，黄春明，李怡等。

这些海外名家，均是受到本地的文化机构和团体的邀请，或担任文学奖的评审，因利趁便，也请他们主持几项文学讲座，以他们的名气，加上报纸的宣传，号召力远非本地作家所能比拟。有人说，马华文坛的文学热潮，一半是给“远来和尚”搞热起来，未始没有道理。

总结

一九九一年的马华文坛，从以上的记载显示，华团、文学团体和华文报章仍然是维持整个马华文学局面不坠的主要支柱。马华文学今后要继续向前发展，这三方面的紧密配合和支持力量，仍然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何利用当前国内已然改善的客观环境以及世界性的“华文热”趋势，加强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未来的年头里，为马华文学开创一番崭新的局面，我想，这应是所有关心与爱护马华文学的人士共同努力建设的时候了！

（脱稿于1991年12月16日）

（刊于《南洋商报》1992年元旦日特刊）

从东合五国华文文学看马华文学走势 ——兼谈一九九二年马华文坛

一九九二年的马华文坛，虽然一样活跃，时有举行文学讲座、研讨会、征文赛之类的活动，历久不衰，然而，如果和上一年度的情况比较，本年度的活动量和热闹程度，似乎有所逊色。主要的原因，或许因为这一年少了一个马华文学节，而这个盛会轮值两年举办一次，少了它，无形中就减少了好几项征文比赛和大型文艺活动，看起来就显得沉寂许多。

我不想在这篇小文里做长篇累赘的报道，像上两个年头所做的那样。长篇大论占据报章不少宝贵版位，是其一；所引资料难免挂一漏万，吃力不讨好，是其二；经过和一些文友讨论后，我决定改变写法，不作直线式的全面报道，而采用横切式，撷取一年来文坛某些重要事项或现象作为重点评述，希望会引起各方的更大关注。

一九九二年六月初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三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是去年唯一的大规模国际性文学集会。我们就从这项盛会说起吧。

出席这个大会的代表来自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和大马等五个东合地区的写作人，以及两位来自香港的嘉宾：东瑞和忠扬。他们在这项为期五天的大会里总共提呈了将近二十份论文。对于有心了解本地区华文文学发展面貌的人士，这些论文无疑提供了不少具有史料价值的资讯。

印菲文艺同病相怜

从各国代表的论文里，我们约略可以知道，东合五国的华文文学，由于受到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的影响，所走的路子不同，遭遇迥异。像印尼，在这个长期以来华文被当作违禁品看待的国度里，华文教育几乎连根拔起，除了中年以上一辈，只有少数人在做着“护根”的工作，绝大多数早已和华语华文无缘。印华文学也在这种凄风苦雨的情况下，近二三十年来只能苟延残喘地支撑一个支离破碎的门面，这已算是难能可贵的事。生存都已成问题，还谈什么发展？这是印华文学面临的最大困境。这样的“黑暗”日子还要挨多久，谁也不知道。

其次是菲律宾。

华人在菲律宾，也和印尼情形一样，是属于少数民族。它的华文教育也有日渐式微的危机，这自然也影响菲华文艺的发展。不过，它比印华文学幸运的是，至少在菲律宾，华文文学还能呼吸到较多自由的空气。这点从那里的文学团体之多可以看得出来。

菲华社会存在的心态在改变，从早期的华侨，进至八九十年代变为华人身份。在这岛国上，华社也逐渐对参政发生

兴趣。就在一九九二年五月间的一场大选，候选人对华人选票开始争取和重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令人鼓舞的。而菲华社会本身，近年来也掀起一片拯救华文教育的热潮，寻求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华人社会的繁衍，菲华的觉醒也直接间接给写作界注入了强心剂。

据菲律宾新潮文艺社代表蒲公英所作的报告，我们知道菲华文学的道路仍然是荆棘满途，写作人在社会没有地位，作品引不起读者的重视，他们都是凭着一股傻劲，自力更生。在那里，不少人走“以商养文”的路子，一旦事业有成，才拿钱出来发展文学，这也是菲华文学的一大特色。

泰华文坛断层之虞

再下来看泰华文坛。从我出席第一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一九八八年在新加坡举行），接触到泰华写作界人士，第一个印象便是：泰华文学有老化的现象。第二届于两年后在曼谷举行，认识到更多泰华写作人，进一步印证了这个最初的印象。他们的平均年龄五十到六十岁；五十岁以下的年轻写作人寥若晨星，颇有“断层”之虞。

泰华文学的一个特色，也和菲华一样，便是“以商养文”。泰华作家协会的几位领导人在商界都很有名气，长袖善舞，他们在事业上有成，还念念不忘从年轻时期起便喜爱的文学，用金钱物质回馈文学出版事业，使泰华作协得以不必依赖社会的捐献而能自行运作裕如。

比起八十年代初期，泰华文学今天的处境当然要好得多了。这一点和客观的政治气候的改变不无关系。近几年来，

泰国政治稳定，工商业日趋发达，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的企业家前往投资者众，在大势所趋之下，通晓华文的文员的需求便日愈殷切了。民间也获通融创设民校，从幼稚园到中学，可自由讲授外文，华文教育开始抬头，对于泰华文学未来的发展，可说是一项喜讯。泰华文坛目前的“断层”现象，亦可望逐步改善。因此对于姚宗伟（泰华作协副会长）所预言的“预料五至十年，华文写作界必有一班新秀崛起”，我们也深有同感。

新华文学展望难估

接下来，看看我们一水之隔的邻国新加坡。

根据出席第三届亚细安文艺营的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杜诚的论文，他对新华文学的现况和未来展望，都充满信心和乐观，他说：“几十年来，华文文学的活动和发展，都是在民间获得大众的支持。”

在总结时，他说：“新加坡地小，人口不多，但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有华文报副刊，华文杂志，华文文学团体，华文书局，出版机构。至于学校教育，我们仍有不少的年轻一代热爱华文文艺，再加上社会的发展也不忽略华文文学，如社会发展部每年主办的作家周，都有邀请各语文（包括华文）作家前来参加活动。华族文化节中，华文文学团体的参与也是属于重要的一环。”

杜诚让我们看到了新华文学蓬勃充满生气的一面。这使我想起来在一九九一年杪新加坡另一位资深作家，也是新华作协会长黄孟文博士于一九九一年杪在大马作协主办的一项研

讨会上所发的感慨。他在一篇题为《九十年代的新华文学》中说：“你认为新华文学有前途吗？我看答案是相当明显的。”

他又说：“到目前为止，从一切迹象看来，新政策要提倡的主要是舞蹈、音乐、戏剧和绘画，纯文学只能忝陪末席；因为前者对旅游业有利，较有经济价值。而后者则似乎注定是‘赔钱货’，不受重视。

“目前新加坡不仅年轻的一代很少华文写作者（少数海外留学生除外），连一些较著名的中年作家也失去了创作的冲动力，这个劣势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扭转过来的。”

同样谈论新华文学，杜文和黄文给人的印象，显然出现很大的分歧。或许我们需要冷静客观来看待新华文学当前面临的难题，才能对它的将来发展作出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评估。

马华文学潜伏危机

谈过了别人的文学，且让我们看看自己的马华文学，到底又是怎样一个面貌？

我在第三届亚细安文艺营提呈的论文《现阶段马华文学发展概况》里，阐述了八十年代以还马华文学呈现波澜壮阔令人振奋的景观之外，也指出当前文坛潜伏着令人忧虑的危机。

一、一向被视为马华文学“摇篮”的华文报章，从它们文艺副刊近年来的表现，似有萎缩的现象。刊登文艺作品园地少，投稿被扣压的时间越来越久，较长的稿件根本找不到

地方发表，使得许多写作人心灰意冷，最终索性弃笔不写。

二、阅读风气不盛。国人一般重视物质生活甚于精神生活，华裔社会尤其显著。色情、武侠、科幻、言情小说充塞于市，成为青少年读者的“最爱”，益智的文学读物只好局促一隅或被打入冷宫。

三、社团主办的征文赛项多，奖金不菲，在“利诱”之下，不少写作人（以年轻一代为甚）眼里只有征文赛，对寻常的投稿（每千字平均十五至二十元稿酬）不屑一顾。“为奖金而写作”形成文坛一股歪风，长远来看，对马华文学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出版商为了赚钱，多不愿出文艺书。写作人在出版个人集子时，只好自掏腰包。而一本书的出版，从打字到校对，从接洽印务局到奔走书店，从发行到收帐，事无大小，无不亲力亲为。当好不容易把书印了出来，放出去的书款永远是结不清的烂帐，直接影响写作人的创作热忱，也使健康的出版事业萎靡不振。

然而，对于马华文学整体的发展，海外的朋友倒是赞誉备至的，他们比较中国大陆、港台以外地区的华文文学，认为未来的发展条件，最好的要属马华文学。其中，强烈表达这个看法的是中国评论家潘亚曦。他在八月间到访马来西亚时，就曾经公开演讲，表示再过五年或十年，马华文学将超越新加坡而领导东南亚华文文学，他所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 一、马华作家有一个全国性组织健全的华文作家协会。
- 二、马华作家协会会有坚强诚实的领导层。

- 三、大马有两千余名从事华文写作者，人力资源丰富。
- 四、大马华文教育普及，能培养大量写作人材。
- 五、大马华文报章提供大量写作园地，新加坡比不上。

未来发展看好大马

这个论调和较早时一些外国学者作家如今富正已（日本）、东瑞（香港）等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后者在一篇题为《马来西亚已成世界华文文学重镇》的文章里这么说：“中国大陆是华文文学的发源地，而过去被提到较高地位的港台文学，目前纯文学式微，反观新马（尤其是马华），华文文学却正在做各种艰苦的努力和争取，充满了希望。可以说，马华文学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这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本地文坛毕竟还存在诸多短期内不易克服的难题。

摆在眼前，最令许多资深马华作家苦恼的，是稿费偏低，较长的作品找不到园地发表，发表之后要结集出版时又面对经费问题。想到自掏腰包花几千元印一本书，好多文友都心有畏惧。即使有能力出书，书出了要如何发行，血本是否能回归，也是丝毫没有把握的事。

有关出版和发行课题，在一九九二年八月间举行的“双福文学节”座谈会，以及十一月间举行的马中出版界与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与会者就曾热烈地进行探讨。

大马福联会每年提供一定基金赞助优秀的马华文学作品付梓出版，是文艺界喜闻乐道的美事。这项惠益马华写作人的善举，自从七十年代中期设立以来，在郭洙镇和黄茂桐两

位领导下，十数年来连续不断颁发，深受华社各界好评。福联会文学基金给予每位入选者二千元赞助经费，虽不够印刷一本书，毕竟也解决作者出版上大半的难题，只要能有一半的销路，便可以不必尝到“蚀本”的苦头。问题是，不少作者对于发行工作“一筹莫展”，书印了出来销不出去，可又该怎么办？

出版与发行有问题

我曾经向福联会负责人建议，凡获得福联出版基金出版的书籍，该会应该再进一步发动各州属区会馆作适量认购，分销给会员。假设每个属会认购三十本，区区一千几百本何愁销不出去？此举既为作者解决发行上的难题，又能鼓励同乡支持马华文学，带动健康的阅读风气，让别的乡团会馆响应尾随，何乐而不为呢？

在双福文学节座谈会上，也有人主张福联会每年为得奖作品付梓时举行发售礼，或者轮流在各地独中为作者和新书进行推介和举办讲座，借此推广宣传，使马华文学作品深入中学府，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马华文学，也由此而带动校园的读书和写作风气，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有关方面放手一试的善策。

除了福联会，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也从一九九一年开始设立出版基金，为会员提供出书方便。这个基金迄今已赞助二十四位作者出版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各类体裁的著作。这项出版基金也和福联出版基金一样，只赞助经费，而不负责出版和发行工作，对于受惠人来说，到底还是美中不

足的。

根据非正式统计，目前马华文学著作的销量，平均在五百至二千左右，许多作者都渴望开拓市场，将本地作品推介到海外去。在一项由《南洋商报》与上海书局联合主办的本地与中国福建省出版界、书商与作家的座谈会上，马华作家便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于此之前，马华作品虽未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中国已有多间著名大学设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部门，重点研究新马华文学。在广州、上海等地的评论界，近来来撰写不少评介马华作品的文字，发表在本地报章副刊和文艺杂志。这些评论，可以看作是对马华文学的一种鼓励和鞭策，对于提高马华文学的素质，肯定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自从大马华文作家于一九九一年组团访问中国以后，马中两国文艺界的联系便日益频密。一年来，中国作家来访的，少说也有十人以上，据我所知的计有：杜运燮、舒婷、李天芳、李玲修、饮鸿、潘亚暎、马阳、吴柳斯、苏叔阳等，这是在马中建交之前未曾有过的现象。

作为全国性的文学团体，大马作协在过去一年里，除了继续开展文学活动，也致力加强出版工作，像编纂一套马华文学选集（共三大册），可望在年杪编选完毕，准备在一九九三年交由中国一家出版社付梓出版，并在中国发行。这项堪称马中文学界破题儿第一遭的合作计划一旦落实，势将为马华文学史写下崭新的一页！

（写于1992年12月下旬）

（刊于《南洋商报》1993年元旦日特刊）

马华文学方兴未艾

——1993年马华文坛扫描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太约在五年前，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举办国内首届的“源头活水文学之夜”，表扬三位前辈作家：韦晕、方北方和原上草。在—项报界招待会上，—位年轻的新闻从业员走上前来，问起“韦晕”二字怎么写法。我—时感到愕然。

也是差不多同个时期，我在业余负责某间独中的写作班导师。有—次派发问卷，其中—题是：谁是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主席？结果，在交回的问卷中，有几个的答案写着：李三春/林良实/李金狮。我当场为之啼笑皆非。

类似的笑话还有不少，包括某华团在—次理事会议上，有人提议捐款推动马华文学，马上有人反对，认为华团不应涉及政治活动。把马华文学当作是“马华公会的文学”，这样的误会可大了。也从此可见华社对马华文学了解的少和隔膜之深。

几年后的今天，马华文学的发展，经过华社—些重要团体配合文学工作者的努力，已经有越来越蓬勃的趋势。海外

有不少专家学者重点研究马华文学，也一致看好马华文学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东合地区的华文文学重镇。马华文学从受冷落漠视到引起海内外的关怀和重视，对于众多默默耕耘的文学工作者，的确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新秀崛起·展望乐观

一九九三年的马华文坛，大体上仍然保持前期文学活动的热潮，在既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像马华文学节、九十年代文学丛书、福联会出版基金、马华文学奖、花踪文学奖、大专文学奖等，都是深受注意的几个焦点。若从意义上来看，上述几项重要活动，都各具本身特色：马华文学节是集大成的文学庆典；九十年代文学丛书和福联出版基金为作家提供出书便利，充实马华文学书库；马华文学奖肯定和表扬资深作家的文学成就；花踪文学奖鼓励更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大专文学奖掀起校园文学热潮，为马华文学培养接班人。从长远看，这些深具意义的活动持续地举办，已然为马华文学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气氛，也令人对马华文学的前景寄予乐观的期望。

在过去一年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应该是新秀的崛起。这一点可以从国内大大小小的征文赛中得到印证。几乎八成以上的征文赛得奖者都是来自年龄介乎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青年作者，他（她）们以征文赛作为“练靶”的对象，通过征文赛考验他（她）们作品的素质和分量。奖金的诱惑是促成这批年轻作者投入创作行列的其中一个因素，然

而最终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跻身荣誉榜。而荣誉和报酬，到头来又会带给他们压力和刺激，促使他们更为认真地看待创作事业，以便来年取得更大的成果。

因此，尽管征文赛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谁也不能否认，若没有征文赛的鼓励，马华文坛恐怕短期内还很难催生一批具备素质的青年作家群。像李天葆、柏一、毅修、庄松华等几位，他（她）们都是从参加征文赛中得奖，再凭个人的不懈努力，一步一步走上成熟的道路。这当中已不仅仅可以靠运气去侥幸达致。

征文赛带来负面影响

迄至目前，国内征文赛奖金最高达到一万元，最少的也有一千元（大专及中小学生级例外），作者以一首诗或一篇二、三千字的散文或小说参赛，只要挤进三甲榜内，至少可以得到五百元奖金，即使是入选，也有上百元奖金，这个数目和寻常投稿发表所得稿费（一般在十五至三十元之间），比较起来，何者上算，何者吃亏，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事。

难怪有人要感叹，指出当今有不少职业参赛者，他们长年到头绝少有作品在报章刊登，可是一有征文赛却闻风而来，视参赛为一条“财路”。事实上，有一些得奖者也毫不讳言，回答的总是：“我没有兴趣投稿，我专心写征文稿，每年只要有一篇上榜，好过写几十篇的稿费收入，我又何必花时间精力去投稿呢？”

评论者也指出，每届征文赛的得奖名单，来来去去都是

一些熟悉的脸孔，征文赛似乎为少数人而设，已然失去举办的意义。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恐怕就很少人会去探究了。

按照常理，征文赛奖金大幅度提高，必然会吸引更多人参赛，可是事实上却适得其反，一般上收到的稿件都不会超过百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而在参赛者名单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一辈，资深作者少之又少，征文公开赛几乎已经成为变相的文坛新秀逐鹿场。这种现象，在诗歌和散文的领域里尤其显著。

标榜高昂奖金的征文赛所得反应尚且如此，一般报章的文艺副刊处境当不言而喻。据我所知，现在的报章文艺的投稿人已经越来越少，身为编者的倘若不加把力，要组织足够的稿量恐怕都有问题。这种情况和五、六十年代投稿人踊跃的文坛比较，简直就匪夷所思。如果说现役作家不屑参与征文赛，那么拥有广大天地的文艺副刊，为何也不见他们驰骋的影子？除了稿费偏低的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年轻作者领尽风骚

马华文学一向是老中青三结合，早期的情况都是以中年一辈为主力，成为文坛的中坚，如今已然有所扭转，重心逐渐落在年轻一辈的新秀身上。拿过去一年里的情况来说，在老一辈作家中，韦晕的精神最可嘉，仍然以许多副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方北方和原上草则较少出现新作，翠园的散文，质和量仍具有一定的水平，在中年和青年作家群中，比

较活跃的，仍不时有创作面市的，为数并不多，可数的就是：潘雨桐、雨川、驼铃、甄供、年红、伍良之、李忆君、朵拉、碧澄、唐珉、傅承得、雅波、爱薇、浩于豪等几位。

比起资深作家零落不整的阵容，年轻一辈作者群的活跃度和声势，就远远的凌驾其上。除了征文赛为他们“垄断”之外，在报章副刊方面，他们不仅在文艺版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不少机会在特别为他们而设的副刊上纵笔。年轻作者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的作品一旦得奖，马上声价百倍，受到评论界的热捧。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其间的差距简直是望尘莫及。

针对这一点，马大中文系副教授陈应德博士（晴川）表示了他个人不同的看法。他说：“马华文坛不应太着重呵护后辈。如果我们不以实际的方法，只一味推崇他们的作品，将会失去原来的意义。”他希望看到马华文学新秀能正确吸取传承的精神，同时吁请文坛有心人为新秀作出较有系统的研究，指出新秀作品的优缺点。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后辈才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文学出版事业有待扶持

古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话放在马华文坛，也是切合实际的。马华文学迄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前辈作家在崎岖的文艺道路上苦心经营，不因周遭恶劣环境而放弃手中的锐笔，主要还是靠本身坚定的信念，对文学艺术情有独钟，同时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去美化和改善人类的精

神世界。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和执着，马华文学才能坚持到今天，一直保持它顽强的生命力。

有鉴于马华文学长期以来受到冷落和漠视，以及文学在文明建设方面所扮演的吃重角色，大马堂联会总秘书吴德芳在第三届马华文学节开幕礼上，就为稿费的偏低和作家结集出版的困难这两点作出将伯之呼。他说：“作家绞尽脑汁所得，如果连普通劳工都不如，试问还有多少具有才华的写作人愿意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心血结晶，往往找不到赏识的出版商，还得要自掏腰包，等到书印了出来，又要四处找人协助推销，从头到尾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作家面对血本无归的残酷现实，试问又有几人还有自费出书的勇气？”

吴氏在为文学界道出心头隐痛之余，也希望华社在稿费的提高、扶持马华文学的出版事业方面，为作家尽点心力，务使马华文学在各方实际有用的协助下，冲破重重难关，走向一条健全发展的道路。

作家面对发行难题

认真地说，华社近年来给予马华文学的关怀和扶助，已经做得不少。像资援作协的文学出版基金，使这个全国性的文学团体，在短短一年内便筹到十余万元，并顺利地开展赞助作家出书的工作。迄今为止，作协的《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已经出版了三十余部，包括各类文体的文学著作。这项给予作家带来实惠的出版计划，如果能够长期推行下去，

马华文学必将会收到更为丰硕的成果。

另一个设立文学出版基金的团体是大马福联会。这个团体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便提供出版基金，给予马华作家申请，迄今不断。可惜十多年后的今天，全国华团中仍未见有追随者。我想，倘若全国数千华团中，有十间八间响应吴德芳的呼吁，仿效颁发会员子女奖学金的做法，设立类似文学出版基金，每年赞助一两位优秀的作家，提供出书方便，那对马华文学来说，将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啦。

而在现阶段摆在马华文学界眼前的一大障碍是：书出版之后的发行问题。这方面，华团也可以伸出援手，如果有十分之一的单位愿以实际行动支持马华文学，酌量购买本地作家的著作，充实他们的阅读室，这一来不但可以为作家解决发行上的难题，又可给本身会员多些健康的精神食粮。对于大部分华团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和“为与不为”的事，希望来年会有所突破。

一揽子解决难题

作为全国性的文学团体：大马华文作家协会，凭它十多年来的奋斗苦干奠下的基础以及在华社建立的良好声誉和形象，我想目前正是它一揽子解决马华文学界诸多难题的良好时机。像稿费和书籍发行问题，如果改弦易辙，主动向有关方面伸出触须，结果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远的不必去提，就从近的方面来看，刚刚落幕的第三届马华文学节参加团体，除了作协之外，总共有十一个，包括大马堂联、雪华

堂、雪隆中华工商总会、董教总、文化协会、南大校友会、留台联总等，这些团体拥有足够的舆论影响力，既然已和作协挂钩，彼此必然在推动文运课题上达到某些共识，作协有必要掌握当前的大好局势，主催一项推动马华文学座谈会，邀请上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团体齐聚一堂共商一是，寻求有效的途径，以落实“支持马华文学，人人有责”的口号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构想，相信也是众多马华文学工作者的期盼，希望作协领导层有所行动。

此外，作协也应研究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争取马来友族作家的支持，使马华文学纳入国家文学的一环的夙愿早日完遂。这个马华文学界普遍的意愿，早在作协成立之初便不断提出，甚至和华裔朝野政党对话，向政府提呈备忘录，要求肯定马华文学对丰富与发展国家文学上所扮演的角色。迄至最近，堂联总秘书吴德芳也在第三届马华文学节闭幕礼上针对这个课题吁请政府重新考虑承认马华文学，让它在迎向公元二〇二〇年的道途中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要为马华文学开拓新境界，现在正是文学界和华团结合力量的时候。众志成城，世间万物万事都在变动，主观的努力，往往可以冲破客观的种种阻力。对于马华文学，我始终都有这么乐观的期许。

（稿于1993年12月中旬）

（刊于《南洋商报》1994年元旦日特刊）

量中求质

2000年度南大校友会微型小说比赛总评

(一)

南大校友会自上世纪80年代末配合马华文学节而主办的微型小说比赛，迄今已进入第6届。历届参赛作品有多有少，约略在80余到百余篇之间，没有像本届那么踊跃。当主办当局告诉我，参赛篇数多达6百篇时，我一时尚半信半疑，直到看到白纸黑字写明数字：639，我不得不为这样一个参赛盛况暗暗称奇。

根据主办当局统计数字，本届赛会还有以下几个特色需要提一提。

(一) 以性别区分，在591名参赛者中，男性266人（占45%），女性325人（占55%），此其一；

(二) 以年龄区分，18岁以下者最多，达354人（占60%），18岁至30岁者其次，共有188人（占32%），30岁以上者最少，只有49人（占8%），此其二；

(三) 以地区分布来看，中马区遥遥领先，达510篇（占

81%)，北马区其次，共有54篇(占8.5%)，南马排第三，共有49篇(占7.7%)，东马远远落后，仅有10篇(占1.16%)，而东海岸更少，只得8篇(占1.12%)，此其三。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马华文学的写作人口，仍然以中马地区为最兴旺，曾经一度领尽风骚的北马地区，如今似乎被远远抛在后头。另一点令人瞩目的是，写作者已越来越年轻化，18岁以下中学生参赛数目占了总篇数的五分之四强，虽然入选之作只有两篇，与参赛数目不成比例，但是从提倡与推动意义上着眼，少年一辈写作者的涌现，毕竟是一件值得庆幸和叫人振奋的事。

为了鼓励更多人投入写作行列，我建议南大校友会来届倘若继续主办类似赛会，应分设公开组与学生组，这样将可以从中发掘更多优秀写作人才，以壮大马华文学队伍。

(二)

下来谈谈本届的评审情形。

由于参赛作品太多，评审需要经过初审取舍，这项工作交由工委会负责。在南大校友会理事群中，不乏文学造诣精深人士，对于初审任务绝对胜任有余。

初审的标准是：每位评审将所审阅稿件分为A、B、C三类，A属佳作，直接进入复赛，C属劣作，淘汰可也。剩下的B稿，初审不能定夺，交由评审团决定是否入围。根据这个程序，初审结果是：A稿72篇，B稿125篇，C稿442篇。而B稿经评审轮阅之后，仅录取其中8篇入围。换言之，初审落选的总共559篇，只有80篇获选进入复赛。

复审与决审工作由五人评审团负责。在召开评审会议时，五名评审均到会。会议在赛会工委会成员列席下进行。对于如何产生三甲与佳作问题，大家达致共识，决定摒弃计分分制，采用票选方式。而票选分作两阶段进行。在第一轮投票中，各人从80篇里投选自己属意的佳作（以23篇为限），接着根据得票多寡依序排列，选出得票最高的23篇进入决审。然后，时行第二轮投票，决定首三名作品，其余20篇全属佳作。

对于三甲作品，评审大致上并无太大分歧，只是在决定首奖谁属时，大家才出现异议。由于这三篇都各有优劣之处，对于首选之作找不到共识，在谁也无法说服谁的情况下，最后达致一个变通的方案，那就是让首奖悬空，变成两名二奖和一名三奖，这在南大微型小说奖历史上，算是破题儿第一遭的事。

（三）

谈到本届参赛作品的水平，从初选情况显示，约七成是在水平之下。因此，如果从提倡和推动角度来看，微型小说吸引近6百人参加，在量上已有显著的增加，诚然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若就整体成绩而言，质和量显然大大地不成比例。再以这个成绩和历届赛会作个比较，我们只能这么说，水准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下降之虞。

微型小说在马华文坛的崛起和流行，还是近十多年的事。过去，许多人对这个文体不感兴趣或心存歧视，甚至是写作有年的小说作者，也对它不屑一顾。大家好像都有类似

的偏见，以为写作一千几百字的小说是小儿科，寻常一个短篇都要好几千字才能装载，只写那么千来字，岂不糟塌题材？等到微型小说的风潮从中台港新吹到大马时，影响所及，连那些平素看不起它的资深小说作者也跟风起来，更别说一般初学者了。这股流风目前在马华文坛方兴未艾，从本届微型小说赛的盛况来看，它的受欢迎程度，大有超越散文小说与诗歌，成为文坛的“新宠”。

当今文坛涌现大量微型小说，若认真来掂一掂的话，颇多只有微型之貌，却无小说之实。很多人在写作之前，并没有好好地在构思上下功夫，当有了题材便急急搬字上纸，或者把重点轻描淡写带过，或者将次要部分刻意渲染，或者是贪心过度，把大堆的材料尽往有限的篇幅里装塞。到头来，微型是微型了，然而作品所呈现的精神面貌，不是五官不匀，便是头重脚轻，更甚的是由于过度浓缩造成的臃肿不堪，不忍卒睹。

另外一种现象是，作者基本上已然掌握写作微型小说的窍门，也深谙个中三昧，就是创作态度不够严谨，不从内容情节或主题思想上加以突出、深化，却一味玩弄文字游戏，把写作当作是变戏法，往往走火入魔而不自知。大凡这类技巧先行的微型之作，充其量除了靠文字包装之外，别的再也无足道哉。胡适之“八不主义”中的第一条“须言之有物”应是指此而言。

翻阅一些早有定评的优秀微型小说，它们大体上都具备小说的良好架构，从形式到内容，从外观到精神，无论主体或细节，该放的就放，该缩的就缩，该隐的不予暴露，该显

的不故弄玄虚；题旨的轮廓勾勒，人物性格的刻划，并不因为篇幅局限而厥如。这些佳构，在语言文字上都能做到精简、干净、利落，没有太多的冗辞赘话，也没有无谓的叙述铺排。从阅读精彩的微型精品中，就像观赏武林高手施展平生绝技，一招一式之间都潜藏着深厚的武术根底，绝不是一般的花拳绣腿可以相提并论。

我总觉得，微型小说看似易学易写，却是最难攻的一门文学艺术。要写好一个微型小说，首先得要有写好短篇小说的根底。现在的年轻作者，有许多一开始接触创作便尝试微型小说，就像一个散文还写不通的初学者急不及待去写诗一样，自然不会有什么可观的成果。因此，对于这回南大微型小说赛，看到大群年轻作者涌现，固然可喜；但从另一个方面去想，我希望这种局面是新生代抬头的先兆，而不是“一窝蜂”的时潮症候。如果年轻作者能虚心学习、持之以恒，从量中求质，如同资深作家要求质中求量，长期下去，马华文学在量与质应会有比目前更好的收成。

以上是我在读稿之余的一点感想和意见，就文论文，绝无针对任何作者用意。谨此就教于高明方家，并与文坛同道互勉。

（写于2000年11月15日）

微型小说浅谈

1.

微型小说的历史，实际上从西汉时代就已开始。旧社会，一般读书人把小说视为雕虫小技，微型小说就更不必说了，那是小技中的小技，根本没人把它放在眼里，也就影响了它的自然发展。

2.

微型小说虽说是雕虫小技，但是在文学体式里，它和诗歌创作一样，也是最讲文字功力的。许多年轻作者，一开始接触文学，总喜欢从诗歌入手，以为诗的篇幅短，无需耗费太多精力，于是人写我也写，弄出许多不是诗的怪物出来。对微型小说也一样，一般人以为能写几篇文章，便也学人写微型小说，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变得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所以会有此现象，原因在于世人忘记了一点：对于文学，诗是最讲究文字技巧的，微型小说也是，文字越少，越是考验艺术功力。

3.

一个语文驾驭能力不强的作者，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写

好一首短诗或经营一个短篇，简直是天大的难事。往往处理得不好，诗变成散文的分行，微型小说变成故事大纲。

4.

由于篇幅短，才需要写得精致，没有扎实的文学和文字根基，行吗？由于文字少，稍微大意疏忽，都会影响全局，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便是这个意思。因为在短小篇幅里，一眼望去，任何失误都无所遁形，就像把风景花草搬进小小的盆栽里，变成一个浓缩的大花园，任何地方有少许的缺失，都会破坏艺术的美感。

5.

好的诗，让人读了有很大的联想空间，所谓意在言外，给人回味无穷。就如一流的歌手，虽然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演唱，在听的人感觉上，却余音袅袅，令人有绕梁三日之慨。微型小说在这方面，和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6.

文学的发展，是跟着社会演变脚步，不是一成不变的。像中国最早的《诗经》，大都是四句，每句四个字组成，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短短四行，很传神地描绘了在怀春在钟情的青年男女微妙心态，虽过去几千年仍然挂在后人口中，历久不衰。又像唐诗绝句，也是四行组成，最多只有28个字，但是诗家们却能在谨严的格律中，写出许多千古绝唱。“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等，真是举不胜举。

7.

现代人生活紧张，闲暇时间不多，读书的时间更少，这给了微型一个有利的发展空间。人们要在十几二十分钟内看完一篇小说，只有一千几百字的微型才做得到。但是如果空有微型之外貌，而没有文学之实，对要求较高的读者来说，十几二十分钟也是一种浪费。因此，如何把微型小说写得像一首好诗或一首好歌那样，令人回味无穷，我想对于有志从事文学事业的马华作者，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事。

(2002年12月14日)

(按：本文是作者在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主办第七届全国微型小说奖颁奖仪式上致词摘要)

要求生活的散文

——第13届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作品评后感

散文是文学家族里的轻骑兵。

不像小说或诗歌，散文作者往往轻装上阵，随兴而发，思绪看似散乱，意象看似飘忽，然而整体上，仍然有一支主旋律，调动着作者的思想感情，通过文学语言传递作者所喜所忧所爱所恨，直接或间接撩拨读者的心弦，引起一定的共鸣，予人一份高度的审美感觉。

我对散文的欣赏，总是有着这番原始的期许。当然，除开要求它具备美文的素质外，我还认为，外在的形式再好，如果没有生活作为内容的基石，到底还是个缺憾。如何把生活有机地融入文学作品里，既要写作人感同身受，更要落实于行动，毕竟不是人人都可达臻的鹄的。

因此，本届大专文学奖散文组的参赛作品当中，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便自然可以理解。每个人对人生取向、价值观、生活追求的态度不同，流露于笔管底下的自然各异其趣，不足为奇。

年轻作者的文学创作热诚可嘉，他们尽其所能地在各自篇章里涂抹上各式各样的色彩，他们具有创意和想像力，字

里行间时见锋芒和机巧，表面给人清新感的同时，也往往显露了破绽。语文根底欠缺坚实，遣词用字多见失误，此其一；题材的掌握不足，勉强敷衍成篇，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境，此其二；刻意玩弄技巧，内容不知所云，徒增“驼子翻筋斗”笑料，此其三；作品内涵张力不够，未能提供较大联想空间，可读性大大减低，此其四。

以上几点，有些关乎内容，有些关乎形式，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基础问题。对语文学习不认真，欠缺火候；对文学理论的认识一知半解，甚至受误导，走火入魔；对生活一向漫不经心，对周遭事物冷漠相待，读者如何能期待其作品有扎实的表现？在这样脆弱的基础上，哪怕是天赋奇才，也不可能一步登天。

因此，倘若以较严格的尺度来衡量这回参赛的39篇散文作品，我的感觉是超过三分之二篇章是水平之下的。而在较为难得的几篇得奖之作中，《故乡的雪》显然技高一筹，无论文字技巧、主题意识或思想感情，都展现非凡风貌。其次，《阿妈的手》、《木宅守故》等篇，也都各具特色，充满生活姿彩，算得上是形式内容兼具的佳构。

主办当局这回为大专文学奖设定的主题是：牵文字的手与思想跳舞。我想这是一个很富建设性的命题，值得新一代写作人自我反省，先把根基扎稳，然后向社会生活伸出触须，从不断地学习中自我提升，追求作品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结合，则未来的大专文学奖，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充满朝气隽智、富有生活气息的佳作源源而出，是所厚望。

（写于2001年7月14日）



第三辑 文学现象

马华文学现象

“新”和“旧”不是绝对的

20世纪的现代，再过三、五十年，也会变成旧东西。正如今天一些年轻人看不起老一辈的成就，当有一天他们进入老年时，一样的，他们也会为那时候的年轻人所瞧不起。“新”和“旧”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的新，总有一天会变成旧，两者是相对的。因此，今天的年轻人不必老嘲笑别人的过时赶不上潮流，再过三几十年时代改变，那时他们也将尝到被人嘲笑的滋味。这世界是公平的，谁也不可能永保青春，而天理循环，今天剃人头者，总有一天被人剃其头，没有谁可以幸免。

现实主义的存在，已经超过几千年的历史，不管在中国或在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永远有它们一席之地，并不是说要否定便否定得了。《诗经》来自民间无名诗人的歌谣，它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到了今天，好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仍然挂在读书人口边，并没有因时代久远而烟逝。还有唐诗宋词，连没有进学堂的小孩都能背诵三几首，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

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写得明白如话，一点也不深奥难懂，已经历了无数个年代，却没有有人认为它过时，这是什么原故？

文学的生命力

上千年前古人之作，今天读起来仍感动不已，这就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而文学的生命力来自生活，来自民间的语言，它是活在人民心中的语言，它超越时间和空间，可以永恒存在。反观，那些在同个时代里标新立异的东西，可能曾经炫耀一时，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便在历史的长河里淹没。远的不说，就拿50年代曾经风靡新马文坛的现代诗来说吧，那时许多年轻人爱跟潮流，捧着台湾诗人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写的尽是人看不懂的所谓“现代诗”，一时蔚成风气，而那些走写实路线的诗人则被人目为落伍者。不只是这样，他们也看不起“五四”时期的作品，认为巴金、艾青的技巧陈旧老土。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西方的弗洛伊德、艾略特才是真正值得效法的对象，只有台湾的痖弦、洛夫、余光中才配称为中国诗人。这样的景观出现了一段时期，后来发现台湾那些老诗人一个个“反璞归真”，他们却死硬到底，仍然钻进牛角尖不肯罢休。今天回头看看史实，那些曾经风光的所谓“现代诗”，有哪几首真正令人记取的？为什么现代人写的“现代诗”，寿命竟那么短暂，即使数量多如恒河沙数，却都像“海市蜃楼”般，曾几何时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令人不解的，今天的诗坛竟还充斥着一大堆“梦呓”式、不知所云的所谓“现代诗”，诗作者以“表

现自我”作为创作的最大目的，喜欢怎么写便怎么写，完全不把读者放在眼里，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可能连作者本身都不懂，难免要闹出笑话。柏杨曾经以“打翻铅字架”来揶揄台湾的现代诗，可以想见这类现代诗已到泛滥成灾的严重地步。

经典之争

可是，偏偏就是这批自诩为最前卫的诗人、作家，唯恐将来的史家把他们遗忘，出道没有几年，由于曾经得过几个奖，便急不及待要给自己定位。他们藉口老一辈的文学史家有偏见，对旧有的马华文学史啧有烦言，认为那是现实主义的产物。他们要为现代主义请纓立碑，同时志在改写马华文学史，首先罗列种种“罪名”，宣判现实主义死亡，接着依他们的准绳，一口咬定马华文学在70年代以前没有“经典之作”。在他们编写的马华文学史里，许多为马华文学默默耕耘的老兵没有名字，因为那些人不属于现代派，不是他们的同路人。在打击别人的同时，他们不忘抬高自己，在自编的文学史当中，能够被圈中的具代表性作家寥寥无几，来来去去不外是“朋党”几位，一边自编自导自演，一边又有台湾评论家撑腰说尽好话，于“经典缺席”之际，有人“趁虚而入”，一幕幕“颠覆马华文学”的好戏便在90年代的世纪末隆重登场。

文学作品经典不经典，是活着的人可以信口雌黄的吗？试看一部《全唐诗》，收集的诗人作品数以万计，可是真正家喻户晓的却是《唐诗三百首》，那是经过无数岁月朝代筛

选的结果，岂是诗人本身主观愿望可以达致？从留传下来的经典之作，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作品传世不传世，不由得作者在生时喊得整天价响，而全然是作品本身在“说话”。马华作家也不例外，你说铁抗、张一倩、韦晕的小说无足观，最好的做法就是：写出自己的小说，让作品去鉴定作家的地位，而不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做着鞭尸的勾当。现代商场上流行这样一句口号：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我想，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也应有这样的自信，除了靠本身不断努力，不断寻求突破，他根本无需要为了抢着“出闸”而把别人踩在脚底。如果一个自诩为作家的年轻人连这点基本的识见也没有，那么即使他拿过再多的奖项，也不能为他增加多少光彩的。

文艺青年应谦虚

今天的文艺青年，一个普遍的通病是：急功好利，他们急于上岸，不愿意循序渐进，老是希望抄捷径。新一代作者和他们的前辈有着很大的思想上的分野，这和整个时代的风潮息息相关。过去的年轻人，特别是受华文教育者，一般上都有个共同点：敬老尊贤，即使成就高出前辈，也不会轻易流露一副盛气凌人状，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叫“谦虚”，但是到了新一代，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抬出学历，或者搬出什么新名堂，一开始便摆出高架势，好像在向世人挑战：我是前卫分子，落伍的人请别挡住我的去路！如果人家不让路，他便抡起手中的刀棍，不理对方是何方神圣。文坛的情况更为明显，一些被传媒捧红的“青年

作家”，一朝负笈海外，又在异乡扬名立万，马上鼻孔朝天，别说老作家在他们眼里视如草芥，连整个马华文学史也是他们所讨伐的对象，自负狂妄的程度真是无以复加。想想看，这一小撮出身马来西亚，接受华文教育的哺育，可成长高飞后却对马华文学不屑一顾，从他们身上，有哪一点“人格光辉”足以奠定其作家地位，或者成为后来者学习效法的榜样？一个作家要受到世人的尊崇肯定，全看他能拿出什么货色；而作品是作家人格和艺术修养的综合表率，一个人品卑下的作家，也难以期望他的作品会达臻高度的艺术水平。

今天的文学发展走向，已越来越商品化。问题是：商品可以靠打广告风行一时，正统的文学作品行吗？歌星、影星可以通过宣传打响知名度，制造轰动效应，可以一炮而红，而作家行吧？被传媒吹捧上天的明星作家，如果不是靠作品“说话”，很快会被别的明星作家所取代，正如商品那样，流行过后便有新的产品取而代之，道理是一样的。

（写于2000年4月）

文人下海之后

文人下海，是中国文坛近几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景观。

大陆的专业作家一向由国家供养，他们实行工资制度，作家每个月有固定收入，足以应付一般的生活。可是客观环境改变后，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澎湃，个体户成为时代的新宠儿，影响所至，高干分子一个个和商界打交道，图取眼前快利。这股浪潮自然也波及原本平静的文艺界。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下海之声沸沸扬扬，一时蔚成世纪末新的风尚。

对中国大陆的文人来说，由于政治局势、社会制度的变革，使他们无可避免地卷入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潮里，自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对此，抱持乐观积极的作家认为，市场经济将有利于发展和提高文艺生产力的创作与生产机制，会促使有真本事的作家创作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作品，因此文人下海未尝不是好事。像著名的小说家张贤亮便是身体力行的一位佼佼者，他毅然投身商海拼搏，创组宁夏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希望借用他在国内外的文学声望

充当“红色买办”，接受海内外有意在宁夏投资做生意的朋友的委托，为他们代理经营业务。

也是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他的“下海”还有两大原因，一是繁荣文艺需要钱做后盾，二是文化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他自认有责任带领大家“闯荡”出第二职业。

除了张贤亮，另一位“下海”成功的例子是谌容。这位也是以写小说享誉海内外的女作家，她在改革经济大潮中作出响应，联合丈夫孩子组织快乐影视中心，以创作和制作影视作品为主，自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一家五口集影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体。谌容的野心不小，在她的制作计划之中还包括拍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此外，还有上海剧作家白桦等人成立价格工会，订定影视剧本的稿酬标准，深圳方面首倡文稿竞价活动，让作家呈献作品，议价拍卖。北京青年作家王朔等人联组“海马”创作实体，从事文化企业活动，通过议价出售的实验，打破文艺产品的生产主式和推售方式。以上数端，算是文人下海风尚里受人瞩目的几个特殊个案。

虽然没有统计调查数字可以让我们知道究竟有多少作家卷入这个划时代的浪潮里，但是从大部分作家保持观望或无动于衷的态度看来，“文人下海”这回事，在中国大陆大概一时还不能构成气候。在采取相反立场的作家之中，王蒙说得最直接，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写作，各行各业一哄而起“下海”，到底是一种幼稚和偏激的做法。另一位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也不予苟同，她表示下海容易回来难，文化人从商后，生活方式和思想会随着改变，从商后不一定可以再回

到文化工作岗位。

文人下海在中国大陆是新鲜事儿，引起各方的注意是意料中事，可是在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界又是怎样一种景观呢？

先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吧。在大马这样一个奉行民主自由的商业社会，任何人从事什么行业，全凭个人意愿选择，根本不成问题，文人也一样，有一天当他厌倦于笔耕生活，置身于金光闪烁的商业世界，就像受薪阶级更换一分职业，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我们这里的文人分布在社会各行各业，有的是专业人士，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私人机构的雇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他们尽管兴趣或志在写作，却不能视写作为正业，这种情形囿于客观环境，我们的社会迄今还养不活职业作家，是形势所使然，非人力所能阻止。在这一层面上，马华文坛也好，新华文坛也好，作家的处境和待遇，无法和中国大陆拿工资的文人相提并论，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笔耕，诚然是一桩清苦的生涯。而人各有志，有些人熬不住寂寞而弃笔从商，寻求更好的“钱”途，在新马两地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因此，文人下海不出奇，人们所关心所想知道的倒是：下海之后又如何？是否还保持对文艺的一番热诚，抑或一去不回头？从事实来证明，许多早年以“文艺青年”自居，后来脱离文坛，到商场上大展身手，一朝“上岸”后便绝口不谈文艺，甚至视文艺写作如毒蛇猛兽，其行径作风比商人更商人。另一方面，自然也有人于商界得意之余，还会回头兼顾文艺事业，不过为数是

少之又少哩！

文人下海后“一阔脸就变”的现象，自然不是到处都如此。像泰华和菲华文坛，在程度上便有很大的不同。我有幸参加两届分别在曼谷和马尼拉举行的东合华文文艺营，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这两个地区的文坛中坚人物，他们泰半以上来自商界的写作人。他们之中，有的是报社社长，有的是船务业巨子，建筑界大亨，有的是珠宝商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年轻时代舞文弄墨，事业成功后也不放弃写作，不时还有著作问世。可他们没有一副暴发户式的嘴脸，和国内外的各个不同阶层文友平起平坐，一起讨论，一起游戏，一起品茗唱和，凡会议例必出席，不敷衍塞责，不自恃不凡。我想，这社会如真有“儒商”这号人的话，他们才是真正如假包换的儒商呢！

总之，文人也好，作家也好，下海之后倘然不忘文艺，更以金钱物质回馈社会推动文化事业，肯定能发挥其正面的影响作用；否则，心眼里只有“阿堵物”，越多的文人追随经济的大潮起伏浮沉，对已然萧条的文坛，又焉知是福还是祸？

(21·8·2004, 《南洋商报》言论版)

文学的倒退

千禧年伊始，回顾过去百年历史，大马华裔经过迁徙期、垦殖期到落地生根，从侨民身份到今天的公民地位，而社会的变迁也出现多次转型，从农乡耕殖、家庭手工艺、中小型工业晋至现代化企业；而每一次的转型，或多或少为物质文明开拓了疆域。可是，在精神层次方面，我们的高档文化又有多少精进呢？答案是颇令人沮丧的。

以马华文学来说，如果单从文学人口数字作比较，发展到了世纪末，似乎有倒退的现象。早在50年代，马华文学作品销路很好，像方北方的《迟亮的早晨》、姚紫的《咖啡的诱惑》和马阳的《沙河岸上的恋歌》，都是一版再版，有的甚至印了六七版之多，销量数以万计，成为青年学生的喜爱读物。可是到了70年代以后，一般的马华作品，往往要卖上1千本都难，特别是诗集，有些作者只印区区几百册，到头来还是存货一大堆。

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马华文坛，泱泱大国如中国，也一样出现“文学滞销”。在那里，诗家也有印几百册卖不出去的例子，人家是文学大国，尚且如此，可见文学大

倒退的现象不是单一地区的事，而是世界性的。所以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我想跟物质文明发展得太快很有关系。

今天的世界，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特别是进入电子时代，谁不懂操作电脑谁便有落伍的恐慌，大堆电脑产品推出市场，当你才开始认识它们时，又有新的产品面市，把旧的挤出圈外。这么一来，现代人唯恐被时代抛在后头，要学要看的東西多了，生活节奏也快了，多少人还有闲情雅致去读文学书籍？

过去，马华文学读者以学生占的比例最大，而现在的中学生或大专生，在功课、考试压力之下，他们所选择阅读的，都是和升学考试有关的读物，除非学生本身对文艺兴趣浓厚，不然课余的消遣五花八门，怎么选也不会选中文学读物的。

教育越普及，照理高层次文化应水涨船高才对，可是事实上却相反。

你说物质文明发展得太快，造成读书人口直线下降，但是看看西方国家，人家的科技不是进步得更快，却不见得人家忙着追求物质所需而放下书本不顾，又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应了外国人所说的：“大马华人除了赚钱，别的都没甚兴趣。”？

中华民族是个知书识礼的民族，许多龙的传人都会大言不惭地夸耀祖宗5千年的文化，好像出自这个龙族的胚种一定是佳品，很少人会冷静思考本身哪一点哪一方面足以炫耀、足以配称龙种而无愧于心。

柏杨说华人是个“爱进学堂不爱读书”的民族，真是一

语道破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我们这里，华社领袖谈到文化，大半只懂得舞狮舞龙或书法，以为有了这些便拥有中华文化的全部。他们没兴趣读书，不懂得马华文化，对于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更是懒得一顾。

华社领袖尚且如此，我们能期望一般普罗大众的素质会高到哪里去吗？概括地说，读书风气的营造，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相辅相成，没有书香家庭，会有书香社会吗？没有书香社会，会有知书好礼的族群吗？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3·3·2000, 《南洋商报》言论版)

为奖金而写作

一个听来的、流传在文坛已有一段时日的故事：

一位参加征文赛得奖的作者，当有人问起他的作品何以那么少见时，他的回答是：“我要用一年的时间写完一个小说，那里还有时间写别篇文章？”

“那你的作品都是投到什么地方？”

他的回答更妙：“我没有兴趣投稿，因为我的努力和稿酬不成比率。我写作是为了参赛，为了得奖。每年只要一篇上榜，好过写几十篇的稿费收入，我又何必花时间精力去投稿？”

这个故事如果属实，我不得不佩服这位文坛新秀的率直和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

毕竟时代不同了，连写作这回事，也随着社会的演变而出现新的面貌。

过去的文艺青年，如我辈，把写作和投稿视如第二生命，其执着和狂热的程度，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大家抱着“只问耕耘”的态度，日写夜写，目的是为了发表。作品发表，有稿费固然可喜，即使不发分文，也照写照

投不误。那时的报纸杂志文艺副刊园地不多，在粥少僧多情况下，稿件见报率不高，有幸被编者垂青录用，比中彩票还高兴，那里会计较稿费的多寡？而且，那时文坛也甚少有什么征文比赛，即使有，奖金也不如今天动辄五千一万那么丰厚。就像六十年代《教与学月刊》主办的全国征文赛，奖金不过比报章的稿费略高而已，据说参赛作品将近千篇，于此便可想见一斑。

照理，今天的征文赛奖金大幅度提高，必然会吸引更多人参赛，可是事实却适得其反，一般上收到的稿件都不会超过百篇，这又是什么原因？

资深作者不屑今天的文坛新秀为奖金而写作，然则他们本身过去对文艺的热忱，何以消退得那么快？是为生活所累改行从事他业，还是已经视写作为畏途？

难怪有心人会为此发出感叹，总觉得马华文学永远长不大，永远靠着一批年轻人在支撑门面，维持一个表面上看来生气蓬勃的格局。当年轻人接触社会面广，世故多了之后，越来越沾染功利主义的色彩；当他们想到一篇上千字的稿子，要花半天的时间完成，所得不过区区一二十元的稿酬，比起大商行一个杂役一天的收入还不如，有几个人不会背弃“文艺女神”而他去呢？

看来，前面提到那位为奖金而写作的青年作者，利己之心虽强了些，到底还保留前辈的几分“傻劲”。当这丁点可贵的“傻劲”都失去时，那才真正是马华文学的悲哀哩！

(17·2·9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家地位

台湾学者龚鹏程最近来马，在一个座谈会上，有人问起台湾新一代作家的情形，他的回答是：新一代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和上一代人有显著和具体的不同，他们脑海里无所谓传统和伦理关系，眼中无所谓文坛前辈；他们出现在文学舞台上，自觉灯光是照在他们身上，他们看不到别人。

这种情况，我想不仅出现在台湾文坛，世界许多地区都是如此。大马的情形也不例外。

老作家或许会感到“被冷落”滋味的不好受。试想，他们之中，有的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事业，默默耕耘，才建立起今天的声誉和地位，那些初出茅庐的后生，居然不把老前辈放在眼里，甚至还要抹煞他们的贡献，如何不教人气愤难平？

对于新一代作家的“目空一切”，老作家其实不必大动肝火。在作出评估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他们针对的方面，到底是作家的名气还是作品，再看看他们发表的言论（最重要是拿出作品），我们就可以心平气静地进行一番

自省或反击。

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新加坡文坛闹了一件大“风波”，一位戏剧界权威（也是报界红人）在他主编的副刊上，用了很大篇幅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将一位来自宝岛的小说家（应聘到南大任教）骂得体无完肤。这位权威骂小说家所写的《中国戏剧史》是抄袭之作，很多资料是从他的有关著作里抄来的，又不注明出处，显然是对权威不敬。那位小说家当然也写文章回敬对方，除了阐明自己编写的史书引用别人写过的史料并无不当之外，更特别提到权威对他的不满，主要是她来到异邦，没有特地登门拜访，在写戏剧史之前，没有照会对方，才惹起权威大发雷霆向她“开火”。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权威的小家气却不脛而走，徒然成为圈内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作家和批评家，同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只是扮演不同角色而已。理论上是有批评才有进步，但是作为有出息的作家，对于那些充其量只有李逵“三板斧”功夫的批评家的挑剔，其实是大可不必介怀的。批评家要靠作家的创作提供他们耀武扬威的机会，但是古今中外文坛何曾见过以骂人为快的批评家盖过作家的锋芒？

还是韦晕先生说得好：作家不必为自己的名声担心，来自作品本身的地位的建立才最重要，如果站不稳，不必推也会倒。反之亦然。批评家不如积积德、修修行，总比空嚷瞎喊来得好！

文人相轻和朋友主义

世人读书多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因见三几文人恃才傲物，互不往来，便讥之为“文人相轻”，后之人拾其牙慧，不审时度势，无视文人之间互重美德，偶有争执，便嗤之以鼻，本人则置身度外，俨然以清客自居。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重或相轻，涉及人生观、思想和性格等种种因素，所谓物以类聚，志趣性格相近的较易结合在一起，反之便会疏远，这是自然的现象，无足怪哉。

我们的社会，充斥各行各业，各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团体组织，即使是同业之间，也经常为切身利益问题互不相让，勾心斗角，其中的黑暗和肮脏，诚不足为外人道。工商界之外，政坛的暗潮汹涌，翻风作浪，是敌是友，常不能有清楚分界，杀伤力之强，根本不是文人的“文斗”所能望其项背。

然而，偏是有人看不清这些活生生的客观现实，一味强调文人的相轻，企图抹煞文人对国家社稷的贡献。论客们大概小觑了一介文人，以为照搬古人的滥调，便可以掩饰本身许多见不得光的劣径败行。

除此之外，近来忽有人大谈“朋友主义”。这些人的论调，乍听之下，倒是新鲜动人，因为敢言人所不敢言。一轮感叹之后，论客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振振有词曰：原来文场作品素质的下降，原因无他，朋友主义是罪魁祸首也。只要把这块“朋友主义”的招牌拆下，我们的文坛从此可以欣欣向荣矣。

妙哉斯言！论客们一边力斥文人相轻，一边极力反对文人的结社。（自然，由于担心触犯众怒，便巧立名堂，朋友主义便成了替死鬼）。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派，不满这个，反对那个，实际上，他们却两者都是。既同意文人相轻的调调儿，让有心结社的人一拍两散，成不了气候；同时又怂恿“自己人”组朋友主义阵线，以显示乌合之众的声势。

呜呼！所谓“文人相轻”，所谓“朋友主义”，说开来，不外是一小撮落寞文人的自弹自唱而已！

（10·11·1985，《南洋商报》南洋茶座）

中学生不知道方修

报载：雪隆二十余间国中最近举行“中国文学史普通常识比赛”，参赛者对中国文学史题目都能对答如流，而主办当局穿插的三题马华文学史题目，结果竟无人答中。

这三个难倒全场与赛者的题目是：

●从中国南来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的人是谁？

●《海滨寄简》作者是谁？

●编撰《马华新文学大系》及《马华文学史料》的人是谁？

其实，这三个题目都很普通，只要平日有稍微注意马华文史的人，都不难找出答案。如果连郁达夫、连士升、方修这几位知名度高的前辈作家都一无所知，则中学生对马华文学认识贫乏的程度，应是不难想见。

造成这样的偏差，追究起来，不外有三个因素：（一）老师不重视马华文学；（二）学生忽略马华文学；（三）课本问题。这三个因素，其实都有所关联，也是互为因果的。

老师不重视马华文学，可能连马华文学是什么也茫然无

知，又如何期望他进一步灌输有关马华文学史料给予莘莘学子？至于学生们，一般的学习态度都是被动的，缺少老师的指导，要他们主动的去翻阅马华文学史，到底是一件难事。

再说课本问题。目下中学华文课本，不管那种选本，都是漠视马华文学的。从课文的比例看，马华文学还占不到十五巴仙。许多中学生谈到巴金冰心，可以一口气把他们的生平背诵出来，但是当你问起方北方、韦晕是谁时，他们也许要瞠目咋舌了。远在海外的作家耳熟能详，近在国内的作家却全无印象，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从雪隆地区中学生对马华文学史认识的贫乏来看，相信国内其他地区的情形也好不到那儿。对此，华教界文化界人士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认真看待母语教学方面出现的偏差，并做出适当的补救。我们也希望那些口喊维护马华文学的人，以实际行动，接纳最近“为华社开拓新境界”研讨会上通过的建设性意见，在编纂华文中学课本时，落实“尽量采用马华文学作品”这条议案。

(1985年5月，《南洋商报·南洋茶座》)

写作这行业

在一般人眼里，写作人煮字疗饥，是不会有前（钱）途的。

本地华文报章发给作者的稿酬，每千字平均十元至二十元，这样菲薄的数目，一个写作人即使日写夜写，每天都有作品上报（而享有这份殊荣的，大概只有区区可数的专栏作者罢了），月入也不过五六百元。这样的收入，以目前高昂的生活指数，要养活自己已不容易，更遑论照顾一家大小生计！

有人说，从事文学工作，是属于上层的文化建筑，是讲心不是讲钱的。换言之，文学诉诸心灵活动，追求的是精神生活，它的价值不能以物质去衡量。说是如此，可是当一个作家贫病交加，生活潦倒，到那个地步，社会又有多少仁人君子肯施以援手？世人一边要求作家拿出有血有肉之作，一边却无视他们的可悲处境，试问有多少作家在现实跟前，还能坚持原有的理想和信念？

本地文坛，许多人早期是文艺青年，曾经积极活跃一时，后来越写越少，逐渐消失于无形。这种现象，是不能单

怪写作人。毕竟作为一个社会人，正如鲁迅所说的，必须在生存和温饱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展。如果写稿换取不到起码的生活必需，谁还有心从事文学创作？

最近，中国作家苏叔阳来马访问，谈起中国写作界的情况。他说，大陆的作家把加入作协看是一件荣耀的事，因为政府重视作家的心血结晶，一位列在一级的作家，可以享有二级公务员的薪俸。在这种有利的客观环境下，作家心无旁骛，又无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将作品写好。那里的作家，也不需要为出版的事操心，只要作品交给出版社，一切出版和发行的琐碎事务便有专人负责，完全无需作者插手。

这里的情形则是，即使你写了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恐怕也难有出版商对你青睐。出书自掏腰包不说，大堆随出版而来的拉杂工作全得作者一脚踢。倘若没有门路，书出了要找学校或学校寄卖，尚且还是一大问题呢！至于书款何时有着落，更是天晓得！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是始于今日。二三十年前，写作人视出书为天大难事，那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气氛淡薄，写作的事除了圈内人，外人根本连提都懒得提，居然一两千本的文艺书，都还有法子销得出去。今天的情形，比起五六十年代，当然有显著的不同，各种文学奖征文赛、座谈会和文艺营层出不穷，非文学界人士也大谈特谈文学，可是马华作家的待遇是不是有了改善？马华文学作品是否受到尊重？大家心里有数。

(8·1·1990, 《光明日报》专栏)

“文艺税”与其他

最近，有人针对稿费问题提出“文艺税”这个名堂。

作为消费人，我们知道样样商品都有征税，国库需要庞大税务才能支付国家一切发展设施。在商品之外，还有什么“遗产税”、“所得税”、“印花税”、“路税”、“门牌税”等等，却从来没有听过所谓“文艺税”。

原来，提出“文艺税”之士，他是指报章每年为开辟文艺版而耗费在纸张方面的数目高达一百万元，羊毛出在羊身上，每个读者在阅读之际，他便已经缴付了“文艺税”。

每年以百万元来作为支持文艺版的代价，乍听起来，诚然是个大手笔。可惜，在指出纸张耗费的同时，我们不清楚有关报章支付给写作人的稿酬数目，无从得出一个整体的比较。

事实上，华文报章设有文艺版，每周充其量只有两期，遇到广告挤时，文艺版往往首当其冲“消失了”。比起常见的副刊“娱乐版”、“妇女版”来，文艺版所占的比例委实微不足道。而一百万元的缴付“文艺税”之说，未免言过其实，复且有误导之嫌。

一家报纸要生存，必须成本和广告达到至少平衡的地步，这是常识。副刊要容纳来稿，来稿要付出酬劳，这是成本开支的一部分，毋庸置疑。报章从庞大的广告入息里克扣微薄的稿费支出，根本就不应成为问题。而读者在获得丰富的精神食粮之余，并不会计较已缴付大量的“广告税”，又那里在乎区区文艺版“税务”呢？（如果真的有所谓“文艺税”的话）

我们钦佩华文报章长期以来在发扬中华文化和支持马华文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然而他们也无需气馁，他们的付出不是无价的，众多写作人必然会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做出回馈的。

（19·12·1988，《星洲日报·星云版》）

新诗的明天

1.

新诗的发展与出路，目前来看，的确是面对了瓶颈问题。

新诗的读者一向都处于“小众”情况，这情形不仅在华文诗坛，相信是个普世的现象。

在马华文坛，据非正式估计，文学人口只得1千5百人左右，而诗歌是冷门中的冷门，别说千人难得，即使再打个五折，一本诗集能够销到5百册，已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这种惨况，当然不是始于今日，也不是一时一地的事。似乎社会越文明越发达，文学的老祖宗也与人们越离越远。现代人在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之余，即或要找一些精神食粮，很肯定的，诗歌不会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

诗与现代社会真的已渐行渐远了吗？

2.

新诗出现目前的困境，到底是谁的责任？诗人本身还是读者问题？抑或是大势所趋？这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先从诗人谈起。

当前，许多人在谈起新诗时，不是讳莫若深，便是嗤之以鼻。这就形成了两个极端。

爱诗的人把诗捧得半天高，以为那是文学中的最高殿堂，非普通俗人可以轻易进入。作为诗人者，一旦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写起诗来，便任凭灵感意识四处流窜，至于诗写出来有没有人欣赏，似乎可以一概不管。

对普通一般读者来说，他们对诗的认识，先已有高不可攀的想法，如果诗人又故弄玄虚，那后果肯定会把读者吓跑，甚至原先存有的一点好感也一扫而空。这时在他们心目中，诗不再是美的象征，而是令人难以亲近的怪物。

一旦读者对诗的美好印象破灭，诗在社会的地位，只有越来越边缘化。这种现象自然也造成诗歌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窘迫。

站在诗人的立场，他们不见得能够认同诗读者人数与日俱减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或许会问，即使真的把诗写得口语化，诗内容尽量贴近社会现实，让人人看得懂，诗的读者难道就会普及起来吗？

问题的症结是：现代社会还需要诗吗？

悲观论者以为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诗最终会绝迹，诗人也将慢慢隔绝于社会，逐渐为世人淡忘。

当然抱持乐观看法的人也不少。诗和其他艺术（绘画、音乐、戏剧、舞蹈、建筑、雕刻），经历那么悠久的岁月，不管处在怎样的时代，面对怎样的社会，都一直保留下来，过去如此，将来必然也一样。

只要一个社会还需要精神生活和人文关怀，诗和别的文学必然也会生存下来。

3.

在当今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有太多选择，文学和其他艺术往往被一般世人忽略，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但是小说家也好，诗人也好，都不必要为这样的客观现实感到沮丧。

随着时代的演变，另一个值得诗家深入探讨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写下了时代需要的好诗？诗人的杰作是不是具备强韧的生命力？还是像一些朝生暮死的昆虫那样，创作目的只为“曾经拥有”而已。

论者当中不少还是文学中人，他们往往忘记身在何处，拿唐诗宋词的成就作为贬责现代诗人的凭据。事实上，现代诗人即使旧诗写得再好，谁又能和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互相比美呢？同样的道理，陶渊明李清照如果活在今天，要想不改弦易辙而仍独步诗坛，恐怕也是一种梦想！

毕竟时代不同了，新文学运动迄今已有80多年历史，新诗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果，虽说没有像小说散文般的标青，到底也不全然乏善可陈。只要新诗作者认清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知道自己身上的脉搏是和时代共跳动，写出来的诗富含生活气息，那么即使文字较差些，技巧较笨拙些，也强胜关在斗室里犹如梦呓般的呻吟。

因此，对于新诗的前途，我仍然抱持信念。任何一个社会，不管现代科技发展如何迅猛，物质生活如何丰盈，总还是不能缺少精神文明的补给。只要人类对生活的审美需求一天不止息，文学艺术便有它存在的价值。新诗，当然也不例外。

马华文学何去何从

“迈入21世纪的马华文学”研讨会讲稿内容摘要

1.

老作家人生经验丰富，加上坚实的文学根底，如果尝试在长篇小说方面着力，或许可以为马华文学带来一些新的成果。

2.

当前的文坛，写作的人不少，但是能够持之以恒的作家却为数不多。这十多年来，文学活动搞得风风火火，《星洲日报》的花踪文学奖，华团每隔两年的马华文学节，提供了许多机会给写作人创作佳作，也栽培了一些青年作者，但是整体成绩并不见得出色。

3.

文坛当前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奖项多，好作品少。而有的作者平时少有创作发表，到了比赛季节来临，便到处投寄作品，成为得奖的常客。这些人似乎全为奖金而写作，对发展马华文学来说，这种现象无疑是个大讽刺。

4.

新生代的爱好文学者，很少把写作当作人生追求的一项

志愿，不像前辈作家，当他们认定目标后，便能够努力不懈坚持到底，即使在恶劣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过。年轻一代由于出身、教育背景、社会环境、时代思潮等因素，与他们的先辈有着颇大落差，造成彼此之间无论是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各方面出现歧异，加上现代生活内容丰富，年轻人可以选择从事的项目很多，写作这领域吃力不讨好，不能符合他们“急功近利”的要求。开始时期可能还存有梦想，但是一旦遭遇挫折，便不能面对考验，很快地在这个领域里做了逃兵。

5.

年轻人的叛逆，每个时代都有。从进化论的观点看，传统中如果没有一些叛逆的基因，一个民族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将很难看到进步。文学也一样，如果作家们只有一味的继承传统而缺少现代的精神，文学最后一样会变得死气沉沉，没有生机。

6.

年轻作者要求创新，力图超越前辈作家的决心可嘉，但是他们忽略了，任何发展都必须立足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凭空得来的。他们蔑视前行者，认为代表五四精神的写实主义过时，早期的马华文学作品更为他们所看扁。

7.

不错，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作品，是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启发而发展开来，它在萌芽时期之作，诚然带上五四的标志而亦步亦趋，可是到了国家独立后，众多土生土长的新生代作者开始摆脱五四的阴影，逐渐建立起马华文学的特色。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地方色彩，作品的背后，除了

一个广大的大马华人社会，还有多元民族、宗教、文化交融汇集的社会面貌，这些形成了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格，也使它和中国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华文文学在题材、思想感情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是马华文学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人可以任意加以歪曲的。

8.

在“经典缺席”问题提出来之前，并没有人为马华文学是否产生经典之作议论不休。事实上，老作家穷一辈子的努力苦心经营，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股使命感，希望通过文学带给世道人心以潜移默化影响。他们不为名，更不为利，从来不去担心作品的传世与否问题。毕竟，一篇作品的传世与否，不是可以随作者本身主观意愿作出决定。年轻作者不在创作上力求突破或超越，一味担心这个害怕那个，不是显得杞人忧天吗？

9.

今天的马华文学出现一些反传统现象，很多年轻作者喜欢我行我素，爱怎么写便怎么写，完全不把读者放在眼里。他们刻意在作品里卖弄文字技巧，不理读者看得懂看不懂。他们追求所谓艺术美，把“载道”视为老古董，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传统是沉重的包袱，都是必须弃置的废物。流风所至，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外表看去如七彩宝塔，美是美了，可是细看下去，你可以发觉在美丽包装底下，尽是个人的无病呻吟，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根本挂不上勾。

10.

如何端正写作态度，仍然是当前马华写作界必须认真看待的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地位的建立，首先当然要有好作

品。好的文学作品，它的生命力必然旺盛。而文学的生命力来自生活，来自民间的语言，那是活在人民大众心中的语言，不是纯粹唯美的死的文字。

11.

文学作品通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形式呈现，正是作家人格与艺术修养的综合表率，所谓“文品如人品”，正是此理。如果一个作家在创作之际不从大的方面考量，去写出时代风云、社会动荡、民族忧患意识，以及民间可歌可泣的种种事迹，却老是在渲泄个人的灰暗情绪意识，对读者对社会无异也是一种灾害。

12.

马华文学理论建设，尚还未能进入引导创作的佳境。谈论马华文学的人多，真正有系统地言之成理，可以当成一家言的文学评论之作少。写理论批评文章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史有深入涉猎，对各个时代作家作品有一定认识，要掌握文学思潮跳动的脉络，做起研究工作才有本身独到的见解。可惜的是，一些搞文学理论的人，对马华文史都不曾好好阅读，一开始便心存成见偏见，用狭隘的目光治学，自然很难期望他们在理论建设上会有什么突出的成绩。至于外国作家看马华文学，如果对马华社会了解不深，对马华文学几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搞不清楚，加上所读的马华作家作品有限，自然也难有可观成效。

13.

文学理论追随文学创作，必须同步发展，文学才会有进步。一个作家如果只是潜心于写作，对理论毫无涉猎，写了一个时期也会出现瓶颈。有了理论基础，再从阅读各种不同

艺术形式表达的作品，才懂得分别优劣，才懂得吸取他人长处补自己的不足。只是一味的写，尽管量上是可观了，但若素质没有提升，也会影响一个作家的继续成长。对肯求上进的作家来说，重视质的提高，应远过于量的增长；能做到“质中求量”，作家才可望超越别人和超越自己。

14.

理论是理性思维。写文学评论要客观，站在高处，居高临下，视野较广，看得也清楚。创作是感性思维，写小说散文诗歌，作者主观意识决定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呈现手法。过于拘泥于理论，作者难免眼高手低。理论可以帮助一个作者提升鉴赏水平，却不能保证一定写出好的作品。

15.

文学作品来自生活，作家撷取现实生活作题材，通过艺术加工，作品所反映的应高于生活，这样才能符合艺术的审美要求。如果作品和生活没有什么分别，也就没有所谓艺术了。

16.

本地华文报章在推动马华文学方面，尚有许多需待开拓的地方。当前，报纸的副刊文艺气息愈来愈稀薄，除了三两家还有文艺版之外，大部分报章的副刊都在追赶时髦，刊登的尽是迎合潮流之作，乏善可陈。即使那仅有的几个文艺园地，所刊登的作品，在素质上也是令人质疑的。年轻作者所写多的是属于个人情绪的渲泻，内容多与生活无关。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和编者的个人偏好离不开关系。为何编者不能拥有开放的胸襟，广采各家各派之作，让读者欣赏到来自生活各层面的作品？为何不打开多几扇窗口，让读者呼吸到

多几口带有泥土气息的、自然的空气？

17.

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学也是开放的。在文学的天地里，百花自由开放，百鸟自由鸣唱；而报纸是社会公器，不是小一部分人的禁脔，报章副刊理应照顾社会各阶层读者的趣味，而不是以三几个人的趣味为依归。可悲的是，当前大马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是封闭的。

18.

报告文学是马华文学中较弱的一环。实际上，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很多科班出身，他们对文学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创作能力。在跑新闻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社会各行各业人物，如果报馆能提供版位，鼓励他们从现实题材中，把一些值得写的人和事，经过筛选整理，用报告文学形式写出来，发表在本身工作的报纸上，对于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将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19.

未来马华文学的发展，主要还得看年轻一代的表现。年轻作家要建立本身的地位，必须靠作品说话，而不是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更不是以欠厚道的行径去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马华文学拥有80多年的历史，本身虽有不足之处，却也有别人所没有的独特的地方，根本无需妄自菲薄。放眼世界没有错，但是总要有个立足点，你的立足点在那里，是众多有心发展马华文学的朋友所应深切思考的事。

（写于2002年11月中旬）

“弃儿”永远长不大

马华文坛近年新秀涌现，在好多个征文奖赛会中夺标，“长江后浪推前浪”显示一片朝气蓬勃现象。依此情况来看，马华文学不愁后继无人，委实是一件令人鼓舞、欣慰的事。

作家是需要培养的，尤其处身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写作在一般人眼里，不仅看成是雕虫小技，也是没有出息的工作，靠写作维生的例子，在本地似乎还不曾有过；每个人忙着找钱养家活口，忙碌之余，绝少再会进行绞尽脑汁的爬格子工作。这也就是为何许多人年轻时代喜欢文学，到了后来便弃笔不写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也有人这么调侃：马华文学永远长不大！因为它的作者群像潮水那样，涨潮时涌上一批，退潮时便消失踪影，接着，又周而复始，文坛总是新人多、旧人少。这种情形，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发生过，以后会不会有改变呢？谁也不敢乐观。

就拿六十年代为例，那时文坛涌现新生代，有写小说的，有写诗歌的，有写散文的，各擅胜场，阵容强盛，彼此

年龄相差不大，大多在二十余至三十之间，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从小接受正规的华文教育，有相当扎实的文学根基；不论小说、散文、诗歌，都各有本身的特色和风格，经过一个短暂的“习作”时期，很快的便能独树一帜，和老作家不遑多让。可是，如果我们做一个点算的话，当年活跃的文学青年，到今天仍然创作不辍的人数，恐怕还不及十巴仙吧！

造成马华文学队伍永远“残缺不全”的原因，客观和主观因素都有，任何一方面都有责任。而当写作在此时此地仍然被人视为冷门的行业时，这种“潮汐”式的文学现象，更是不足为奇。从事文学工作，我看就像一场马拉松竞走：出发的时候，人潮汹涌，每个人争先恐后，跑起来健步如飞，虎虎有威；几个回合以后，开始有人跑不动，速度放慢，能够坚持到底跑完全程的，大概还不到参加人数的一半。相反的，如果是百米赛跑，这样的事，相信是绝难发生的吧？

对于发展马华文学，有人建议作家与企业家合作，以企业家的“财”势配合作家的“才”力，或许可以打开一条生路。这样的构想在本埠尚属创举，理想是理想，但实行开来还有许多亟待克服的客观上的难题。论者也以中国大陆为例，强调文人下海带动整个文场的生气蓬勃，他们邀请企业家参与作家的组织，参与杂志刊物的出版工作，打破以往“局内”与“局外”人的藩篱。像《广州文艺》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份纯文学刊物通过企业组织的方式，拉拢一大批对文学发生兴趣的商家加入杂志社的理事会，每人每年给刊物一定数目的赞助费，使刊物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得

以长期生存，据说，《广州文艺》在此一新浪潮的冲击下，稿费大幅度提高，作家阵容强大，销售量也直线上升，成为国内当前另一个文学重镇。

马华文学要争取“一次过”的捐款不难。从过去到现在，不少团体主办讲座或文艺营，便是靠这种方式筹到经费进行活动。然而，文学工作就像别的文化事业一样，需要持久和不懈努力才能期有所成，这一来，究竟有多少商家愿意长期性赞助文学活动呢？这便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就拿作协来说，这个组织成立已经十五六年，除了拥有一间组屋格局的小会所外，较大型的活动都要靠热心人士赞助才能展开，像工作营、文学作品展、文学之夜等，无一例外。这个组织在成立伊始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筹款，所筹款项在扣除购置会所之后，余额便存入银行生息，每年用利息出版会的出版物和维持会的经常开支，整个会的经济情况，可以用“惨淡经营”一句来概括。

而今天的马华文学，如果和八十年代以前比较，情况自然有了许多改善，然而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弃儿”的命运。放眼未来，它在自力更生的同时，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策略，有效地奠定它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朝更大的领域开拓发展。有鉴于此，我想一个马华文学基金会之类的组织，势有必要在短期内给予催生。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可以由作协发动成立，成为作协的一个附属机构。通过基金会，可以名正言顺地向社会人士筹募文学基金，然后由基金会拨出一定款额赞助马华文学各项活动。假设基金会能够一次过筹到一百万元的基金，每年单是利息，便足够应付几项大型活动

的开销，无需再向外界请求伸出援手。这么一来，作协既能做到“以会养会”，行有余力，还可协助文友解决出版和发行上的难题，岂不是更有意义？

马华文学要长大，从现在起培养多几个“长跑”者，看来是有必要的。

(2·10·1994, 《南洋商报》言论版)



为什么要读马华文学史？

什么是马华文学？

早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宗笑话。当大马华文作协刚刚成立之初，要向社会人士筹款，由于这团体的名称，有好些人表示反感，以为那是马华公会的组织，不愿意赞助分文。过后要由作协主席出面澄清，才平息一场误会。到八十年代中，我在一间独中担任写作班导师时，在分给学生作答的问卷中，有一题是要答者举出三位马华作家的名字，结果，不少人的答案竟然把马华公会几位要员，像李三春、李金狮等人，都当作是马华作家。望文生义，既闹出了笑话，也显示华社对本身文学的无知。

本国人尚且如此，外国人对马华文学更讳莫如深了。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中国人以为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华人用马来文写的文学作品，而对我们华裔使用母语进行创作表示惊奇。去年中，我还在广州中山大学为中文系学生讲了一堂有关马华文学的课，从他们所发问的问题，可以看出他们对马华文学认识的肤浅。这完全是过去在文学上长期以来单程交通的结果，随着马中关系的建立，交流情况改进，今后这

种“有来无往”的情况应该获得改善。

马华文学，就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简称。在马新分家（一九六五年）前，它原本是包括新华文学在内的总称，但由于政治上的分隔，马新的文学也一分为二。在一九六五年以后，马华文学便单是指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则改称为新华文学，以示区别。

在文字上，马华文学是指使用白话文，创作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文学作品，并不包括文言文的创作。以体裁而论，马华文学作品计有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戏剧、报告文学和文学批评，其他议论性质的时评，政论散文等则不包括在内。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为什么要读马华文学史？

马华文学的历史接近八十年，它是随着中国新文学运动兴起而在我国萌芽起来的。最早是由一批南来的中国文人在此地播下文学的种子，然后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华人加入创作行列，从战前到战后，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建国，从马来亚联合邦到马来西亚，它经历了启蒙期、转型期、成长期等多个阶段，那发展过程有起有落，有高潮也有低潮，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换句话说，马华文学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它忠实地留下了每个历史阶段可歌可泣的人事与世事变革，从大量的马华文学作品里，我们知道发生在各个年代的重要事迹，反映了每个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令后人在阅读的同时，无形中 also 获得教育和启示，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马华文学史也可以当作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

里，我们透视早期马华文学草创阶段的艰辛和苦难，了解在殖民地时代，我们的祖先如何挨受欺凌和压迫，过着怎么一种非人生活。我们还可以从先驱者的心血结晶里，追踪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的工商社会的脚印。有些人或许抱着不屑的眼光，回头嘲笑先贤的幼稚和肤浅，不以继承祖先宝贵的文化遗产为荣，他们不愿翻阅马华文学史，不读早期作家的作品，对于谁是曾圣提，谁是铁抗，一问三不知，根本谈不上关心马华文学。这些人的心态，就像一个败家仔，当有一天周旋在上流社会时，他转回头却不认他那老土的乡芭亲爹为父，叫人感到难过与恶心。

很多人对马华文学史不甚了了，也跟人背后大谈马华文学，闹出不少笑话。远的不说，近的就三两个月前，有位来自海外的名家，在受邀谈马华文学时，竟然呼吁本地作者放弃移民心态，加强本土意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来西亚建国已超过四十个年头，华人老早就把这里当是自己的国家，哪还有什么“移民心态”？实际上，早在二三十年代，华人便已把这片土地看成和生命一样，是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时已开始摆脱侨民意识，决心要融入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这点可以从早期的马华文学作品里得到印证。从那时的马华文学作品里所流露的乡土色彩，所反映此时此地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可以证明华人对这个国家的爱护和眷恋。令人遗憾的，到今天九十年代，一个历史上已是老掉牙的课题，竟然有人糊里糊涂的拿来大作文章，这个玩笑也未免开得太大，对于海外不了解马华文学的人士，这样的误导也实在太过分了。

其实，海外名家大谈“移民心态”，摆了个大乌龙事小，引起当局对华人效忠国家产生质疑才是事大，搞不好的话，还会被别有用心种族主义者拿来当作煽风拨火的口实，对一向爱国的大马华人必将带来另一场祸害。因此，有关昧于史实的夸夸其谈，凡是对马华文学有认识的人士，都应该挺身而出加以澄清或驳斥，以正视听。

日前，我国文化部长在向报界发表谈话时建议，马来西亚华人应改变“大马华裔”称号为“华裔大马人”。部长认为，目前普遍使用“大马华裔”的称号，应是指那些从大马迁移到中国定居及获得当地公民地位者。部长作出这样的建议，多少和华人的效忠问题有关。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具有针对用意，部长这番话刚好落在海外名家大谈马华文学后不久，虽是异曲，却多少有不谋而合之处。


实际上，“大马华裔”和“华裔大马人”这两种称谓，都没有什么不当，分别只是对外与对内的差别吧了。当你以国民身份，在面对外人时，不管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都一律以“大马人”自居，不必称什么“巫裔大马人”、“华裔大马人”、“印裔大马人”；而在国内，当马来西亚人要区分他的种族背景时，那么，用“大马华裔”、“大马印裔”作为区别，那是很正常的做法，实在无谓花时间在名称上大作文章。幸好部长的建议没有引起太多争论，说明很多人都知道所谓效忠不效忠，现在都已经不再是个争议的课题，就像马华文学，它老早已成为马来西亚文学的一部分，它是道道地地的本土文学，它所反映的思想、感情、生活，完全属于马来西亚人的，具有国家意识，具有

地方色彩，本质上和马来作家和作品无分轩輊，差别只在运用的语文吧了。

而马华文学起源于中国五四新文学，在最早时期，它和中国文学关系密切，甚至是中国文学的“附庸”，但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国民本位的建立，本土意识的加强，尽管使用同样的语文，实质上却有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就像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香港文学与新华文学，同是华文创作，马华作品，和泰华，和菲华，和印华，和澳华，都是形同而实异的。

了解到翻阅马华文学史的重要，另外一个问题要和大家讨论的，就是阅读历史和阅读作品需要同步进行，不能只是懂得历史，而对马华文学作品视若无睹。你若只懂得几个马华作家的名字，懂得他们写过什么重要的作品，但如果没有同时翻阅这些人的著作，你至多只能发表人云亦云的看法，而不可能有本身独立的见解。尤其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更需要认真看待这回事。

（写于1998年，此稿乃作者在新纪元学院为中文系学生主持讲座时发表的演讲稿）



第四辑 作家·作品

向韦晕先生致敬

喜闻“韦晕文学评论奖”设立

大马华文作家协会在春节期间宣布今年活动的几个重点，其中一项令人瞩目的是：设立“韦晕文学评论奖”。

回顾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尚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以其名字作为一项文学奖或文学基金的命名，老牌作家韦晕可说是开历史的先河。

去年，由雪隆中华工商总会配合第二届马华文学节而主办的第二届马华文学奖，韦晕以大热门姿态夺得此项殊荣，获一万元奖金。在作家发表感言时，他当时便公开表示，将会好好利用这笔奖金，回馈社会对他的照顾，以培养更多的马华文学接班人。

两个多月后，果然不出所料，韦晕坐言起行，宣布将一万元奖金悉数捐给大马作协，由作协全权处理这份捐款的使用。

作协经过理事会讨论之后，决定从一九九三年开始举办“韦晕文学评论奖”，每两年一次，配合马华文学节而办。于此同时，作协准备将这笔捐款拨充基金，采取存本用

息方法，涓滴归公，务使这个在马华文坛尚属首创的活动能够长远举办下去。

自然，以数目而言，一万元并不多，尤其是设立基金，这还不过是小数目。如果从功利观点出发，区区一万元的什么基金什么奖项，根本不值一提。

在商业气息浓厚的社会，我们听到的“锦上添花”的故事，确是多得不胜枚举。富翁商贾在喜庆节日捐献一千五百，唯恐世人不知，要让记者为他写则新闻广作宣传，然后图文并茂刊登出来，使受授者双方皆大欢喜。

在华人社会，功利主义色彩一向浓重。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往往是随着财富的累积而至。在数也数不尽的大小社团里，举目所见，担任领袖的人马，真正属于“选贤与能”的，到底有几位？撇开财势不提，华社凭才学道德文章登上领袖宝座的，又有几人？

话说回来，韦晕如果是富甲一方，或者是某某社团会馆的主席会长，他有的是钱，出它一万几千捐给慈善事业，图个好名声，应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韦晕不是。他充其量只是一介书生，最大的荣誉是作协顾问。作协是写作人团体，也是个“穷”社团。试问：担任一个“穷”社团的顾问，在趋炎附势的人心目中，又有何光彩可言？又有何名利可图？

韦晕不是有钱佬，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有钱佬不认识他。他的履历是许多“聪明人”不屑一顾的。早年从中国南来，做过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后来转行做文员，做小生意，跑单帮，也做过农夫，当过翻译员，出版社编辑。他一

生从事过不知凡几的行业，可到头来虽不至于“两袖清风”，到底也是与富贵无缘。

投身文学事业，从事文学创作，是韦晕人生旅途中最辉煌的一页。他从战前写到战后，在小说、散文方面，出过十多部著作。他的文学成就，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受到文坛的重视和肯定。到了九十年代，他以接近八十的高龄，仍孜孜不倦于笔耕生涯，淡泊名利，从不哗众取宠。除了了解马华文学的人士对他赞赏备至之外，其他各界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印象。说句不客气的话，倘若不是荣获第二届马华文学奖，文化界许多人可能还不晓得韦晕是谁哩！

韦晕对待文学事业的热忱，数十年如一日。他看淡金钱物质，追求精神世界里真善美的境界，运用他的一支生花妙笔为世人写下许多具有时代、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他从来不要求社会给予他什么，可一朝文学奖的殊荣落在他身上，他受之无愧，实实在在称得上“实至名归”。

作家绞尽脑汁，所得只有一千字一二十元的菲薄稿酬，比起社会许多行业，这样的待遇是可耻的。而“文章无价”的结果，造成许多原属文艺圈中人掉队的掉队，转行的转行。而韦晕，他始终站稳岗位，用他的笔挥写人间的篇章，给时代历史留下最有用的见证。如今，他又倾囊献出毕生努力的成果，以行动造福后来人，这份崇高的精神人格，就远非许多追逐名利的市侩之辈所能望其项背！

实际上，一万元对于有钱人，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对于穷文人，可就用途不少啦。作协利用老作家辛苦得来的奖金设立基金，颁发文学评论奖，一来通过这项文学基金，使老

作家的令誉永垂不朽，二来藉文学评论奖之设，照顾马华文学领域里最弱的一环，鼓励更多人认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提高本地文艺批评的水平，意义重大，诚然是个两全其美的做法。

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韦晕以作家身份“一掷万金”，这份豪情壮举，希望会激发社会更多有心人向他看齐，大家群起效法，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使到建设精神文明的社会的宏愿早日实现，则幸甚！

(写于1992年2月)

人生长恨水长东

——悼原上草

10月14日晚上接到甄供兄的电话，捎来原上草逝世的噩耗，一时间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等到第二天晚上和甄供一起到丧宅去吊丧，对着他的遗容，我仍然不能相信，一个从来没有听过患什么大病痛的人已经与世长辞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原上草联络了。记得以前还在作协搞活动的日子，我几乎每隔一头半个月总要开车上八打灵，不是去“美林书店”，就是约他在住家附近的咖啡店里会面，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作协的一些理事陪同，大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来往得颇为频密。只是最近这几年自卸下作协的职务后，较少过问文事，文友之间也疏于交往，对原上草亦然。

两个充满诗意笔名

原上草这名字，我在念中学时期便已知晓。那时，从《星洲日报》的《星云》副刊和《蕉风》及《学生周报》

上，便已陆陆续续读过他的散文和小说。还有另外以“沙风”为笔名的作者，也是我所熟悉的名字，那时根本没想到这两个充满诗意的笔名，竟然出自同一作者。后来和一些文友谈起来才知道，那已是70年代以后的事了。

和原上草结缘，主要还是靠“作协”牵引。因为作协的关系，使我认识了好多神交已久却无缘识荆的文友。作协筹组于1977年中，原上草、钟夏田、杰伦和我是发起人，原上草当选为筹委会主席，我则担任总务；筹组期间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经常开会，而原上草家住八打灵，我住在旧古仔路，相距颇远，每次有事相商或要交重要文件给他过目签署，我都要开车到他府上或“美林书店”。就这样子，我们之间由隔阂到熟络，进而成为一对“忘年交”，那过程只有短短三两年光景吧了。

为作协仗义执言

作协在筹组期间遭遇不少风风雨雨，虽然得到全马各地文友的响应支持，但也有一些人对一个还未成型的团体口诛笔伐，可谓多灾多难。原上草本是“好好先生”，对于小报上的充满火药味文字，初时还保持缄默，后来闹得凶了，他忍不住要站出来说话。他写了一篇总答复的文章，此文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以下这段文字：“身为写作人，往往是实至才名归，这个名方能永垂不朽，那些沽或钓起来的名，不经考验，只有眼红者才看得比山还重。说到图利，凭作协只能煮字还疗不了饥的穷地方，只有失心疯者才会想到这个好主意。”

记忆里，原上草的文字多属于婉约一派，间中也穿插些诙谐意味，却从未见他作过“金刚怒目”式的狮子吼。这篇全文约五六千字的“笔战”文章，的确令人大开眼界。这篇长文，应称得上是原上草绝无仅有的“稀世之作”哩！

和原上草在一起，可以无所不谈。他平素沉默寡言，即使三杯落肚，仍然话题不多。我试过在一群人的场合里逗他讲话，他总是讲了三两句便一脸腼腆状，恰像一个人世未深的少年人。在作协一群理事里，他是长辈，可是在一起的时候，他却从不以长辈自居，而且还很能容忍后辈的放肆言辞。有几回在夜深的咖啡店里，大家喝酒谈天到忘记时辰，看着大伙儿的高谈阔论，他尽管不发一言，静静地喝他的酒抽他的烟，却从来不曾流露过一丝的不惬意。他似乎很享受类似的“龙门阵”，每次都是陪大伙儿到最后一分钟。在记忆中，我实在想不起他曾有半途离席的记录。

“离离原上草”化身

关于他的笔名，许多人恐怕会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绝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记得初认识时，我曾经提起过笔名的事，他笑而不答，并不作任何解释。也有人认为他的另一笔名“沙风”更有诗意，像已故的韦晕先生，他在生前每次提到“老古”（文友对原上草的昵称），都习惯叫“沙风”，尽管“原上草”更广为人识。实际上，“原上草”这笔名无论从字面、音调或涵意来看，都是绝佳的配搭。所谓文如其人，可从另外一面看原上草，何尝不是“名如其人”？试想，一支健笔驰骋

马华文坛五十载，从年轻写到暮年，未尝受客观不利环境而弃笔，这份精神，这份韧力，不正是“离离原上草”的化身吗？

无憾地走完此生

到古家吊丧的晚上，场面冷冷清清，听灵堂前传来声声颂经，心情更感觉沉重。原上草不是得过“马华文学奖”吗？这个奖还是两年一度马华文学节受众多华团认同的殊荣，何以这样一位为马华文学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作家，在他向世界诀别的时候，竟然落得如此凄清的下场？难道他当年登上舞台接受各方的颂扬，还有那些属于“爬格子动物”同欢共乐的雅集，终归只是镜花水月而已？抚今追昔，不禁黯然神伤。

这个场面，不由使我想起原上草写过的短篇小说《水长东》。这篇小说写于70年代，当它发表报端时，我一口气将它读完，对于小说中一对男女有缘无份的恋情，写得荡气回肠，堪称原上草小说中的精品。我曾经好几次当面表示对这个短篇的喜爱，后来他的小说集获选在《作协文库》名义下出版，他把小说集定名为《水长东》，也可见作者对这个短篇有着同样偏爱。而今，人亡书在，想起以往种种，当真不免要和一代词王李后主同声一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听古太太说，原上草死前几经挣扎，最终是安详地阖上双眼。是的，原上草，您安息吧！不管这社会负欠您多少，您也无需抱怨什么，因为您已无憾地走完此生，您拥有的其

实比许多人都多。而逝水东流本是宇宙之常，世人又何必过于执着？

原上草，您就安息吧！

(写于1999年10月22日)



诗人，你走得何其匆匆！

——悼端木虹

(一)

端木虹走了！走得那么匆匆，走得那么令人不敢置信！为了医好耳疾，他进马大动了一次小小的手术。医生事前对他说，只有一成的危险性，怎料到手术过后竟然昏迷不醒，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半月，直到他离开人世，始终没有醒来过。

端木虹一向健康无碍。前年从教育岗位退休后，马上又接受出版社的聘请，担任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每回见到他总是精神奕奕，没有半点倦容和老态。不清楚他家庭背景的人，单从他的外表根本就难以相信他已是“祖父级”人马。认识他的朋友经常调侃他驻颜有术。

然而这样一位生龙活虎的人，最终竟然敌不过一个小小病魔，那么快便在人间消失。人的生命，有时是多么坚强，有时竟脆弱得不堪一击！死了归咎于命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作为他的好友，我们一边惋惜他的英年早逝，一边

只有从往事的气氛里，去捕捉几许零碎的、美丽的回忆。

(二)

我和端木虹订交，是早在60年代中的事。

那时，我刚从南大毕业，找到一份教书的职业，地点在森州的一个小小山城：马口。由于平日喜欢涂涂写写，开始和森州一般文友接触，因此认识了杰伦（廖金华）、芜野、徐虹、唐君复等人。端木虹则在较后时才结识，但那段相交的过程却是众文友中最富戏剧性的了。

记得是1965年底的学校假期中，我意外地收到一张请贴。发贴的人是黄爱民，邀请我出席他为胞弟举行的结婚喜宴。黄爱民是谁？我根本不认识；可是看到附夹在请贴里的一封信筒，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端木虹是想藉他弟弟喜宴的场合，让各方文友有个聚首的机会，希望我不会见外。隔了两天，我又收到杰伦的来信，特别提起婚宴的事，说是出自他的主意，是他把我的住家地址给了端木虹，希望介绍我们俩认识。我有感于文友的一番挚情和好意，也便不拘小节，一个人搭乘巴士从昔加末赶往新邦安拔赴约。一场友谊就如此掀开了序幕。

端木虹早年任职于浮罗士邦华小，家住在新邦安拔，是个穷乡僻壤，当年尚无电流供应。喜宴过后，许多外地的文友赶不回去，只好留在乡下，大伙儿一块挤在咖啡店楼上，渡过漆黑无眠的一夜。那一夜，有旧雨重逢的欢悦，有新交初识的兴奋，更有异乡作客的诡异感觉。三十年后回想起来，那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

和端木虹的初识，可以套用古人的话“一见如故”加以概括。他为人豪爽风趣，和他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题，大概是习性相近，我们之间的交往和情谊，30年来始终没有断过，而且互相影响，在许多文学课题上，我们有共识，也有争执，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替马华文学尽点心力。

(三)

端木虹崛起文坛，大约在50年代末期。他出道早，当还在初中阶段，他便有大量作品发表在新马的报刊杂志；和他初识时，他已经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塞纳姑娘》，在马华文坛，是个知名度颇高的青年作家。

那时，杰伦住在西廖的黑土村，徐虹在花城，梦虹在燕子城，荒野在冷乡，每逢假期，大家都会有一两回见面的机会。集会的地方，不是在罗白河畔，便是在我寓居的山城小屋。见面次数多了之后，大家开始商议结社的事。1966年中，一个以“青春”为名的出版社终于催生成立，社址设在芙蓉，端木虹众望所归，当选社长一职；杰伦和我等人则被选为编委，负责丛书的出版工作。

青春出版社社员不多，印象中还包括胡玉华、洪浪、李金城、丘盛添等几位，都是来自森甲一带的文友。这个社在波德申办过一次聚餐会，出过几部单行本，后来因为成员星散，陆续投奔都门就业，加上组织松懈，经费和凝聚力不足，只两年时间便告“收盘大吉”。在丛书出版方面，其中一本是端木虹的散文集《重亮的燧火》，他还请了好几位文

友为该书写序和跋，包括杰伦和我两位好友也在受邀之列。

(四)

和马华文学的历程一样，端木虹个人的创作活动也充满着起伏性。青春社解体后，他对文事也显得意兴阑珊，直到1969年，他经过一段日子的蛰伏，才又展现作家一股活力和干劲。就在那一年，我在报社负责主编一个中南马版文艺副刊《绿野》，每周一期，每期有固定的四分之三版位，主要作者都是来自中马和南马一带，像韦晕、梦平、马汉、梁园、温任平、何乃健、笔抗、夏弦、沙燕、慧适、碧澄、梁志庆、清疆、秃橡、郎格非、杰伦、徐虹、叶曼沙、洪浪等人，都曾经是这个文艺副刊的笔耕者。端木虹自然也是其中一位主要的撰稿人。这个时期，他除了写诗，也开始写评论，在我的力邀下，他为《绿野》发表的作品进行一项点评工作，每月一篇。我知道这是一份既吃力又不讨好的差使，首先得把所有发表过的作品细读，便已经要花不少时间，还要逐篇作出评论，更是耗费精力，其中艰辛吃力的程度，只有身历其境才能领略。而端木虹自接下这份任务后，每月都能按期交稿，洋洋洒洒数千言，一时成为《绿野》深受作者读者欢迎重头篇，对提高这个副刊的素质，确然发挥它一定的影响作用。

端木虹写文学评论，和他处理文学创作一样，都是力求尽善完美，在他笔下不论是褒或贬，都是以作品为第一考虑要素，他不理作者名气大小，即使是名家的劣作也照实批评不误。也因为如此，他在不知不觉中开罪了一些人，甚至有

人还写信向报社高层告发，指《绿野》版大量刊登编者朋友的文章，企图终止这类评论的发表。

端木虹以“叶谛”为笔名在《绿野》所写的文学评论，总共有好几万字，后来都收选进他的《话文艺的桑麻》一书。那已经是80年代中的旧事了。

(五)

筹组作协是70年代马华文坛的大事，作为文艺界积极活跃一份子的端木虹，自然不免牵涉其中，扮演推展文运的一个角色。在作协筹组期间，他协助筹委会拉拢南马一带文友入会，是马六甲区的召集人。作协成立后，他当选第一届理事，担任出版主任，负责《写作人》的主编，在任内克尽职责，为《写作人》打下良好的基础。接下来的好几届，他担任过翻译、研究主任，更做过一届副主席，是一位深得人心的领袖人才。此外，他也是马六甲作协联委会主席，在推展一些地区性文学活动方面，他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我在作协18个年头，每遇到困难和挫折，第一个想到的人，总是端木虹。有时他来吉隆坡，有时是我下古城，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所谈不外是作协的工作和计划。他有满腔的热诚，也有不少的牢骚，当然在他身上更不脱诗人的气质，容或还有偏执和傲岸，这一来就难免引起一些庸俗之辈的物议；自然，这些来自尘间放肆的言论，对于端木虹作为诗人身份，是丝毫没有影响的。

(六)

端木虹第一部作品是小说，可是鼎定他在文坛地位的，

却是来自他的诗篇。

从70年代至90年代，端木虹都有诗集问世。《山雀的早晨》收集了诗人早期之作，这些诗作一般上属于自然、流畅的自由体，气势磅礴，感情饱满，像山涧瀑布一泄无遗。《湖的传说》则是诗人在诗艺创作上另辟蹊径的杰作。从这本诗集里，可以看出端木虹的诗风转向，由朦胧到成型，由游移到执着，显示诗人勇于实验创新的意图。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有关现代诗的理论探讨文字，致力于现代诗的分析研究工作，主张破旧立新，决意要在技巧上开拓新境界，希望为马华新诗注入新的生命。《坚守》则是在《湖的传说》基础上发展开去的诗集，从书名可以理解诗人潜心追求诗艺的苦心。自此以后，端木虹的创作活动又进入另一个低潮期。

正当我们期待他在休息过后有更大的冲刺时，他却不幸为一场原本可以躲过的病疫所俘虏，诗人命运如此不济，夫复何言？

(写于1996年12月27日)

诗人何达和他的诗

根据《香港作家》一项报道：当代著名诗人何达于今年一月二十二日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何达原名何孝达，祖籍福建闽侯，一九一五年十月廿七日生于北京，初中时期开始写诗，一九四二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翌年与同学组织诗社，发表不少诗作，曾获闻一多和朱自清赞赏，被誉为“新诗中的新诗”。一九四九年定居香港，长期为报刊写作新诗，影评和书评，并热心栽培诗坛新秀，已结集出版的诗作主要有：《我们开会》、《长跑者之歌》、《何达诗选》等。

何达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同时也是香港作家联合会理事，该会的创会成员之一，他的去世，可说是香港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对新马文坛来说，何达也是一位广为人知的诗人，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他的诗曾经给本地诗坛带来颇大的震撼。那时，他用洛美、夏早、林愿、陶最等多个笔名写了不少诗篇，发表在香港的《文艺世纪》、《海光文艺》、《海洋文艺》、《伴侣》半月刊等刊物上，并以何海、陶融为笔

名写诗评，给爱诗的青少年文友极多的引导和鼓励，新马两地不少诗人，当年初涉诗坛时，或多或少都曾经受过他熏陶和教诲，影响不可谓不大。

何达的诗，在年轻时代便已受到文坛大家的注意，三十年代中国抗战时期，他写过两首充满时代气息的战斗诗：《我们开会》和《不怕死，怕讨论》，得到朱自清特别点评，原诗如下：

“我们开会/我们的视线/像车辐/集中在一个轴心”

“我们开会/我们的背/都向外/砌成一座堡垒”

“我们开会/我们的灵魂/紧紧的/拧成一根巨绳”

“面对着/共同的命运/我们开着会/就变成一个巨人”

——《我们开会》

“我们不怕死/可是我们怕讨论”

“我们的情绪非常热烈/谁要是叫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我们就嘶他通他/我们就大声地喊/滚你妈的蛋/无耻的阴谋家”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只有情绪/我们全靠情绪/决不能用理智/压低我们的情绪”

“可是朋友们/我们这样可不行啊/我们不怕死/我们也不应该怕讨论/要民主——我们就得讨论/要战斗——我们也得讨论/我们不怕死/我们也不怕讨论”

——《不怕死——怕讨论》

这两首诗，在当时都有一定的读者群，尽管时隔久远，今天读来会觉得不够诗味，缺少含蓄的美，但是在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只有这种充满激情带着煽动的诗篇，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毕竟它们具有战斗力量，适合在大庭广众间朗

诵，容易掀起群众的情绪，达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何达的诗，到了六十年代已经形成本身的风格，具备明朗、流利、豁达等特色，如下列几首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

“你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终点/从你这里/我出发/再出发
/每次我回来/都得到一种力量/使我走得更远/也更想回来”

——《起点和终点》

“我叫你给我一个名字/你说：风”

“立刻我好像听到/风的呼啸/卷起了雪/又从头上砍下来”

“你是要我/像风一样/用巨手/推送着千张白帆万条浪/
追赶你/像追赶着光么”

“倘若我名叫风/请不要误认/那轻轻地钻过平静的柳条的/是我”

“如果我来找你/我将带着万里外的黄沙/向你倾泄直率的
狂欢”

——《风》

在学生时期，我便已喜欢何达的诗。读他的诗，往往会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激励作用，令人对明天充满着希望和信心。我在七十年代买到一本《洛美十友诗集》，爱不释手，每次翻卷总有一些新的领悟。这本诗集，收入洛美、邵仑、夏早、林愿、黎望、林千峰、凌紫韵、舒克、时中再、欧阳洛、陶最等十一人的诗，书前还有陶融写的一篇序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十一位诗人，连同陶融，都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化名。多年后当有人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初时不相信，待再细读十人的诗篇后，才不禁掩卷失笑。

《洛美十友诗集》，诚如陶融所说：“他们的创作方向，可以说是一致的。然而在风格与取材上，却各有各的特色，并非出于同一样式的作品。”不过，洛美也好，“洛美十友”也好，他们的诗大致上都有“奋发向上”的主旋律，读得多了，难免有“腻”的感觉。倒是他以凌紫韵为笔名写的一些“贝多菲”式抒情诗，无论内容形式都婉约多姿，意味隽永。试举《正是如此》这首组诗，当可以见出诗人功力的不凡。

曾经我想／做一条水草／在你清澈见底的河床中／摇摆
出一串串的温柔／任你的水流急急缓缓／我总是和着你的节拍

我给你的爱／正是如此／我总是生根在你的心上／无论
你快乐还是悲哀

——《水草》

曾经我想／做一只鸟／无论飞到多么高多么远／也总要
回到你的大地／带给你真理的消息

我给你的爱／正是如此／无论我的经历有多么神奇／我
总要告诉你／告诉你／万事万物的意义

——《鸟》

曾经我想／做一轮明月／永远围绕着你盘旋／借来光／照
耀你生命中黑暗的时刻

我给你的爱／正是如此／当你活跃着／整个人生都是你的
战场／当你受了伤／我总在你的身旁

——《月》

(16·4·1994, 《南洋商报·作协文艺》)

唱出时代强音的诗人

——小写“朦胧诗人”北岛

“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

以上是中国近代最受各方瞩目的诗人北岛对其诗歌创作的一段告白。

北岛的崛起，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其独特的诗风，向海内外千千万万中国人和华裔读者揭示十年浩劫的心路历程，引起诗坛的震撼。评论界把这个时期诗坛出现的诗风名之为“朦胧诗”，是中国七十年代伤痕文学以外最受世界文坛注目的一株文学奇葩。

朦胧诗带来新气息

中国在“四人帮”统治时期，文坛几乎陷于瘫痪境地。许多早期成名的作家如巴金、冰心、艾青等，都在这段“黑暗日子”里缴白卷。于此同时，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由于断绝了和国际的联系交往，新的文学思潮无法注入“封

闭”的中国文坛，造成五十年代以还至文革结束后那一段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原本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断层现象。

“四人帮”的倒台，中国文学界的“冰封”期也宣告结束。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一群青年诗人的崛起，为中国诗坛带来了新希望。

“朦胧诗”其实就是现代诗的别称，它的出现和伤痕文学一样，都是起于对中国大陆政治和社会性的否定。北岛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写的《回答》一诗，很明显的，诗人是以挑战者的身份，向变态社会发出强烈的抗议。诗的一开始便宣言式地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几乎可以视为对变态社会的准确概括。

在诗的第三、第四小节中，诗人勇敢地向这个变态社会发出了反叛的嘶叫：“我——不——相——信！”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诗人保持着清醒：“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在黑白混淆，鬼蜮横行的日子里，诗人怎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呢？怎能不怀疑，不愤慨呢？诗人坦荡荡的胸襟，代表了无以数计身受其害的人民，表达了他们对真理与正义勇敢追求的心声。

追求真理与正义

在朦胧诗崛起之前，中国新诗所走的路线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古典加民歌”的所谓写实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为绝大多数人奉为圭臬。北岛、舒婷、江河、顾城等一群前卫诗

人，以大无畏的精神，用他们充满激情的诗句唱出时代的强音，为中国新诗坛掀起一番惊涛骇浪。

作家的创作随人民的需要而演变，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和必然。

原名赵正开，现年四十二岁，祖籍浙江湖州的北岛，是一个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民族诗人。他用诗干预生活，干预社会，甚至干预政治。像在《一切》里，他沉痛地唱道：“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倘若没有经历过一场毕生难忘的十年浩劫，如何能有此高度浓缩、撼动人心的划时代强音？

一九八九年，为了魏京生事件，他发起致给政府公开信，在短短三天内，挨家挨户访问了三十三位在学术文化界甚具名望的作家学者，找他们支持签名。针对这项“壮举”，北岛讲过一席话，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魏京生的事情，别人可以回避，我不能回避，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

这就是诗人北岛。他不仅以诗载道言志，更以行动体现他在诗作里贯彻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之被提名角逐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诗”和“人”紧密结合的崇高荣誉。

姑不论他最终是否如愿得享殊荣，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学，都是史无前例的。

（刊于1991年10月20日《南洋商报》，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夕）

郑愁予的《赋别》

——读诗札记

我喜欢读郑愁予的诗，尤其是他的抒情诗。

《赋别》一诗在《郑愁予诗选》里，应算是篇幅较长的一首，共有二十五行。诗的开始三行是：

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
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开两头了。

这是一般诗作惯用的即兴手法。

杨牧分析这首诗时，拿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相提并论。且看徐志摩的开始一节：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两者比较，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写别情，《再别康桥》着重情景交融，抒发的对象是康桥，把康桥拟人化；在格调上，体现了诗人的洒脱和豁达胸襟。《赋别》比起徐

诗，情是真挚浓郁多了，一开始的气氛，满含柳永《雨霖铃》中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般的凄苦。“多情自古伤离别”是古人的感叹，现代诗人在“慧剑斩情丝”之际，也难免一番“儿女情长”，表面上是故作潇洒，实际上，内心澎湃的情潮是一浪紧似一浪的。在情人眼里，割爱是苦事，舍弃之间煞费思量，理智要他们分手，感情上却苦苦缠绵，《赋别》真是写尽天下痴男怨女的矛盾心态。

诗人选择离别的时间在夜晚，又是“凄风苦雨”的晚上，悲剧气氛显得更浓厚。“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两者表现得若无其事，其实是有苦自知。因为“一条寂寞的路”，从此“便展开两头了”。其间的转变，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啊！

念此际你已回到滨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长发或是整理湿了的外衣
而我风雨的归程正长

这三句，可以看出那“笑一笑”和“摆一摆手”的大方是伪装的，方刚分手，“我”便不禁不住想念“已回到滨河家居”的“你”，想“你”在家的情形；而“我”，还有一条好长的“归程”，要在风雨中赶路。那“一条寂寞的路”对“我”来说是可怕的。因此，诗人在这一节的最后两句如此写道：

山退得很远，平芜拓得更大。
哎，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山本来在前面，现在已退得很远，反衬出归程的长。“平

荒拓得更大”暗指天地愈来愈空旷，令诗人有茫然无从的感觉。这一节，也有《雨霖铃》的影子，完全是“暮蔼沉沉楚天阔”的意境。在气氛的营造方面，夜晚+风雨+长远的归程+寂寞+空旷=黑暗成形，气势上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

诗的第二节采用倒叙法，怀念旧情，不写“我”，改以“你”的第二人称写法，很别致，不落俗套。

你说，你真傻，多像那放风筝的孩子：

本不该缚它又放它

风筝去了，留一线断了的错误

用“风筝”比喻爱情，有新意。这三句写患得患失的追悔矛盾心境，“留一线断了的错误”之后的标点符号（冒号：），点出了“赋别”的主题，因为“错误”的爱情而导致分手。

书太厚了，本不该掀开扉页的；

沙滩太长，本不该走出足印的；

云出自岫谷，泉水滴自石隙，

一切都开始了，而海洋在何处？

这四句道明“错误”所以铸成的原因。诗人用“书”、用“沙滩”、用“出自岫谷”的“云”、用“滴自石隙”的“泉水”等几个意象，来给爱情下注脚。明知“书太厚”，不容易读完，偏要“掀开扉页”；明知“沙滩太长”，不容易走到尽头，偏要“走出足印”。然而，诗人接着又自嘲，爱情的到来是自然的一回事，就像云的“出自岫谷”（源自陶渊明诗“云无心以出岫”），泉水的“滴自石隙”。“我”

与“你”的爱情，譬如两道泉水一朝合流，却找寻不到出口，暗示了两个人找不到共同的方向，不能把爱情的天地开拓得更大（海洋）。

“独木桥”的初遇已成往事了，
如今又已是广阔的草原了，
我已失去扶持你专宠的权利；

这三句写得沉痛，诗人用往事和如今对比，对照出今非昔比的可堪惋惜的事实。以往两人陶醉在爱情小天地里的“往事”，已经一去不复还，感觉上似回到未有爱情之前的“广阔的草原”。这一句和前面的“平芜拓得更大”互相呼应，但前者是无牵无挂，后者则是寂寞和恐惧，不能等量齐观。“独木桥”的初遇则喻指偶然的相遇。

红与白揉蓝于晚天，错得多美丽
而我不错入金果的园林
却误入维特的墓地……

大自然“错误”的结合，像晚天的斑斓色采，矛盾而统一，却“错得多美丽”，唯独人世间的爱情，走错了一步，只有朝向死胡同（墓地），而不会有“美丽”的结果。

这次我离开你，便不再想见你了，
念此际你已静静入睡，
留我们未完的一切，留给这世界，
这世界，我仍体切地踏着
而已是你底梦境了……

最后一节又回到“离别”的主题，和开始一节首尾相应，只是前一节感情的浓郁，怨悒，几至不忍卒睹，到此却

已逐渐升华、冷却。“我”已澈悟“离开”是不能避免的结局，唯有默默接受现实的安排。可是想到“我们”的人生还未了结，还有许多责任等待完成，于是诗人说：“留我们未完的一切，留给这世界”。至于“我”和“你”的这份情缘，只好留作永恒的记忆，因此诗人深情地唱出：“这世界，我仍体切地踏着，而已是你底梦境了……”这最后两句，另一层意义是：逝去的爱情，只是一场幻梦，一场无法实现的梦境而已。

郑愁予这首抒情诗，结合浪漫与古典手法，写来丝丝入扣。感情由“浓得化不开”到“浓情转薄”，显示出诗人能“透入”也能“透出”，已臻于王国维所说的人生境界中的第三境。

诗中“的”字和“了”字的运用，也起着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有叹息和无奈的意味。此外，诗中“错误”一词的出现，共有三处：

“风筝去了，留一线断了的错误”

“红与白揉蓝于晚天，错得多美丽”

“而我不错入金果的园林／却误入维特的墓地……”

这三句，配合郑愁予另一首传诵之作《错误》中的名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来读，耐人寻味，写尽了人世间的阴差阳错；而偏偏许多错误的结合（尘缘），又是何其美丽，何其难以躲避，委实令人低回不已。

（刊于1984年11月，《南洋商报·作协文艺》）

吴岸诗歌的人文精神

(一) 前言

吴岸十六岁开始写诗，是个早慧诗人。他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出版在1962年。诗集由著名散文家，也是《南洋商报》《文风》版主编杏影写序，给予吴岸极高的评价，誉为“拉让江畔的诗人”，从此奠定了吴岸作为诗人的地位。当时的吴岸年方二十五岁。

吴岸的文学道路，正如马华文学的发展，是岖崎的。他出身的年代，正逢太平洋战争的前夕，《盾上的诗篇》里的诗作，都是动荡时局里的产物。他在中学时期便经历时代风云的变化，满腔年轻人的斗志和热情，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反殖反侵略的战斗之路。他的诗，饱蘸着千千万万处身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血泪；而在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过程中，他也付了惨痛的代价：十年的铁窗风味。

尽管面对严酷的生活现实，吴岸却并没有低头。他后期写的诗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说《盾上的诗篇》是诗人以清亮的调子向世界初试啼音，那么，到了《达邦树礼赞》

和《我何曾睡着》，作为马华现实主义代表诗人吴岸，他以沉稳、坚实的声调唱出时代的强音，便更鲜明地突显了诗人峥嵘、伟岸的形象。

(二)

吴岸早年的诗，正如杏影所说的，“每一首都歌唱正直光明的事物，或者是写下他对乡土砂劳越的热爱。”基本上，《盾上的诗篇》里的二十多首诗，明显受到“五四”诗风的影响，是沿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路线而写成的。读他的早年的诗，你会自然地感受到诗里一股年轻人澎湃的激情，无论对国家，对乡土，对友情，对亲情，都有深深的依恋和期许，在那个风云万变时代，这样的诗与现实生活，与大众思想感情紧密结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部分，它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盾上的诗篇》出版之后，吴岸有好长一段时日在文坛“失踪”，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复出。事隔十多年他重返诗坛，手中一支诗笔仍然不减当年锋芒，在激情以外，这时还多了一份对于民族、社会和文化上的深层探索，诗的内蕴显得比早年之作更为厚实，更为丰盈。从《达邦树礼赞》和《我何曾睡着》里的大部分诗篇，可以见出吴岸为开拓更为宽广新诗道路而苦心经营的成果。

自然，这一切的改变也是随着时局的嬗变而在诗人创作上带来的条件反射。他本身也这么说，“到了八十年代，我发觉新的社会生活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表现手法明

显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生活内容，深深感到诗必须从单向思维走向多向思维。”有鉴于此，吴岸选择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基础，尝试吸收现代的技巧，通过实践来建立个人的新的诗风。

《我何曾睡着》是吴岸诗作里被评论最多的一首。这首诗的人文精神尤其浓烈，它具有历史感，也充满沧桑感，从一头醒狮的腾跃到沉睡，又从沉睡到醒觉、到欢腾，带着民族的期许和热情；它从源头远渡重洋，来到异邦传报春讯，经历多少无情的岁月，感受多少人世的悲欢离合；它默默忍受闭关、孤寂的日子，只要听闻人间传来“咚咚将”的声响，它便精神振作，带着满身热劲，为人间增添欢乐的气氛，即使那样激情的时刻何其短促。

“不，不/我并未睡着/我何曾睡着/我在梦中/醒着/
我醒在/梦里/这斗室晨昏不分/岁月似流水无声/但我听见/
季节的脚步/感受/人世的悲欢”

根据吴岸的解释和分析，《我何曾睡着》一诗以舞狮为题材，表达了诗人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眷恋。长期以来，舞狮活动已然是大马华社民间艺术的重要一环，它象征华族草根阶层的浑厚力量，具有发聋振聩的警世作用。全诗以形象的语言，描述舞狮的历史渊源，如何翻山越岭从中国江南江北飞渡重洋，然后在蕉风椰雨的南邦落地生根，启示着中华文化不断流传发展，像一头威武的雄狮，永远体现着它勇猛刚强、坚韧不屈的意志和生命力。

(三)

《星遇》是收集在《达邦树礼赞》的诗，表现手法新颖，诗人藉星的际遇表达对人生的态度，也是饱含人文精神的一首好诗。

我们曾是幼小的星星/在一个黄昏/带一片纯真/跃离母亲的怀抱/到这混沌的宇宙运行

星星本来是静止的东西，它出现在夜空，闪着微弱的光晕，这是自然的现象，但落在诗人眼里，他运用丰富的想像力，使星星人格化，描写星星如何带着纯真告别他的母亲作混沌的运行；这时的星星，在诗人笔下，已经由静止状态变成了活动的生命体，似乎也 and 人生的过程一样。星星之为物，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和人类有着共同的遭遇和思想感情，彼此间的距离拉近，令人自然产生亲切感。

你迎着黑暗的道路/去追求那遥远的光/我探着寒冷的云雾/寻觅我梦里的温/我们越过了多少/星海云河/各自航向无垠/在亿万星辰中/迷失了自身

以上是诗的第二第三节，写到两颗成长的星星，一旦分手，便各走各的路。而云海星河一片无边无际，道途显然并不好走，但为了追求光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到头来，他们都在亿万星辰的汇集中迷失了自己。

而光年流转/多少星族消殒/苍茫中/何处能再见/你我幼时的星影

星族的运行过程，也和人类世界一样，物竞天择的结果，有的消声匿迹，而那些仍然活着的，也已经历多少沧海桑田，距离幼时的纯真已愈来愈远。诗歌写到这里，从星起到星落，不过是流露诗人对星群到人世的无常变化的兴叹，无论诗意诗境都没太多新意，自然无足道哉；而诗人就在这平淡无奇的笔触中，突然笔锋一转，把星星和人两种不同的物体结合为一，诗人前面特意制造的“悬念”这时才真相大白。以下是诗的最后一节：

昨夜秋风过扶桑/晴空万里/竟与你相遇/你见我嶙峋/我见你峥嵘/你在我的怀抱中/感到了我内心的炽热/我在你的热泪里/惊诧于你通体的光明

诗在开始写的两颗小星星，原来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成长后各奔前程，直到有一天偶然相遇，童年的纯真虽然不复在，但是彼此都有惊喜的感觉，因为一个是“风骨嶙峋”，一个表现“头角峥嵘”。

读完整首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一首境界优美的诗篇，诗人从写星到写人，运用穿插交叉对衬手法，形象突出鲜明。题目虽为《星遇》，实际上，写星是虚，写人才是实，诗人就在虚虚实实之间，委婉地表达了一份对人生世态的开朗、豁达的胸襟，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向往与追求美

好生活的热诚。

(四)

吴岸的诗，整体来说，难免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就像诗里严谨的结构，一丝不苟。其实，在叙写人世百态上，吴岸的诗在嘲讽的同时，也不乏风趣的一面。这里且举《拍相》为例，说明他在处理社会诗方面的独特风格。

多少年以后/历史/将指着这张发黄的照片上/曾叱咤风云的衮衮诸公/娓娓地说/他高瞻远瞩/早看出我前进的方向/他虽活在那时代/却是个古代的幽灵/他淡泊名利/他欺世盗名/他……/但此刻/他们都正襟危坐/在开麦拉的镜头里/当照相师挥手喊道/各位请看这里/笑笑/一……二……/有人从容凝重/有人老气横秋/有人屏息/有人在眼角/牵一个刻意的笑/镁光灯/于是一闪/把人生中的一瞬/和一瞬间的人生/掠入了/历史的快门……

诗从一张陈旧的相片，刻划出相片背后一个流动的人世画面。在大马华社，这是一个常见的画面，“叱咤风云”的领袖中，有的高瞻远瞩，有的思想守旧，有的看淡名利，有的欺世盗名，在当红的时刻，个个“正襟危坐”，多少年后，却都逃不过“历史”的判决。诗人不从正面着眼，却让“历史”走出来“娓娓地说”，把一个严肃的课题通过几

组镜头，加以漫画化，使相片里的人物无所遁形，令人读后不禁拍案叫绝。

我钦佩吴岸“大题小作”的表现手法，整首诗一气呵成，写来好似不费力气，实际上却是“举重若轻”，它轻描淡写，勾勒大马华社一个横切面，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是吴岸诗歌发扬人文精神的另类手法，既婉而善，不失“温柔敦厚”的诗人风范。

和《拍相》同一类型的讽喻诗，还有《余兴》一首。不过，后者针砭有余，诗味稍嫌不足，不及前者的隽永耐读。如果说到精炼，短短四行的《无题》：

有人/曾嘲笑一颗彗星的殒落/却在殒石上/刻写自己的光荣

这是一首内涵丰富的哲理诗。世事的怪诞、吊诡，往往难以尽言；而此诗犹如一面三菱镜，照出了大千世界的众生相，概括性强，足堪细细咀嚼。

(五)

地方色彩、多元社会、种族和谐，也是构成吴岸人文诗的另一特色。

《达邦树礼赞》是最常为人提到的一首。达邦树生长在砂劳越，木质坚硬，其根部面积宽阔，当地土著伊班人多用来制成精致的家具。诗篇描写达邦树高大的树身，“像一个

古铜色的巨人”，即使倒下了，仍然“化为沃土滋养着漫山的稻秧”。诗人成功塑造达邦树的“巨人”形象，它也是一个人格崇高伟人的化身。诗的乡土气味浓郁，通过对达邦树的礼赞，表达了诗人对乡土对人民的爱国情怀。

《鹅江浪》是吴岸诗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此诗写一对马来母女在江上泛舟遇到风浪，最终化险为夷的生活点滴。

江水浩荡 / 波涛汹涌 / 是谁 / 驾一叶扁舟 / 飘向彼岸？ / 浪落时 / 不见了踪影 / 久久 / 久久 / 啊呀呀 / 莫非那舟儿人儿 / 都已在浪里葬身？ / 待到浪起时 / 却只见 / 马来母女俩 / 手把桨儿 / 笑吟吟 / 坐在浪峰上……

全诗节奏轻快，形象鲜明，诗意盎然，充满生活气息。特别是最后六行，无论意境或诗歌语言，读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手把桨儿，笑吟吟，坐在浪峰上”，寥寥数语，刻划出马来母女笑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即使在风浪面前也不改欢颜。诗里流露的思想意识，没有说教，通过生活的场景，加上诗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一颗人道主义的诚心，任谁读了都不能无动于衷。难能可贵的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看似不经意，却收到“浑然天成”之妙，读后予人“言尽而意无穷”的真趣，的确是神来之笔！

此外，《还乡》、《观乡村儿童演出》、《江上怀友》等多首，都是吴岸乡土诗中的精品，这些诗都有一些共同点，从中可以窥见诗人创作的诚意：

1. 尽管客观环境事物不断在变，人的模样也在变，唯一

不变的是纯朴的乡情，它不分种族肤色，超越时空，恒久存在，弥足珍贵；

2.乡间生活简单朴素，老人的率性与小孩的天真，构成了一副温馨、充满情趣的乡间生活画面；

3.人与大自然处于对峙局面，却也矛盾地共生共荣，人间的美除了自然山水，还有绵绵不绝的人文情意结。

(六) 结语

我个人始终认为，流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一个诗人地位的建立，直接来自他的代表作品，而非依靠他所隶属的流派。从诗歌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那些享誉不衰的篇章，不管来自什么流派，经得起时代浪潮的冲刷，在时间的长流里闪闪发光的，很少不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与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

吴岸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同时在理论建设上也有不凡的表现。在《我的诗观》中，他说：“我不断地在生活的真实感受与艺术表达形式的矛盾困惑中，在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中，寻找诗人的方位。我认为诗没有固定的形式，它随内容而变化。没有丰富的生活内容而寻求形式的多变，是徒然的，那只能是一种外表的涂饰与化装而已。”对于那些刻意追求技巧、玩弄文字游戏、让晦涩掩盖内容苍白的所谓新潮流诗人来说，吴岸这番灼见形同暮鼓晨钟，一锤定音。

吴岸诗艺的高度挥洒，正是他的诗观的具体实践。整体

而言，吴岸的诗，在精神内涵上，是新写实主义的深层探索，在形式上，则是融入现代技巧，提供读者多向思维空间，使诗歌予人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散发无边的艺术魅力。我想，吴岸穷其一生尽其所能追求“生活中的缪斯”，他今天在诗坛的地位，说明他的努力并没白费，他的成功也绝非侥幸。作为诗友，我为吴岸的丰硕成果衷心祝贺！

(写于1999年5月29/30日)

(按：本文乃作者于1999年7月间应邀出席由大马董总举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专题论文。)

现代人的悲情和失落

——林锦微型小说赏析

新加坡作家林锦从60年代即开始写作，所擅长文体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和评论，可说是个全能作家。本文仅就他的微型小说而论，虽不能对他的整体文学成果窥见全貌，至少可以从他在微型小说的取材，处理手法和视角上捕捉到作家在一定历史时空里对人生世态的种种取向与诉求，未始没有探讨的意义和价值。

根据《林锦写作记事》，林锦挥写微型小说，是开始于1984年，他的第一本微型小说集《我不要胜利》，出版于1990年；此外，他也是新加坡作协出版物《微型小说季刊》的编辑之一。因此，微型小说可视为他诸种创作里的重要部分之一。本文所谈有关他的微型小说作品，乃针对他在1995年出版的《林锦文集》（中国鹭江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所收集的56篇本类作品而发，范围有所局限，加上个人能力单薄，挂一漏万，自属难免，尚祈各方不吝指正。

粗略统计，林锦的微型小说在题材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文化价值观、（二）现代商业社会人性百

态、（三）两性之间的矛盾、（四）对青少年世界的关怀、（五）家庭伦理。

文化价值观

从题材的取舍看来，林锦是抱着“使命感”从事文学创作的。在他的笔下出现的人和事和物，绝大部分都具有典型意义。如《白衣上的墨迹》，写的是在金钱挂帅的社会里师道式微的现实，题材早已被人写滥，很难再写出什么新意，但作者并没有因为题材的陈旧而视如蔽履；反之，他通过一位华文老师因为处罚学生（打了学生两下手心）引起家长的兴师问罪这样一件小事故，从而刻划了商业社会里的众生相，平常的题材却赋予全新的内容，小说所展示的场景以及令读者联想的空间，都远远超乎许多同个类型的创作。这篇仅有千字的小说里，传达给读者的讯息计有：1、任仁采老师写给家长的道歉和解书信在班上公开传阅；2、任老师生气起来要掌掴彼得，但高举的手却“抖动着，慢慢地垂下来”；3、任老师在上课前写一封“很重要的信”，钢笔套没关上，便插进袋子里，让白衣沾上了一团墨迹。从这几个讯息里，作者所要表达的旨意无非是：老师受尽凌辱，传道授业的神圣任务已变得软弱无力。小说表面上没有任何过激的描写，任老师向彼得父亲写道歉信的背景也简单交待了事，作者只着力写任老师上课时的情绪变化，从一个侧面带出事件背后的师道、社会、价值观等问题，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笔力万钧，具有“一针见血”的震撼性。同时，值得一提

的，在人物刻划方面，任老师的穿着：白衣白裤，从外形显示师道高贵的一面，而白衣染上污点，具有象征意义，以《白衣上的墨迹》为题，确有画龙点睛之妙。整篇而言，可以用“不落言诠，尽得精神”八个字来概括。

属于文化价值观题材，像《优等生》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篇。本篇写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虽然获奖出国留学，但对本身母语心存歧视，把烧华文书的事，在老师跟前当笑话谈说，这个小说的篇幅更短，还不到一千字，但小说的外延性很强，它既讽刺了年轻学子“忘本”心态，也反映出崇尚功利社会教育制度的倾斜面，更隐隐透露英文至上分子的浅薄无知。小说的主人翁吴国材，在校是个高材生，高中毕业后考获哥伦比亚奖学金出国留学，他用烧华文书来庆祝会考华文及格，是既可笑复可悲的行径。这号人物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十里洋场”，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对照之下，小说中的“我”（华文老师）所遭遇的奚落，就和《白衣上的墨迹》里的任老师所蒙受的耻辱一般无分轩轻了。

《老同学》也是属于上述一类的作品。本篇写在一个华文不被重视的社会里面对的可悲处境，像小说中的汪子龙，大学时喜欢看书写作，还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集，结果寄放几十本在书店里只卖出三几本。几年后他改行从商，太太受英文教育，孩子在家里只讲英语，华文程度差，还得请老师为他补习。小说在隐隐约约间也流露了一份忧患意识：如果连喜爱华文的人最后都放弃本身的志趣，改向有前途的行业进军，与母语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然则下一代的华文教育要靠谁去扶持、捍卫？

由于价值观取向的不同，文化人处身讲求功利的商业社会里，肯定是处在劣势的一方，像《遗著》里的老王，原本是一介文人，在环境和生活逼迫下放弃所爱，渐渐沦为赚钱工具和家庭、妻儿的奴仆，除了年轻时代留下文稿，其他的人生阶段都交了白卷，小说相当尖锐地揭发一个穷人潦倒的一生，也对文明社会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商业社会人性百态

其次是有关现代商业社会人性百态的题材。

在林锦笔下，现代人的嘴脸千变万化，他们的举止言行，综合起来，就是活生生的社会缩影。如刻划单身贵族卖命工作，没有假期，变成和白痴没有两样；他们的生活内容，单调得有如鸚鵡学人语般，精神苦闷空虚，即使物质丰裕也弥补不了。（《乌话》），再如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为了区区二百元，宁愿拿命去换取，接受博览会的差事，扮猩猩逗弄狮子取悦观众；这反映了商业社会“人穷命贱”的哀事，而人命不值钱的另一面则是：活得人不像人！（《也是英雄》）。还有，广大小市民阶面对交通问题，每天要受尽挤车之苦，敢怒不敢言，公车查票员为了老板利益，不顾搭客安危，知法犯法，视“不准超载”的告示牌如无物。（《搭车传奇》）。

在林锦的微型小说里，多的是小人小事，一般上都具有社会意义，美好的给予表扬，丑陋的无情揭发，体现了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良知。像《信》，可以视为作者在挖掘现实

课题上兼具深度广度的一篇力作。在这个篇章里，作者通过一宗寻常的车祸，带出四种不同身份人物的真实面貌：邮差的忠于职守，德士司机的见义勇为，黄小姐的明辨是非，余博士的虚伪，把人性中的真与假、善与假、美与丑发挥到极致。这样的作品，对于日趋滑落的世道人心，多少可以产生一种警惕和鞭策的力量。

两性之间矛盾冲突

至于两性之间的爱情、婚姻问题，在林锦的微型小说里所占比例也不小。这类型的作品，随着时代的演变，现代男女恋爱观早已打破旧时的框框，两性之间对婚姻对家庭都有了新的观念诠释，因此出现在林锦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新时代男女的思想精神面貌。作者在处理这类型题材时，采用针砭、讽刺、揶揄和同情的笔触，形成内容的多变性，其中可以《保险箱》、《平等原则》、《登对》、《离婚》等四篇作为代表，看出个中的特色。

《保险箱》对现代男女婚姻作出了颇大的讽刺，一个在太太眼里是个可靠的丈夫，当他死后，太太检查他的保险箱，才发现他的婚外情秘密，写出了现代人婚姻生活表面和谐，实际上隐藏了许多不定性的“信心危机”。

《平等原则》中一对大学生夫妇，双方奉行平等原则，家用开销彼此分担，丈夫想要孩子，妻子提出付给高昂酬劳，结果只好领养别人的孩子。小说除了讽喻，还多了一层戏谑意味，男女平等纯粹从功利角度着眼，完全无视传统的

伦理关系，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大倒退？值得读者作一反省。小说同时还带出另一个讯息：夫妻之间尚且如此，可想而知社会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程度。

《离婚》写一对年轻爱侣在婚前设想周到，先在律师楼签署离婚证件，保障双方的权益，即使一旦分手也两不吃亏；结果，为了婚礼举行方式发生争执，还没结婚便闹到要离婚。小说针对现代新潮男女游戏人间的恋爱与婚姻态度作了毫不留情的嘲讽和揶揄，也暗寓现代人的婚姻往往草率行事，在缺乏了解的基础上合合分分，既荒唐也显得无奈。

《登对》写一对情侣因了解而分手，又通过电脑婚姻介绍所凑合而走在一起，小说以悲剧开始以喜剧收场，其实更贴切地说，它也是一出荒谬剧。小说的男女主角都是大学生，双方都对婚姻缺乏信心，迫得要向电脑求救（和《平等原则》里的男女主角一样），难道人的意志还在电脑之下，连婚姻大事也受电脑摆布？小说在揭示光怪陆离的世情之余，也隐隐透露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和无力感。

对青少年世界的关怀

林锦微型小说对青少年的关怀，也占了一定的份量，我不清楚作者童年的背景，但是从他的十篇以乡村青少年为对象的作品看来，他即使不是出身在那个阶层，至少也曾经在乡间生活过一段时期，要不然，在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面貌，不可能写得那么自然和生动。像《凶手》里的“他”，一个穷家孩子，因为不小心，用石子丢鸭子，结果打死了一

只，害母亲赔了四块钱，他内疚自责，闷闷不乐一整天，视自己为凶手。这简单的画面反映出：穷苦人家面向生活，不逃避、不欺诈，虽然贫穷却活得有尊严，平凡的题材透露着不平凡的信息。像《诱惑》中的阿呆，为了满足一个心愿，做了一件大人眼里属于偷窃的勾当，被揭发后感到羞愧不安。和上篇一样，同是写穷苦人家子的懂事、要求不多、容易知足的纯真本质。像《那只大斑蝶》中受尽凌辱的残障小孩，拼命要捕捉大斑蝶，目的是为自己争一口气，以灭那个成天欺负他的柴杆，可到头来却希望成空。像《零蛋先生》里的穷苦学生，由于老师在他的作业上批了零蛋，自尊心受到伤害，长大后决意不给学生零蛋，反衬出一位为人师者的良苦用心，像《手》里出现一双脏兮兮的手，背后隐藏着一位苦学生的辛酸故事，给不谅解的年轻老师上了真正一课，这些都是很感人的发生在乡村、发生在穷苦人家的小人小事，它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包容、爱心、童趣、向上向善的朴素本质，当然也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现代家庭伦理倾斜面

属于家庭伦理的题材，在林锦微型小说的数量就相对地少了许多。但就其质地而言，这部分的份量却并不轻，其中以《来一碗粥》、《入土文件》、《精神与肉体的抗衡》和《奖赏》等几篇为最特出。《来一碗粥》中的父亲，是个道地的华人家庭的长者，安于粗茶淡饭的生活，而孩子则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长大后移居外国，丝毫不体谅父亲委曲求

全的苦心。《入土文件》写一个老妇辛苦养大孩子，孩子丰衣足食，反过来当老母为朽物，除了供给老人三餐，再不管她的死活，老妇最终被送入国家安老院，极尽讽喻能事。《精神与肉体的抗衡》通过陈老的死，带出现代家庭、代沟和老人问题，小说中的陈老因为精神上失去寄托，便不顾肉体上受到伤害，做儿子的不为父亲的晚年着想，硬将一直陪伴他的孙儿带走，把老父推上绝路，显示现代家庭伦理观念的淡薄。《奖赏》写一对夫妇，彼此都为自己的专业而忙碌，忽略了女儿的精神需求，使一个十岁女孩希望“和妈咪一起睡”都几乎变成一种梦想。

除了上述几篇，还有《病》，小说通过三个专业人士的儿子回家探望父亲，不是因为关心父亲的病，而是争着要分家产，露骨地反映了高等知识分子只顾私利、漠视亲情的现实；还有《估价单》里的亲子关系，儿子替父亲做点事索取高价酬劳，迫得老母要清楚计算孩子从小到大的花费，让孩子了解父母养育儿女的苦心。这些题材在现今社会里可说司空见惯，也是现代人在享受科学物质文明之余面对的人文精神上的苦恼，家庭结构的改变、伦理道德的沦丧，未始不是社会高度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林锦微型小说在这方面正传达了一份深沉的现代人无奈而又无力的心态。

技巧的特色

林锦微型小说，故事性不强，情节也不太复杂，但是一般上读起来都令人有“余韵未了”的感觉。这种情形，就像诗歌里的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小说能做到这点，除了

作者本身也是诗人，在驾驭语言文字上占有一定优势之外，当然不忽略小说创作方面的技巧，包括人物刻画、心理描写、气氛营造、戏剧性效果等等。除了这些，作者更要注意微型小说的几个基本特色，像文字的精简、题材的浓缩、构思的微妙、开篇的切入、结局的神巧等等，只要其中一环出现纰漏，都会影响整篇小说的精神面貌。大体上，林锦的微型小说可读性强，其中不少篇章令人读了一遍还想回头重读，不像有些作品，只读前面部分便猜想得到结尾，或者内容题旨平庸干瘪，教人不忍卒读，当然更不必谈到思想性的高度与深度。由此，也可以看出林锦在创作态度上的谨严与认真，不论是内容或形式的处理，绝少有率尔操觚的现象。

在技巧的运用上，林锦微型小说具有以下几个特色：人物形象化、语言生活化、情节戏剧化；此外，小说的悬疑性、外延性、含蓄性，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让读者在掩卷之余，自然而然会产生诸多联想，使小说扩大它的影响空间，不至于有“一览无遗”的缺憾。这里，可以举《复印机》、《鱼》、《屋树井竹》等三篇作个概括说明。

《复印机》里的文员小刘，像普通小市民一样，学校毕业后到社会谋生、结婚、生子，年复一年地过着机械单调的日子，把原来喜爱的读书写作都抛诸脑后，可能他不甘于如此简单的生活，特地买了一台复印机，每晚临睡前总要对它发呆，后来还在半夜里复印东西；而他所复印的，竟然是“一双双浅灰的手掌”。小说里的“复印机”和“浅灰的手掌”当然都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现代人精神生活的苦闷，就像一台没有生命的复印机那样；而在孤独彷徨的同时，又

会做出不可思议的傻事。小说在结束时这么写道：“那些手掌，似乎渐渐地向她逼近，要捏住她的脖子。她惊呼一声，跌坐在地上。”却又隐隐暗示生活像一张巨手，它无时无刻不环视在人左右，令人时有喘不过气的感觉。很平常的一个题材，在作者独具匠心的处理下，让读者从复印机这件死物联想到许多人生世态，自然而然在内心生起深切的共鸣。

《鱼》的表现手法也别开生面。它写安尼思念死去的母亲，从餐桌上一道清蒸鱼，联想到母亲死的样子，哭嚷着不要杀鱼。小说的构思佳妙，既流露小孩纯真的恋母天性，也对照出大人之间的虚假。作者生动地利用“鱼”的形象结合安尼的妈死时的惨状，交代了整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安尼的妈是怎么死的，小说留下悬疑，只知道安尼的父亲和一个“很放很放”、名叫玛丽的女人有了婚外情。玛丽一心一意想讨好安尼，怎知弄巧反拙，当安尼哭嚷着要回家时，玛丽生气地说：“你那死鬼老婆不懂得怎样教她的，一点爱心也没有，亏我对她那么好。”简单的几句对白，已很清楚地刻划了人物的性格和心态。

《屋树井竹》的写法别出心裁，小说的时空跨度极大，具有史诗一般的气势，其实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作者却以微型的形式，在有限的篇幅里，发挥语言无限扩大的张力。老姬一口气追述日军统治时期一段惨无人道事迹（全文206字不加标点符号），是小说的骨节眼所在。全篇涵盖了升华的民族感情以及对战争贩子的谴责，充满人道主义色彩。值得一提的，本篇的写作手法多变，有诗歌语言，有散文笔触，也有小说的对白，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片广袤的天

地，而这个天地，既是诗情画意的乐土，也是残酷无比的人间炼狱，形成强烈的对照，那便是作者在本篇所要强调的旨意：战争与和平，相差只在一念之间，可它带给人类的感受却有天渊之别。

总结

总的来说，林锦的微型小说是结合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者之长处发展起来、具有本身独特风格的产品。它的题材多样化，作者敢于面向生活，所写的现实人物和故事，就像发生在我们周遭，和我们的生活共同呼吸、共同浮沉，从他们身上流露的思想感情，令我们喜爱，令我们悲伤，令我们感动，令我们愤怒，都随着作者的笔触所到之处而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可以说，作者谨严地看待他的每一篇创作，务使文学作品给予读者美感作用以外，还有另一层引导、启迪和教育社会的意义。

林锦是个文学多面手，在创作微型小说之前，他已写过不少诗歌和散文，因此在微型写作手法上，有好多篇章同时发挥散文和诗的效应，加强小说的可读性，像《屋树井竹》、《风花雪月》、《不关椅子的事》、《来一碗粥》等几篇都呈现这方面的特色。至于微型小说讲究的几个要诀，如语言精炼、文字浓缩、意在言外以及收尾要求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林锦大体上都做到了。当然其中有些篇章内容略嫌稀薄了些，或者在主题意识上浮浅了些，像《雨》、《克星》、《猫狗事件》、《烟灰缸》、《信

仰》、《买蟹记》、《洗不掉的年》、《结局》等篇，都或多或少存在上述的毛病。然而总体而言，瑕不掩瑜，林锦微型小说所散发的艺术魅力，到底没有因为偶尔的“失误”而有所减色的。

（按：本文乃作者应邀出席1997年在中国武汉举行的“新加坡作家作品评述会”发表的专题论文。）



小议黎紫书的小说

对于黎紫书，我最早看她的小说是在南大校友会主办的微型小说赛，那是在六年前。那一届，参赛的作品《爷爷的木瓜树》夺得首奖，我给了它极高的评价，那是对黎紫书小说认识的开始。几年后，当年的初涉文坛小妮子，连年通过小说作品进军文学堂奥，无往而不利，几乎成了文学赛会的常胜军，不只在国内，甚至挑战到台湾也所向披靡。这在马华文学史上，迄今尚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在出道不久便能像黎紫书那么样把大堆的光环都聚焦于个人身上。对于一位年龄不足三十的年轻作者来说，她之受人注目，以至于视为“黎紫书现象”，说起来是不寻常，却也是十分正常的事。

一开始，黎紫书的作品没有给人一种青涩的感觉。她好似一位苦苦练功的武者，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显露非凡的招式。不像一般初学者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特别是小说这门年轻人不易讨好的文类，涉及的写作技巧非短期内所能精通，而社会历练更不是看多几本小说就能获得，要做到千锤百炼，总需要经历一段长时期。在马华文学史上像铁

抗，成名虽然也是在不到三十岁的年龄，所写小说像《白蚁》、《试炼人生》，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但铁抗所处身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动乱的社会，社会本身便造就了作家早熟的心智，也为作家安排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因此，在铁抗笔下的人物，即使过了六七十年，仍然让人读了怦然心动，这或许就是文学的社会功能所起的作用吧。

如果以《爷爷的木瓜树》这篇得奖之作来分析，黎紫书一开始便抱着使命感创作。在《爷》篇里，作者向现实生活取材，通过祖父与父亲一代在思想价值观上的差异，由于两代人之间的鸿沟，造成新生代在母语教育学习上出现极大的危机，隐隐约约流透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颓败滑落。像这样一篇小说，篇幅虽短，然而它带出的讯息量却很大，特别是处在二十世纪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这个时空，华教问题一直是华社的一块心头石，尽管多少人通过评论在报章发表将伯之呼，但是通过文学题材，以极其浓缩的手法去经营，至少在我这个文学中人看来，它所发挥的震撼作用，绝不比长篇大论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是，几年之后，我再读黎紫书的小说，明显发现她的写作路线的转向。从她收集在小说集《天国之门》里的七篇作品，尽管在取材上仍然十分写实，但是表达技巧却和前期给人的朴质清新全然两样。如果要做比喻，她前期之作犹如一位小家碧玉，一位口齿伶俐的村姑，她的一举一动都给人自然和亲切感。而后期之作，则如同一位现代化女性，美艳动人依旧，谈吐大方依旧，然而她的心思她的感情已经过一

层一层精致的包装，让人难以亲近。

作家通过创作确定他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他以本身的思想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叙写他的怀抱他的情绪。他可以自由掌控手中的笔，用自己最钟意的方式，可以无需考虑社会问题或读者问题。换言之，作家“我手写我心”，他心里怎么想，笔下便怎么写，别人是否能够进入作品的“内心世界”，与作者的心绪波动共起伏，他不必去操心。在写作的过程中，他追求的是艺术的完美，尽其所能写出他所要的东西，而不必理会作品是不是被大多数读者看得懂。在他眼里，传统是沉重负荷，现实主义是老土，都是该弃置的废物。影响所及，当今文坛一批批冒起的新新人类，好像都跟传统跟现实主义有仇似的，一提起使命或谈到大众化，总会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周身不自在。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世纪末“跟风热潮”的一种症象吧。

当然，黎紫书并不是“跟风”族。她从开始便有了坚稳的文学根基，而且一出道便有惊人表现。即使是现在，我仍然很难在她的文字阵式里找出破绽。就像一位耍杂技的能手，什么道具在他手中都难不倒他，甚至像一个变戏法到了出神入化境界的魔术师，观众这时只有瞪大眼睛的份儿。

黎紫书的小说，从早期的极短篇到近期的中篇，都持着一贯的谨严态度，水准相当平稳。就文学性来说，她的小说的确是无容质疑的。但我担心的是像《蛆魔》这类纯意识流、近乎魔幻式的小说，到底有多少人读得懂？她似乎已经对玩弄文字游戏玩上了瘾，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她是个具有天份的作家，从《迷城》、《天国之门》等篇小

说，可以看出她的功力。如果她能善加利用手中的笔，将触角伸向辽阔的现实生活层面，而不是一味在技巧上刻意卖弄，她的成就应该是无可限量的。

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总要经历许多煎熬和考验，只有靠一步一脚印踏实地走下去，那成功才不是幸致的事。而黎紫书何其幸运，一出道便运气一直照顾着她，她短短的写作历程，好似尚未遇到任何逆境，也没有尝过什么失败的滋味。在这幸运的背后，可能也暗藏对她不利的陷阱。年轻人当一路享受胜利的成果时，往往也最容易放纵自己，骄矜令他目空一切，虚荣令他忘乎所以，他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任凭自己的喜爱，爱怎么写便怎么写，完全视读者视社会如无物。一个作家抱持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创作几乎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希望黎紫书不是这样一号作家。

(写于2000年11月30日)

我看陈大为的诗和散文

陈大为是马华新生代留台生近年在台湾文坛领尽风骚的人物。主要创作在诗歌散文。他的好多诗篇和散文在台湾和大马两地频频获奖，评论界几乎是一面倒的好评如潮，年轻诗人也踌躇满志，和一小群“烧芭论”者扬言要对马华文学进行颠覆，而且说到做到，在他自编的马华诗选里，入围的只有寥寥无几的现代派诗人，写实派诗人一个也选不上，那种意气风发、舍我其谁的姿态，似乎整个华文文坛已成为少数几位“新贵”的囊中物，不能不说是20世纪末一个令人莫敢直视的景观。

这回，由于受邀担任华总主办“马华优秀青年文学奖”，有幸拜读多位文坛炙手可热青年作家之作，其中包括陈大为的诗歌与小说。他提呈的两部著作是：《再鸿门》（诗集）与《流动的身世》（散文集）。我花了三天时间看了他的作品，也总结出以下一些意见。

先谈诗歌。在《再鸿门》这本诗集里，分为两卷，首卷收的是叙事诗，占13首，次卷收的是短诗，也是13首，两类诗加起来总共有26首。根据作者在《代跋》里所云，叙事诗

是他的苦心经营，短诗则是信笔而为，分量上当然是前者为重。

陈大为对历史与情节似乎有一份特别的嗜好，诗的创作方针一直是“以古喻今”，可其手法跟一般诗人并不一样：

“他常常能入乎其内并出乎其外，结果他写出来的诗当然已对历史做了改写以及再诠释。”（陈慧桦语）

陈大为的诗并不难读，语言也不像一般现代诗的晦涩或故弄玄虚。由于他的诗大都取材历史作题材，大体上都有个骨架，加上叙事的手法，脉络可寻，因此诗的故事感强。他用历史事件入诗，具有撰写长篇叙事诗甚至史诗的野心，首先就必须具备对中华文化精湛的了解，还有对历史的深刻体会，这两点作为中文系出身的陈大为基本上都有。因此，他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长诗尝试，在短短几年里便结果累累，这是许多同年代诗人所望尘莫及的地方。

从写诗的态度，约略可以看出陈大为好学勤奋的另一面。在整本诗集中，我找不到任何一首戏笔之作。他对诗艺的追求，近似杜甫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大概也跟“苦吟派”无分上下了。

就主题诗《再鸿门》而言，陈大为藉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事件，认为“历史也是一则手写的故事，/一串旧文字，任我诠释任我组织”，他说后世都“不自觉走进司马迁的设定：/成为范增的心情，替他处心替他积虑”，其实这些都是司马迁的虚构与诠释。陈大为不甘于“替蛇添足”，决意要“从两翼颠覆内外夹攻”，他形容自己的鸿门：“我的鸿门是一匹受困的兽/在笼里把庞大浓缩，往暗处点火”。这便

是陈大为写《再鸿门》的用心，既表示他的异议，也显出他的策略。

陈慧桦分析这首诗时，指陈大为“意在暴露诗人所采取的一些后结构、后设式的书写策略；他不仅把吾人阅读及史迁虚构再现鸿门宴的过程暴露出来，也同时写出了他颠覆典范文本的意图来。”

陈大为在他的长篇叙事诗里对早有定评的历史人物给予重新定位，任意月旦，无一不隐含“颠覆”意味。除了项羽，还有鲧、曹操、屈原等人。他排除史家的肯定，从别个角度切入，即如他诗中所云：“从两翼颠覆内外夹攻”，以取得他不同凡响的“异议”。诗言志，不管是借古讽今，还是借人酒杯浇自己的心中块垒，陈大为有绝对的创作自由，而其结果，只有诗歌本身的存在价值才是首要的考量，其他不论是自我或是借助外力的任意或刻意拔高都是无足挂齿。

就诗论诗，陈大为的创作野心，总结是得失参半。在得方面，他敢闯别的诗人所不敢闯的领域，展现其作为诗人的抱负和勇气，从字里行间，陈大为的诗已然形成一种风格，隐隐流露其倨傲不群的个性，这在诗家来说，是相当可贵的一份秉质。另外一点，他对诗艺的探索，无论设譬取喻或练意练字，都能做到一丝不苟，而且讲究结构的完整性。他没有一般现代派诗人的歪风，不玩文字游戏，不将读者带进迷宫，尽管他的诗实际上也不是平易好懂。

在缺失方面，陈大为的诗虽然处处向“大题材”挖掘，表面上看大是大了，但在诗的气势上却不够磅礴，可能太多意象影响了整体氛围，聚焦点分散，犹如天女散花，给人眼

花撩乱，到头来反而模糊了主题意识。此外，他的创作手法略嫌单元化，写长诗和写短诗都同个调调儿，缺少变化，读多几篇会有厌腻感觉。他的长诗厚重感是有了，所缺的是震撼力度，讽喻有余，深刻不足，有些诗篇从头到尾都是强势出击，犹如大潮一泻而下，中间少了缓冲，少了抑扬顿挫，读来便少了一份节奏感。长诗如此，短诗也犯了同样毛病，不管什么诗题，都一味的严肃手法处理，结果诗旨是有了，可是缺少了诗的意境，散发不出小诗的韵味和轻灵一面。诗歌本应抒情为主，但是陈大为的小诗却本末倒置，以致造成叙事多于抒情的不良偏颇。

说到陈大为的散文，倒觉得他以诗人之笔经营散文篇章，美是美了，读多之后，又会觉得是精神上一种负累。散文其实可以无需写得像陈大为那么费劲的，不必像那些未成气候的书家，对笔下的每一勾每一勒都要添枝补叶，务求每个字体看起来大小一致。往往过于工整的书法可以作为初学者的楷模，却难以登大雅之堂。散文从某个角度来看，也和书法有一定程度的类同性，既要有点，也要有面，点面照顾得法，整个格局大体上就具备了。而在运笔过程中，需要有缓有急，该重写的地方不惜落足笔墨，该轻快处也应放松心情，在散乱中自有头绪，在有序中显现零乱美，这便是散文家追求的艺术极致。可是读陈大为散文，往往给人心头增加一份灰迫和急促，很难享受到从容淡定的和谐美感。

我想，陈大为所犯的毛病，主要因为太过贪心。他尽其所能地排比文字，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以为这样子的精雕细琢，就一定产生出艺术之作。他试图把所有好的东西集中

在一起，便尽量在文字上下功夫，但他忽略了作品的有机结合，除了外表，还有内在的因素。因此，总的来说，陈大为的散文由于太多说理的味道，理性有余，感性却嫌不足。另外一点，有些篇章和他的诗不但内容雷同，连表达方式也无分轩轻，甚至同样的句字出现在诗里，也出现在散文里。这样子的一题两写、了无新意的“双胞胎”，除了显示作者的“技穷”，我委实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写于2000年11月26日)

温馨感人的生活之歌

序许心伦散文集《有情天地》

从一粒砂里看世界，不只是哲学家的思维心路，也是作家，特别是散文家细腻入微的观察心得。

我们每天生活着的空间，耳闻目击的人物事物，有些是不断地在翻版，重复又重复；有些是新鲜的，可能在一生里只出现那么仅有的一次。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面孔或事件，在芸芸众生里，究竟有几人会对这些平常的或不平常的人事种种表示关怀，由心灵的颤动到诉诸语言文字？

对常人来说，生活里有阳光，有雨水，有风暴，是一种自然现象，那怕没有这些，日子一样还是要过。可是，同样的日子里，有些人过得踏实、平稳，他们用一颗赤诚的心，去感受人世间的种种喜怒哀乐，同时凭一份坚定的意志和自信，去面对生活中各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挑战；有些人则不同，他们虽不致麻木不仁，却也不以为每天日子会有多大不同的变化。这两者间明显的差异，大概是前者预感到人生的无常，世间万物都在流动地发展，就像流水一样，每天都有新的泉源，新的激荡，永远不会干枯或呆滞；而后者，则缺

少了这点敏锐的体悟，生命的色调自然暗淡了些。

许心伦是个懂得生活的作家，寻常的日子除了写作，也喜欢作画；她有很强的表达语言文字的能力，加上平日写生练就的一副勾勒概括身手，在讴歌生活的乐章时，自是比一般写作者更能捕捉流动生命里令人感动、震撼的精髓部分。就拿用作为书名的《有情天地》来说，作者从一个有情人、有心人的慧眼，看到了存在于天地间、惯常被人们忽略了微小生命，像蜘蛛、麻雀、咕咕鸟、小松鼠、花蝴蝶、乌鸦、红蚂蚁、黑蚂蚁、蜜蜂、老鼠等，它们也和人一样，都拥有自己的家；作者在叙写本身的家园时，并没有忘记这群穿梭人间的小生灵，更挥洒她一支生花妙笔，描绘这些小生灵生活中有趣动人的一面：

“那是在一个旭阳初升的上午吧，我在一片亮丽的阳光中瞧见了挂在池塘上的七张蜘蛛网。这七张蜘蛛网，有长达八尺的，有短达一尺，都齐齐错综复杂的牵绊丝挂于池塘边种着的绿叶子上、挂着的鸟笼上、堆砌的石头上与池边渔翁的钓杆上。我永远都不会明白，蜘蛛姑娘是用那一个招式，可以把一条细细的丝线横跨八尺的空间，由这一头粘搭在另一头的攀附物上。它是用跳远的姿态吗？或是用跳高的丰姿？它叫风儿送她到八尺远的那块石头上吗？总之，它筑了一个八尺长度、二尺宽度的大网，中间没有任何攀附物。其他一些小小的蜘蛛网，就像凑热闹似的，在有空间的地方就搭起了帐篷，横七竖八的，做起了营生……”（页66）

这个主题篇的篇幅很长，既似散文，又可以作为童话故事来读。像上述那些小生物，在作者笔下，全变成一个个有情的物体，与人类和平共存于天地间，作者形容它们是“不给租金的客户”，从它们身上，看它们如何生活，学习到一些做人的道理，也领悟了世间万物的美妙和奥秘。作者从人类的触觉去体会生物世界的蓬勃生机，满含诚意和爱心，写得极热闹，也很有姿采。像上述充满人情味的语言文字，在本书里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许心伦的散文，多从现实生活中细微事物方面取材，所写都是身边琐事，看似无足道哉，然而细读之下，却觉满含生活的哲理。像《落叶天》，作者从满院的落叶联想到生命的历程和意义，她说：

“在马来西亚的国土上，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因此，大树也不会随气候做四季的装扮。它们从来不会把叶子落尽，或把叶子染上翡翠绿。它们的叶子都是”青“一色的。它们唯有在长出新绿时，才会满枝桠间挂满粉红色的三角旗子，或嫩黄色的短丝巾。但是，当它们老了，残了，不再有生命了，它们只能选择一个告别生机的特殊颜色，那就是光灿灿的金黄色。”（页26）

还有，在《野兰香》里，作者描写丑陋的野兰，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默默的尽着生存的义务，尽管生命是那么的短暂，它仍然要绽放美丽的花朵，给世界散播一点芬芳。作者是如此发出衷心的赞颂：

“今天，她又拼出了第二季的生命结晶。她的发丝中又夹满了星星白的小花，阵阵清香又再度的飘入我的书房。我相信，今后她将一次又一次的发挥她最美丽的内涵，只要她永远有一位支持她成长的情人。我是再也不会对她即来即离的短暂生命而感伤了，因为我知道，她的离去，就是在酝酿另一次更灿烂的重生，带来更浓烈的香气。我将衷心等待一季又一季平凡中的美丽恋情，一阵又一阵的野外幽香……”（页40）

许心伦的散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见微知著。往往在一个很小的环节上、在一件平常的事故上，她都能有所感悟，而生出一番对人生、对生命的期许。像《墓》这一篇，作者写一份面对义山多年兴起的复杂感触，心情由害怕到平和，然后从坟墓里的幽灵联想到祖先的飘洋过海，为开拓一个新天地作出无私的贡献，她告诉世人：先贤是值得尊敬的，值得怀念的，他们的幽灵也应该是亲善的、和气的、好样好貌的。她在抨击世间的连篇鬼话，认为“人若心安理得、光明磊落，就是夜里睡在墓头，亦可以安枕无忧，无愧于天地良心。”

基于这么一份豁达开朗的胸襟，许心伦对生与死的问题，才有一种异于常人、高于常人的看法：

“我在义山对面驻足了三年，害怕的感觉才慢慢的好转。只是，有时候看到满山峦静悄悄的躺着墓头，心

里也会生起无限的感触，觉得生死之间，只是隔着一条大马路，总有一天，我也是会跨过大马路，住在那边。于是，我就会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很珍惜自己手上的时间。”（页5）

《有情天地》共收录许心伦二十个散文篇章，从第一篇《墓》到最后一篇《我在都门遗失了一对眼睛》，不论是咏物抒情还是怀人记事，不管所写是令人愉悦抑或使人伤感，大体上都环绕着由作者的诚意、真挚和爱心营造的主旋律，使人感受到旺盛生命力在流转，世界尽管多灾多难，但只要人类向上向善的意志永远存在，人间的“有情天地”将会越来越宽阔！我想，任何人读到许心伦发自心坎深处的篇章，都会很自然地受到作者那委婉、温馨笔触所感染，从而加强对生命的无限依恋和信念，这当然也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艺术魅力。

许心伦的散文，篇篇都有一个明朗的主题，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和时下一些以“现代”、“意识流”作幌子，实际上宣泄个人躲在斗室里制造的“七彩宝塔”比起来，本质上何者健康何者颓废，聪明的读者自有定论。许心伦投入写作行列日子不短，凭她过人的艺术天份，要在文学广场施展几招“花拳绣腿”，绝对不是难事；而她却不此之图，不赶时髦追新潮，老老实实地扎稳脚步，要用实力让作品抬得起头。站在扶掖后进的立场，我感到欣慰，从许心伦和一批具有同样水平的写作人身上，可以看出马华新秀在稳健中茁壮成长，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必然会在新

生代群里传承，并散发比前行者更为旺盛的生命力。

许心伦还年轻，横在她眼前的文学道路还很遥远，这部《有情天地》的付梓出版，可以看作是她多年辛勤耕耘的一个小小总结。我衷心祝福她，同时希望她冷静地检阅作品里出现的一些缺失，比如题材上的取舍和剪裁、文字处理上的适宜性和准确度、思想内容方面过与不及的弊端、表现手法的收放问题等等，设法给予纠正改善。此外，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提升个人的文学理论修养、加强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能力、了解社会改革变迁的辩证原理，对于有理想抱负的作家来说，都应视为本份必要的自我充实，以及寻求上进突破的阶梯。谨此以一愚之得与许心伦共勉，是为序。

(稿于28·3·1996)

林秋霞和她的《宠物》

新加坡青年女作家林秋霞最近出版她的第一本都市小说集《宠物》。我在书出后的短短几天内便收到她的一本赠书。隔两天，她拨来长途电话，问我收到书了未？希望我写点有关这本书的文字。

我不置可否。

一来我和她不熟悉。大家只见过一次面，是在去年杪的事。又是在大伙儿聚集的场合，经过介绍后，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知道她的底细并不多。

二来她的作品我读得极有限。虽然她目前已是新加坡红极一时的专栏作家和以写都市小说深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女作家，然而新马两地一水之隔，客观因素使两地文坛难以沟通交流，彼此所知自然少之又少。

但不管怎样，我收到她的赠书，想到朋友的一番好意，怎么忙也得抽空翻阅一下。

《宠物》印得很精美。从封面到内页的设计，显而易见是“加工”成品。全书包含七个短篇，厚达二百余页。以平均每页四百字计，全书约共十万字。每个短篇平均一万余

字，容量虽说不上厚重，却也绝不单薄。

先说内容。

《宠物》的最大特色，题材尽是现代商场故事，小说集的每个女主角都是事业成功的年轻女性，即所谓的女强人。内容涉及都市男女的感情生活的浮沉，职业女性在家庭与大机构里人事的纠葛，从而揭露现代人在名利场中的丑陋人性。此外，也有对移居海外的新加坡人的内心世界作了一番剖析，探讨当前华文的没落问题等等。作者从一个新加坡人的立场出发，笔下的人物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上层社会的色彩，符合新加坡作为现代城市典型特征。

作者所以单挑成功女性在商业领域种种不寻常作为写成小说，我想可能和她本身的生活经历有关。

她十八岁出道，任娱乐记者，之后当过娱乐节目助理、补习中心英语教师、民歌手、电脑公司执行人员、西班牙企业行政人员、意大利公司市场执行人员等等。目前是活跃于商界的眼镜商。

再看看她的学历，二十岁以前，凭自修考取英国伦敦工商管理学院专业文凭、英国皇家市场学院专业文凭、伦敦行政学院专业文凭。二十八岁结婚，婚后积极从商，又靠着自修，在短短三几年内考获伦敦大学法科荣誉学位，今年六月，再考取新加坡工艺学院光学专科文凭。

从以上的简历可知林秋霞的勤奋好学和对事业拼搏的精神，称得上是一位“女强人”。以她不平凡的经历，加上天赋的写作才华，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发挥所长，给人的印象自然会有“与众不同”的感觉。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从作品里看出人生，勾勒社会的奇形怪状，作家若不是有亲身的体验，很难写出精彩的篇章。

林秋霞小说的特色，便在于她能把握自己的所处身的商业社会环境，凭其敏锐的感觉触觉，揭露种种不为人所熟知的众生相。在她笔下出现的人物，女主角同是一个人：林安安，是个精明、能干、理性、果断的现代女性，她容貌出众，颠倒众生，又具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遭遇方面，这位在企业机构里“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尽管物质生活不虞或缺，但精神生活方面，却是历尽沧桑，令人读后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悲凉感伤。

我不知道林安安这个女主角人物的际遇，是不是作者的另一化身？但据我所知，林秋霞年轻时曾受过一次感情挫折。她也曾有过织梦年龄，也曾相信过风花雪月。当年为了一名泰国华侨放弃了大学，和家人大闹一番后，随男友到泰国去，后来男友却令她失望，她毅然斩断情丝，只身跑去台北闯荡，在酒廊当过民歌手。那时她只有二十岁。从那时起，她努力创业，要自力更生，更认识到文凭的重要。

从林秋霞的身世，再翻阅《宠物》里系列都市小说女主角林安安的遭遇，无论在个性、思想和谈吐方面，二者总给人一种“双胞胎”的印象。看似巧合，又似有意为之，唯有作者本身才心知肚明。

再读小说的艺术手法。

以我的感觉，阅读林秋霞的小说是一件称心愉快的事。她行文简洁活泼，遣词用字浅白平易，情节交代干净利落，故事节奏进展快速，毫无拖泥带水之病，她的文字就像她的

为人一样，没有丝毫矫饰造作，对白非常生活化，在轻描淡写之中，却常常透露许多生活的哲理，耐人寻味。

譬如：

“新加坡人英语说得再好也不会是英国人，华文说得再流利也不是中国人……”（《缺月》）

“事无大小，都由政府安排妥贴……如今轮到我的终身大事，与其相信缘份，等了半辈子那人仍没来，倒不如实际一点，省下这份操心。”（《星心》）

“人到高处不胜寒，生活永无中庸之道。要不做得最好，要不永远最差，做夹心层只有酸葡萄的份。”（《传奇》）。

也许是“曾经沧海”的缘故，作者对于男女两性，对于爱情，倒是看得很透，也很绝。譬如她说：“男人重感情，在于未得到；女人重感情，在于已经拥有。”；又说：“男人们也有他们的难处，饶是尽了力仍是让女人挑剔个没完，于是也没几个有勇气对另一个人承担住一辈子。”（《小说》），如果不曾在情场翻滚过，又何来如此深刻的体会？

读《宠物》的每个短篇，看林安安举手投足之间，都不无林秋霞的影子，小说“夫子自道”的味道浓烈，从而也可以见出作者对待创作的执着和投入的一斑。

当然，这些也许是优点。倘若从另一角度衡量，《宠物》里七个篇章，从头到尾都采用同个调子，故事情节尽管有别，小说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思想状态，却几乎大同小异。就以“都市小说”这命题来说，其所包含的社会层面，也不应只局限于中上层阶级。而作者的笔触似乎“独沽一味”，

完全没有涉及一般小市民的生活的面貌。以作者生活阅历的丰富，她是有能力扩大写作的层面，将触须伸展到上流社会以外更广大的空间，从而获取较诸现在更为可观的成果。

我想这一点，林秋霞最终是会达到的，因为她只有三十二岁，她正青春。

(3·10·1992《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后记

这本集子的整理，要比以前的十几二十本来得吃力。

并不是担心集子的篇幅问题，反而因为打算收入的篇章太多，得要进行一番筛选，而一些文稿因写作岁月过久，内容上需要增删，这工作做起来就颇费周章，如此这般的拖拖拉拉，才总算把这本文集编好。

出书对我来说，早已没有早年那股劲儿，其中原因包括主客观的，真是一言难尽。那经历好比游山玩水，年轻时兴致勃勃，有机会就想往外跑，一颗心总是闲不下来；可是年纪大了，旅游的念头越来越淡，竟至连想都不去想。出书也一样，“文艺青年”时期，看到人家出书，自己也心痒痒，不时计算手头上发表或未发表的篇章，凑了差不多字数，便准备付梓出版。因此，那时期的出书速度也算顶快的了，好像别的文友所遇的苦恼都不曾发生在我的身上。

今天回看“少不更事”的做法，虽然每本书的背后都有许多难以言宣的故事，我还是很难理解当年的勇态与傻劲。如果时光倒流，是否仍会重蹈覆辙，我心里总在怀疑。

本书的大部分篇章写在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年代，我有

幸目睹一个称得上马华文学辉煌蓬勃发展时期，见证了“马华文学节”“马华文学奖”等多项划时代盛会，流露于笔底的，自也多了关怀与期许的分量。有关马华文学与文学现象之类的文字，其中有个人的，更多的是同个时期一起奋斗的文友的共同经历，与其藏在书架变成废纸堆，不如整理成书，也算是向时代向历史有个交代。

当然，如果不是新加坡青年书局提供出版方便，还有杰伦兄的鼓励，忠扬先生和丁云老弟的协助玉成，拙著能否如愿出版，仍是一个未知数。谨此向他们致以由衷谢忱。是为记。

2006年10月19日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TELEPHONE No. 63379552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02-27
新加坡180231邮区

丛书：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第二辑）

书名：文学情怀录

著者：孟沙

承印：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981-05-7234-4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

定价：新币：\$20.00



SGD \$20.00

